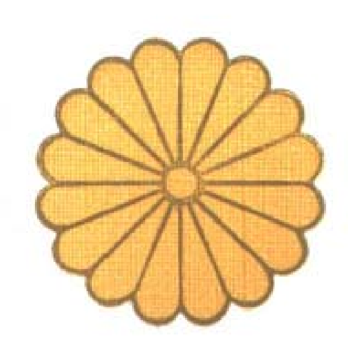
日本近现代史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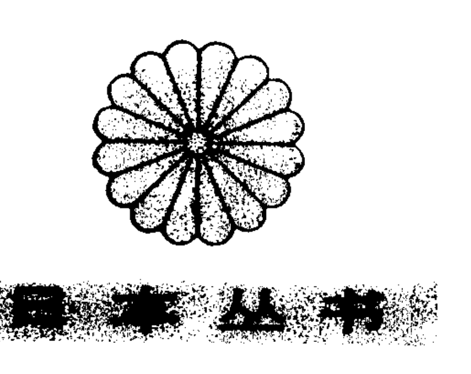
〔日〕远山茂树 著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商务印书馆



日本近现代史

第一卷



〔日〕远山茂树 著

邹有恒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日本近代史 I

远山茂树 著

据岩波书店 1975 年 6 月版译出

日 本 丛 书

日本近现代史

第 一 卷

〔日〕远山茂树 著

邹 有 恒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97-X/K·247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151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6 3/8

定价：3.30 元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尚希垂察。

编　者

1991年4月

译者的话

本书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从明治维新直到战后1960年为止的近百年来日本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在当前许多日本近现代史的著作中，这是一部简明扼要而又反映了新近研究成果的著述。

作者引证较多的文献和史料，并结合历史发展情况，揭露了一些过去讳莫如深的史实，因此，本书对我国日本历史研究工作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所以合译此书，目的就在于此。

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由远山茂树撰写，从明治维新起叙述到日俄战争为止；第二卷由今井清一撰写，从日俄战争后叙述到九·一八事变前夜为止；第三章由藤原彰撰写，从九·一八事变叙述到战后1960年为止。本书阐述的日本近百年史，包括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步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直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败亡的历史，以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占领时期和一系列改革，日本又成为举世瞩目的所谓"经济大国"的历史，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时期。

本书第一卷作者远山茂树，1914年生于东京市。1938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毕业，先后在文部省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和战争历史学研究会工作。从1958年起任横滨大学教授。他主要研究明治维新史、自由民权运动史以及日本近代政治史，主要著作有《明治维新史》、《日本历史讲座第五卷》、同石母田正、高桥硕一合著《世界历史：日本》，同今井清一、藤原彰合著《昭和史》、《战后的历史学和历史的意识》、

《明治维新和现代》等。本书第二卷作者今井清一，1924年生于前桥市。1945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现任横滨大学教授。他主要研究日本近代政治史，主要著作除同远山茂树、藤原彰合著《昭和史》外，还著有《大正民主政治》等书。本书第三卷作者藤原彰，1922年生于东京市。1949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1959年任东京大学讲师，现任一桥大学教授。他主要研究近代史，主要著作有同远山茂树、今井清一合著的《昭和史》等。

本书是按1975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最新版本译出的。

因限于水平，译文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惠予指正。

目　录

序　言

这部《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从幕府末期叙述到日俄战争，同续刊今井清一著《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藤原彰著《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合在一起，试图概述从明治维新到战后的日本近现代史。

本书所叙述从1850年到1900年初的历史，是亚洲动荡的时代。这种动荡直接同亚洲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基联系着。亚洲各民族被迫拖进资本主义世界，暴露在欧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之下。而各民族所有的阶级、阶层，都在由此引起的混乱中苦恼，彼此保持尖锐的对立，为了摆脱这种状态，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力量。这一时期的日本历史，也是这种亚洲动荡的一环。从改造社会的暴动走向自由民权运动以至社会主义运动，从明治维新、开设国会以至走向甲午、日俄战争，国民的各阶级、阶层都鼓足干劲，激烈搏斗，这里可以说是大量蕴藏着多种多样的历史发展可能性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同这一动向紧密结合起来而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规律，同时也是把那些可能性一个个地毁掉了的过程。

本书把直到1877（明治10）年的明治维新放在序章，作为问题的历史来加以考察，同1878年以后主要按编年史进行考察的第一章以下的叙述体裁，多少有些不同。著者另外出版了《明治维新》（岩波全书）、《明治维新和现代》（岩波新书），为了节省篇幅，采取了这种形式，这点请予谅解。尽量多加了注。由于是概括的叙述，只好直截了当地摆出历史的评价，舍弃了追究基本动向的一些

次要的东西。唯其如此，才试图把构成评价基础的史实和史料列举出来，希望读者在探讨具有复杂侧面的历史的具体形象上阅读原始史料，为此初步地介绍了史料的性质和内容。这里列举的史料都是公开出版的，其中大部分可在公共图书馆中看到。

远山茂树

1974年10月

序章　明治维新的特殊性质

印度佣兵之乱与太平天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威胁的各民族，开始在世界各地同时掀起反抗和斗争的时期。由于在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和进行殖民，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开放门户，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圈乃告形成，同时这意味着被强制地、破坏性地纳入这个范围内的各民族的抵抗和斗争，必定要在相互关联之下爆发起来。二十世纪头十年，处于资本主义列强剥削和压迫下的亚洲各族人民的斗争，开始有了组织上的联系。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期，这些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之间就有了频繁的往还。如后所述，甲午战后的一个时期，东京已俨然成了亚洲民族运动的据点。不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亚洲各族人民的斗争，总的说来是孤立地分散进行的①。虽然无论在客观上或主观上，这种相互关联和团结，经过了缓慢而曲折的道路，但它的逐步加强却是这一时期以后的亚洲大势。

在抗租抗粮运动的普遍高涨中，太平天国军在1853年（日本嘉永6年）3月（即佩里来航的三个月之前）进入南京城；英、法、美三国代表正在对苦于此次内乱浩大声势的清朝政府进行威胁，为扩大南京条约的既得权益展开强硬交涉，这时又以1856年10月在广州偶然发生的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计划行使武力。而阻碍其发动的是1857年（安政4年）（这时赫黎斯正在强迫幕府签订通商条约）印度佣兵和农民掀起的大叛乱。促使这次叛乱的条件是，英国为了侵略伊朗从孟加拉军区调走了部分白人部队，并为准备进

行亚罗战争在中国占用了些兵力。镇压佣兵叛乱之后，到1857年末，英法联军才攻击广州。第二年6月，天津被侵占，在天津条约签订一个半月之后，幕府被英法军胜利消息吓倒，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

1860(万延元年)到1861年(文久元年)是东亚历史的转折期。太平天国的首脑发生了分裂和混乱，尽管如此，浙江三角洲地带的佃农在1857到1860年间的抗租斗争，乘清军失败而突然凶猛起来，眼看要使太平军满可进攻长江流域，并开创新的再生机会。然而农民斗争大都没有直接同太平天国结合起来，因遭到地主民团和清军的讨伐而被各个击破；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也改变了过去对农民的态度，决定在原来的农村统治机构上建立政权的方针，为此竟然容纳地方乡绅和地主的要求，对佃农的抗租斗争施行了镇压。于是中国的国内政局和对外关系便围绕太平天国——乡绅、地主——佃农间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发生了转变。

列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

1860年，利用清政府废除天津条约的动向，英法联军打进北京，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天津开港，将九龙割让给英国和以关税为担保支付赔款。于是中国的开国已成定局，走向了沦为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的第一步。以签订北京条约和1861年11月由清除排外主义官僚势力的宫廷政变而开始的同治中兴为界限，欧美列强同中国的关系便固定下来了。这对中国方面来说，是同列强讲和和对人民加紧镇压的路线；对欧美列强来说，是通过清政府实行掠夺和半殖民地化的路线。

于是欧美列强改变了利用内乱威胁清政府而采取的对太平天国的“中立”政策，当1862年1月太平军再次逼近上海时，租界的外国军队和清军为了防卫联合起来，组织起由美国军人华尔率领

的外国人义勇部队，同太平军进行了战斗。法国根据这种情况加紧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拿破仑三世为了对抗鸦片战争后英国在东亚取得的优势，企图侵略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因亚罗战争的爆发推迟了；当这个障碍消除之后，从 1861 年起便加紧攻占南部印度支那，1862 年 6 月，法国同阮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取得了南部越南的三省（交趾支那）和崑崙岛。于是阮王朝的官僚同法国的勾结明显化了，抵抗法国侵略的只有拥戴部分爱国官员的农民的斗争了。②

总之，“由于对中国人民叛乱的恐怖，在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所付高昂代价的战争中，英国兵力的不足，还由于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彼此矛盾（英国对法国，英国对俄国的对抗——远山）等，致使英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对清政府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给以支持，只迫使中国作出部分让步就停手了。③”这就是中国虽然逐渐陷于殖民地化，但总算还能勉强维持了主权国家地位的理由之一。

这种情况，对欧美列强同日本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是一样。1861到1863年的前半期，是由于尊王攘夷运动的压力和幕府企图实行限制开国影响的政策，幕府同欧美列强的关系更加紧张了的时期。能够摆脱这种关系的条件之一是，就欧美方面的对日政策来说，从“要使这个国家避免眼看就要陷于极其危险的内乱之中”的见地出发，采取“寄托希望于将来而实行妥协的政策”，对于废除日本的封建制，“与其通过外来的或自下而上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莫如经过自上而下的渗透过程”，即采取了通过封建统治者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针④。

1860到 1861 年，对于英国内部来说，也是一个转变期。在经济上虽然是产业资本的全盛时期，而在政治上以对外战争为统治国民的必要手段的具有浓厚独裁气味的巴麦斯顿外交，由于财政负

担的加重和对法紧张关系的加剧失掉了国民的支持，以 1860 年签订英法通商条约为转机，格拉斯顿的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中心的外交得势了。于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英国为顶点，在其周围形成了通过最惠国条约网而被纳入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欧洲工业国，而在其外围则围绕着因不平等条约关系而沦为欧洲半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中近东、远东的农业国和英国的殖民地这一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双重市场结构⑤”，其对东亚政策的重点也就放在稳定和维持这种局势上了。至少经过 1873 年以后世界慢性大萧条的持续，到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为止，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才算有一个过渡的相对稳定时期。中国的同治中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这种世界历史条件的产物。

攘夷的原则化

欧美列强的压力和号称“中华”的中国的战败，促进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儒学，尤其主张严格区别华夷名分的朱子学的崩溃。在这之前，随着封建社会解体过程的进展，儒学已经开始变质，近代思想的基础正在形成，这是中、朝、日三个民族的共同点。从此以后，与上述的世界历史条件相结合，产生了一个对内自立、自强，对外顺应、从属两个侧面混为一体的新意识形态，成了封建统治者的主导思想。

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就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重视实证和经世实用的学派，从这个流派分出的清朝考证学之一的公羊学派中，出现了指出欧美侵略的危机，看到西洋文明的优越，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魏源和林则徐等人；这种思想为主张对欧美列强从属以加强统治体制的洋务派所采纳。朝鲜也在十七世纪出现了实学派，出使清朝的朴珪寿受到亚罗战争的冲击，大讲列强侵略的民族危机和国家自强政策，起到从实学派向开化派过渡的

桥梁作用，但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中，自强和从属这两个侧面也是混在一起的⑥。开国的主张必然包括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制这一因素，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特色。因此，由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改革派开展起来的批判开国论的政治运动，对于确定把从属性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就成为必要的了。

日本的儒学从十八世纪末以后，已经有了不拘泥于学派而采长补短的学风；不满足于训诂之学，提倡实践一经世说；以及重视实证和合理，吸取洋学的趋势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适应开国的准备。在从华夷思想转化为开国思想上，日本比中国、朝鲜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江户时代的日本本来并未隶属于中国宗主权之下，因而所受以中国为“中华”的华夷思想的束缚比较轻。中国因为实际上同周围的各民族保有宗属关系，尽管洋务派得势，统治阶层的华夷思想总的来说是凭惰性延续着；在朝鲜，由于长期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李朝后期试图原封不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小中华论，在两班的上层中还很强烈；而日本则不同。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受培理来航的直接外部压力比中国晚了十多年，统治阶层从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尽管不很充分，却能够有了对付它的余裕⑦。他们中的先觉者很快就从以文化道德的优劣来在名分上区别华夷内外的国际观，转变到以实力的征服或被征服的弱肉强食的国际观上来，从而得以通过为了海防；为了对抗欧美、征服邻近诸国，主张吸取西洋技术文明，以及为了了解敌国情况；为了争取充实武备的时间主张战略开国论等各种形式，从锁国思想一点点地转向开国思想了。尽管在幕府末期的政局中，攘夷派与开国派表面上斗争得很激烈，但开国论和攘夷论的接近和融合，却比中国和朝鲜都更顺利地实现了，这就形成了日本近代化的特点。

被视为幕府末期攘夷论的经典一后期水户派学说，虽然也承

认西洋各国武力优越，并且知道实际上必须同其压力进行妥协，但从原则上却坚决主张强硬的攘夷思想。水户藩领主德川齐昭采取了对内叫嚷攘夷，对外以和为宗旨的“内战外和论”，但后期水户学的特点在于“这种政治论在性质上已经成为控制民众和武士的一种策略了”⑧。

攘夷论和攘夷运动具有二重性。先觉者和领导者一直把攘夷加以原则化，把它当作手段和策略来使用。先是作为激励士气和富国强兵的手段，后来作为倒幕的战术。不过，作为策略之所以收到效用，是因为在其基层中存在着越来越大众化的攘夷论。本来，华夷观念在身分制度的核心—君臣主从关系中是根深蒂固的，是和保卫领地的封建统治者所固有的排外主义风气一致的。这就使攘夷思想因受外患告急的冲击而渗透到全部封建统治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连处于统治机构最下层的村吏、豪商、豪农等被统治身分的上层也被卷了进来。他们以志愿攘夷为媒介，启发了当政者的自觉，放眼于超越藩界的全国政治，激起了越“分”地投身于批判和改革政治的运动的热情，这就使武士阶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能够越出幕府官员、大名和藩的领导层的谋略范围而发动起来。不经过攘夷运动就不可能实现明治维新。此外，如果没有攘夷运动的领导者把武士群众和希望武士化的村吏、豪农、豪商的力量集结起来，加以操纵和利用，并把攘夷加以原则化、策略化，明治维新也不可能实现。如上所述，清朝的从属于列强，和因此而形成相互利用的关系之后的1863（文久3）年—1866（庆应2）年，是这种原则化和策略化的关键时期，这就使明治维新更容易实现了。

尊王与民众

攘夷论和尊王论都是由于使封建统治矛盾加深所造成的封建

统治者内部对立尖锐化趋于缓和，使之团结起来的意识形态。尽管天皇是赖幕府供养而存在，完全没有政治实权（尊王论者私下谈话时，称天皇为“王”。——译者），但在形式上所以还拥有任命德川氏为征夷大将军，以及在将军的推荐下授与大名官位的权威，是由于德川氏既是大大名，又对全体大名握有军事统率权和没收其领地、调换其封土的权力等幕藩体制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②关于封建统治者内部意见特别分歧的外交政策，为了实现“上下一心”、“举国一致”，幕府末期的尊王论首先是从将军的亲藩水户藩主的立场提倡的，同时又是出于幕府阁僚利用天皇权威的政治策略，通过上奏外交情况和请求天皇批准条约等作法才提上政治舞台的。而这种尊王论一旦为下级藩士和志士所信奉，忠于藩主和将军的思想就相对化了，成了助长处士横议之风的思想支柱。这时高唱天皇绝对尊严，主张不分贵贱贫富的万民忠诚平等的“一君万民论”，虽然作为观念上的极限可以梦想，但没能产生否定现实身分制和藩国割据制的力量。因为天皇和公卿正是靠坚守最严格的身分制和门第制的传统而存在的，尊重这些才是尊王论。

尊王论所以能在幕府末期政治史上发挥具体的政治作用，和攘夷论一样，是因为政治运动领导者把它加以原则化和策略化了的缘故。即天皇、“圣虑”成为批判幕阁、改革幕政和倒幕运动的战略象征，甚至称为“抱玉”和“夺玉”，被视为政治阴谋的工具；然而另一方面，“一君万民论”的幻影是针对草莽志士的，对于他们变革身分制度的能量终于起到了抑制的作用。攘夷论和尊王论作为团结封建统治者走向富国强兵的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但作为抚慰民众的策术却没有奏效。尊王攘夷派虽然有个时期在局部地区试图煽动民众，但没有成功，从大势看来，这种姿态是微弱的。强调尊王攘夷思想，毋宁说加深了所谓人民不懂华夷之别和主从之义的愚民观以及同民众对立的意识。而被迫察觉到它同民众对立时，

就促进了走向富国强兵论的转化。

在中国，由于输入毒害民众身心的鸦片，由于基督教会势力深入内地，其传教活动同农民的阶级分化、对立形成了深刻而复杂的结合，使民众反抗外国势力入侵的运动和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激烈化了。而封建统治者的旧排外主义和锁国主义端赖利用和煽动这种运动，得以延续了他们的政治生命。另一方面，打着反清复明旗帜的天地会、三合会等秘密结社—会党以及白莲教等民众的宗教结社，同民众的蜂起结合起来了。会党原来是小商人、交通运输工人、矿工、失业者等贫民的互相扶助和自卫的组织，是有传统的，其主张复明也是以自古以来一直成为知识人士传统的易姓革命思想为前提的。宗教叛乱也一直有悠久传统。预言大劫将临，高唱救灾救难的弥勒佛下凡治世和被判死罪则必升天的狂热信仰，与会党的武力集团结合起来，便具有了以"官逼民反"为造反口号的反官性质。⑩

与此相反，日本民众缺乏接受攘夷论和尊王论的条件。尊王论是由拒绝易姓革命思想形成的，并和民众组织无缘。在江户幕府治下也有信奉农业神的伊势外宫那样全国性的民众信仰。在1830(天保元)年的"拜神运动"和1867(庆应3)年的"那还不好吗的狂舞"等群众运动中，局部地方出现过和农民斗争混淆起来的现象。又如幕府末期兴起的民众宗教—天理教和金光教中，反映变革时期的民心，出现了"变世"和"革世"的思想。1866年和1868(明治元)年的暴动和蜂起，表现出"革世"和"均世"的想法。然而，具有强大势力的佛教，在幕府的蛮横统治下，堕落成封建统治工具，丧失了宗教生命，神佛融合的庸俗神道，没有超出追求现世福祉的巫术信仰范围，没能突破农村秩序的藩篱形成向往理想乡的救世主思想，反政权的性质很薄弱。⑪

总之，攘夷论和尊王论作为联合一部分豪农、豪商和封建统治

阶层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了；但是，作为开扩民众的政治视野，并团结和组织民众的思想武器，却是极其脆弱的。1866到1868年，民众的斗争虽然达到了农民战争前夕的阶段，但终于没有发生农民战争。日本所以实现了明治维新，即封建统治者内部改革派取得胜利，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并通过从攘夷主义转化为军国主义从而完成了积极开国的条件之一，就在于此。

幕府崩溃的意义

1866（庆应2）年全国性暴动和蜂起的高涨，第二次征讨长州战役中公开化的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以及与之相结合的西欧列强侵略危险性的现实化，这三个条件使封建统治者的行动集中于完成变革政体、振兴武备和远夷宾服（征服外国）等“中兴事业”上来。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宫廷阴谋的王政复古，以及在地区和战斗规模上始终局限在戊辰战争的范围内，但和西欧专制主义的形成过程不同，最大的领主德川幕府的统治垮了台，创造了新的天皇政权——以拥戴青年天皇的萨、长、土、肥等雄藩为核心的诸藩联合政权。虽然按岩仓的话来说，只不过“除掉了自消自灭的幕府”[12]而已，但是，无论如何这次“政体变革”的实现，取得了大政奉还运动和武装倒幕运动的领导者意想不到的巨大成果。

天皇政府必须在冲破1868、1869年的“革世暴动”的惊涛骇浪中进军。新政府的领导人虽然对于“民心向背殆不可测”，“天下人心不信政府，嗟怨之声喧嚣尘上……堂堂天朝维新之政府又在何处”这种“民心”、“人心”的动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13]，而且不得不正视政权完全软弱无力的现实，但却使他们大胆地喊出“千古未有之改革”和“百年维新”的口号。幕府末期阶段的藩政和幕政的改革派或清朝的洋务派都是以补救腐败的现存统治体制为己任的，而新政府的领导人却能站在与此不同的出发点上来。接着他们为了

对付诸如1869年那种“振臂一呼，应者四起”的农民暴动高涨的危机感，戊辰战役凯旋部队的“到处皆是的暴力跋扈”势必加紧整顿，以及诸藩一致的财政破产情况，尤其欧美列强侵略的危机，而强调必须“征韩”；为了现实征韩用来统一封建统治者思想的政略，只有在幕府刚刚倒台之后，才能收到巨大的政治效果，没有引起内乱，以第二次王政复古的政变实行了废藩置县。如果不是在幕府倒台后三年半就赶紧着手，那是不会实现的。正是因为连领导中央政局的木户孝允都对这样迅速感到意外和惊讶，所以在废藩置县之后应当建设什么样的统一国家，其方案只能向“先进”的欧美列强去寻求。在攘夷运动渗透到封建统治者最下层和它的不断原则化，以及政治指导者在不断应付和利用外来压力的策术中积累了经验的前提下，全部统治者包括官僚、旧大名、旧藩士在内的注意力才一致集中于为了“与万国对峙”而实行“维新”的目标上来。

军国主义的早熟

新政府所以能够维系了封建统治阶层人心的唯一要诀，在于顺应开国的“宇内大势”，朝着国家统一和文明开化这种符合“世界规律”的方向前进，被欧洲列强认为“理解欧洲的形势与其主张符合一致”，而得到它们的支持和鼓励⑭。新政府既没有了不起的兵力，也没有财政基础，其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不仅对外，连对内也着重夸耀了这一点。当废藩置县刚完向欧美派遣使节时，作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针，提出了对等、不侵略和互惠贸易三项原则，作为它的保证主张尊重“万国公法”。于是提出修改违反此“万国公法”的民法、刑法、税法等各项法律，肃清“累世因袭的陋规弊习”和解放民权等“百事更新”的主张⑮。七十年代的国内政治基本路线就由此定了下来，以“一切效仿欧美各国现行制度”为原则的各种制度的改革，被认为具有超越封建统治者个别利益的绝对价值。

正因为这样，以迷恋于萨摩士族封建特权的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中心的政府，才能着手实行学制、征兵令和修改地税的三大改革；而安抚全国士族反政府动向的政策，在七十年代，不是为它停止内政改革或做反动的修改，而是求之于“征韩论”、“征台之役”和江华岛事件等外征计划。

不顾军备和财政实情一味仗恃蛮干的外征计划，也是出于“这是全世界文明开化的时势”和“亚细亚诸洲也必须遵从欧洲公法”的认识。虽诉之战争亦必须迫使朝鲜开国，这也是遵从“世界规律”的，并且认为支持列强的亚洲政策是“正义”和“公理”⑯。为了实行征韩，肆无忌惮地利用中国因1870年的天津教案（民众的排斥基督教运动）而同列强的冲突，和1871年美国舰队攻击朝鲜的事件，并公然与美国公使策划实现这一目的搞军事合作⑰。作为反对西乡所主张的特派遣韩大使（“征韩”）的代案，岩仓、大久保政府于1874（明治7）年强行出兵台湾，这并不只是为了向外发泄士族的不平不满而派士族兵出征这种意义的士族对策，而是用来迫使中国承认得到英美的支持就是“义举”这件事，重新宣扬天皇政府存在的理由，压制士族的反政府动向⑱。从属于英美的亚洲侵略政策，是同建设独立统一的国家、实行文明开化政策表里一体的。这种军国主义的早熟，是由于中国成了欧美外来压迫的防壁，朝鲜避免了欧美的侵略，而日本得以代行其侵略等东亚的特殊条件而形成的。

财政和振兴产业的矛盾

积极适应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的统一国家和文明开化以及外征的实现，结合国内各条件，当然很快就产生了独特的深刻矛盾。

首先，为取消藩制而付出的补偿费，成为政府财政开支的巨大负担。从废藩置县到西南战役，为了付给旧封建统治者的家禄和政府代偿的藩债本利，就花掉了政府实际收入的几乎一半。特别是

1872（明治5）年竟达到百分之九十四，致使政府的财政完全陷于绝境。另外，农民要求修改和减轻地税的呼声高涨，年贡难以征收，财政收入减少。于是势在必行的旧藩税法的统一和修订的课题，导致了1873年7月的地税修改法的公布；这时政府虽然承认百分之三的地税率对于农民过重，但仍然不得不以“不减少以前的税收为目的”而强制实施了。不仅如此，还通过1875年7月的地税修改条例细目的制定，放弃了最初以人民申报为基础来计算地价的方式（这是效法欧美诸国的近代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给人民以改革幻想的），规定了根据郡村位置和村内的等级、位置来分摊官方估定金额的方式，还加上了由官方单方面决定地价的强制规定，大力推进了以1876年末完成为目标的修改地税事业。这就必然激起1876年以后的反对修改地税的暴动。

财政的困窘，必然加强了修改地税的反人民性质，另一方面也使政府不得不及早废除封建统治者的特权一家禄制度，即处理秩禄。用在处理秩禄上的财政负担是一亿八千五百零三万日元，比处理以前支付家禄的总额一亿二千九百十五万日元还多，这不仅都转嫁到缴纳地税的农民肩上，而且还得靠以四十万石禄米为担保，以利率七厘并按票面额百分之九十二点五发行的半殖民地的条件来募集外债。尽管废除领主制的补偿费用的总额如此之大，但能够靠领到的“金禄公债”的利息来维持生活的人，只有旧大名和少数旧上层藩士（旧大名一户平均得到六万日元的金禄公债，而一般士族每户平均得到四百一十五日元）。政府对于华族的财产给以优厚的保护，1877年，以全部华族的金禄公债为资本金设立了“华族银行”即国立第十五银行。与此相对照，除了转为官吏和政治商人之外的大多数士族则生活困难，政府虽然对士族实行了授产的措施，但不出几年之后，他们便在通货膨胀冲击中，卖掉了公债而没落下去。

尽管政府首脑的意图是想把士族的存在视为立国的主要支柱，但对士族群众的待遇变得冷酷的结果，竟把它们赶到反政府的立场上去了。于是为了转移他们的对内不满而进行的外征和对一再发生的士族叛乱进行镇压所花的费用，加重了财政的压力，引起了不可避免地增加农民负担的恶性循环。上述的修改地税方式所以变更，一是因为有鉴于修改地税事业遇到农民的抵抗而无法进展的实际情况，二是因为从此时起，加上上述的各种条件，财政困难更加深刻。从1874年的佐贺之役到1877年西南战役的连年士族叛乱，以及1874年的"征台"之役，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等等所用的军事费，占了财政总支出的百分十七到十九。

当振兴产业政策在这样的财政情况中开始实行的时候，政府努力收回外国权益是属实的。然而实际上，由于财政和资本积累的薄弱，振兴产业的中心一修建铁路，是依靠以关税为担保和付以九厘利息的不利条件发行的外债的。在不能制定保护关税的不平等条约之下，作为贸易入超和硬币外流的对策，不得不以遏制进口和振兴出口为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必须一气呵成地赶紧创办新的工业，提高旧产业的技术。政府在创办各种国营企业的同时，还号召兴办农业、畜牧业、缫丝、棉毛纺织等民办企业。不过，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引进机器和技术时，竟不考虑接受上的现实经济基础而强制实行，而劝业又和士族授产的目的密切结合在一起，这就不仅使政府的政策遭到失败，而且阻碍了民间自发资本主义的发展⑲。这与其说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错误，莫如说是由于政府的整个内外政策主要着眼于对外适应这一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总之七十年代的振兴产业，虽然通过对旧幕藩的军事产业和主要矿山实行国营和扩充，大体上建立起产生日本资本主义的军事性质和国家资本主义优先这种特殊性质的基础；通过国营模范

工厂，把机器生产的技术传给民间，在刺激其引进上取得了成果，但是总的说来，八十年代之初，已经濒临一筹莫展了。

富国强兵的困难

强兵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了保持维新政府存在下去，但却很难实现。军制的统一和藩士军队的改编势在必行。然而，所以规定了远远超过幕末长州藩和其它各藩试办的"草莽队"，以及1870年实行的选拔各藩藩士组成的常备兵这种现有军队的水平，而以否定身分制的国民皆兵制为原则的征兵令，是因为必须适应欧美列强所发展的近代化军制和近代化战斗的需要。由于这种以欧美为目标对现状进行飞跃改革的意愿，才使中央政府创建新的军制成为可能。不过，同时这种飞跃必然要受到现实的制约[20]。根据免役规定，凡是官吏、国立公立学校学生、出国留学者（实际上都是士族）以及缴纳代役金的富人都可以免除兵役的负担。以维护家族制度为名，凡负责缴纳地税者及其继承人也享受免役。这样做的结果，兵役虽然否定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权，但却成了唯独民众的次子、三子才被强迫去负担的带有封建性的赋役劳动性质了。这和颁发征兵令时的太政官告示中所强调的根据"自由平等"原则的人民军队理想相差很远，军部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吃了国民逃避兵役的苦头，成为扩充陆军的障碍。1883（明治16）年征兵完全代替了士族兵，一年的定员仅仅一万数千人左右的军队规模，是这种设有免役规定的征兵制的限度。

从欧美引进的近代制度，由于它的先进性，对国民来说反而成了桎梏，最典型的就是学制。以法国制度为基础加上美国教育思想的学制，采用了学问和教育应当由人民自动自觉地来进行的近代教育思想，以设立和维持学校的费用由居民负担为原则。为了保持高额地税，不得不把地方税压低到地税的三分之一以内，而町村

费由于受到具有浓厚的国政委托事务费性质的府县费的影响，从一开始就非常拮据。因此，占町村费百分之三十的修改地税经费的负担，再加上大约同等比率的小学校费用的负担，不仅压迫了町村的财政，而且必然迫使学费和学区内捐款的负担过重。学制是以“立身之本”的“实学”教育为标榜的。可是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的实质并不是以民众的教育要求为依据的。小学教育的实际内容，正象担任文部省督学、指导教育行政的摩莱所指出的那样，“平民对于以政府的强迫法令讲授的中国学和西洋学进行抵制”，背离了人民的要求㉑。以国家权力强制国民就学的“强迫教育”，正是学制的实质，正因为它脱离实际，又是西洋的、近代的，所以才作为对民众贯彻专制统治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发挥了作用。

维新政府结合“版籍奉还”修改了幕藩的身分制度，简化为华族、士族和平民；在废藩置县的同时，废除了“秽多”、“非人”的称呼，提倡四民平等和起用人材。这一方面是适应封建身分制度解体的实际情况，对民众反封建斗争的让步。但另方面，通过华族的名称使公卿与旧大名化为一体（官武一途），加上高级官僚的贵族化，结果再次造成了“治者和被治者的界限”和“官尊民卑”㉒。而差别称呼的废除，则以“方今正与外国交际之时，上项事体原封不动地保存下去，乃是无上的国耻”这种对外考虑为借口，把它完全形式化了㉓。总之这只是从旧的幕藩制的身分制转化为新的天皇制的身分制罢了。正象福泽谕吉所说的那样，政府所期望的是培养能够积极协助文明开化政策的“自身独立”的国民。然而，直接引进的文明开化政策的性质，却压制了民众的主动性的成长。

最有效地利用政府的四民平等口号和文明开化政策而提高了政治地位的，是旧村吏——区、户长的豪农阶层。他们在幕府末期作为幕府政权的最基层，处在矛盾的焦点。他们组织过农兵队，在戊辰战役时参过军，而且具有遭受农民暴动和骚动袭击的深刻经

验。废藩置县以后，因为正值变革时期，他们还是在征收租税、传达政令和编制户籍上，承担了更加重要的任务。尽管维新政府在制度上有所改变，但其基础仍然和幕府时代一样是村落共同体，因此，它阻止以五人组制为支柱的村落秩序的瓦解，必须另行建立起来，这不论从中央政府来看，还是从他们这些村落首长来看，都是越来越重要的。他们在创办和维持小学校上以及修改地税事业的具体执行上，是首当其冲的，因此，他们把政治眼界扩大到全县以至于全国；他们只是作为上司命令的传达者，是无法设想重建农村秩序的，因而他们便逐渐具有了代表农村居民要求的改革者的面貌。1872（明治5）年11月（阳历），经过法制整顿的新地方行政区划——大区和小区制㉔的首长，即区长和户长，尽管在翌年的12月定为"可按一般人民待遇"，三个月后却又改为准官吏，而待遇仍然暧昧不明，他们是"行政官的属吏"呢，还是"人民的代表"呢，从政府方面看来，其地位也是微妙的，这说明根据官民的对立和力量对比关系如何，其地位是可以改变的。

1873年，各地发生了反对强制征兵和创办小学的负担的暴动，到了1875、1876年又爆发了茨城县大暴动和蔓延到三重、爱知、岐阜、堺（现属奈良县）等地的伊势暴动以及关于修改地税的农民斗争。这些暴动的特点是农民开始有意识地与政府和县相对抗。据报告说，实际情况是"凡是带有官方名义的东西必遭焚毁"㉕。尤其在反对修改地税斗争中，区、户长中有的因为积极协助官方而成了农民攻击的对象，另外，也有的成了合法斗争阶段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即使作为"行政官的属吏"担任区、户长，也必须强调作为"人民代表"这个侧面。政府不承认这个侧面就搞不好地方行政。因此，从1873年以来，有许多县为了商讨区、户长的工作，设立了由区、户长组成的民会，接着在1875年4月，根据逐渐实行立宪制的方针召开的第一次地方官会议上，通过了作为听取民意的机关，

设立由区长组成府县会和由户长组成区会的法案。

废藩置县后第四年时采用的立宪制方针，与其说是受到上一年1月由征韩派前参议们提出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而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莫如说是由政府主动采取的。这既是为了缓和藩阀拼凑的政府内部各势力的对立，也是为了支持孤立于士族、农工商等全部在野阶级和阶层之外的"有司专制"政府，创建新社会基础的一种权宜办法才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引进带来欧美那么富强的统治制度的文明开化政策的一个环节。其结果势必促进了区、户长和豪农阶层的政治自觉，引起了以他们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早期发展。于是天皇制的专制主义为了维持其刚刚诞生的脆弱政权，和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抗，一方面对它让步，另方面通过压服它，把自己建立成为其性质不同于十七、十八世纪西欧建成的古典专制主义的制度。这就是1878年以后政治史发展的基本道路。

① 关于指出太平军和为讨伐它而派遣的印度佣兵之间初步联系的史实，可参照野原四郎《远东的国际关系》(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1》所载)。

② 参照(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近代8》所载各论文。胡绳著、小野信尔等译《中国近代史》。

③ 茹可夫主编、相田重夫等译《远东国际政治史》上卷29页。

④ 阿礼国著《大君之都》(岩波文库)下105～107页。此外，在有关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上，驻北京英国公使布鲁斯主张支持由清政府来统一中国的渐近的"进步"政策，他说"进步如果不是由友好而适合机宜的暗示来引导其政府本身进行的话，就几乎没有持久的希望。总之，文明是自觉采用的，而不是强制的"(坂野正高著《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290页)这和同时期的驻日英公使阿礼国设想的对日政策是完全合拍的。

⑤ 吉冈昭彦《英国自由主义国家的发展》(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近代7》)11页。并参照下山三郎著《明治维新研究史论》104页以下。

⑥ 朴珪寿对于1868年要求修好的日本国书，反对拒绝论，主张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主开国"，江华岛事件时，和译官吴庆锡(开化思想的先驱者)一起主张开国势在必行(姜在彦著《朝鲜近代史研究》48页。彭泽周著《明治初期日韩清三国关系研究》60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金玉均研究》102页，田保桥洁著《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469页)。对他的开国论的评价如此复杂，大概和对

开化派的评价有联系。

⑦ 关于幕府末期出版了许多记载鸦片战争和亚罗战争情况的书籍这一事实，可参照中山久四郎《近世中国势力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史学杂志》26编第2号）、同《近世中国对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影响》（史学会编《明治维新史研究》所收）。作为一个事例可参看佐久间象山的《关于海防事上书藩主》（《日本思想大系55》262页）。关于这前后的记载，可参阅植手通有著《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

⑧ 尾藤正英《水户学的特质》（《日本思想大系、水户学》576页）。再者，《新论》的著者会泽正志斋在《时务策》（1862年，同上大系所收）中说"料时事"，"察时变"，所以轻易转到攘夷不可实行论和富国强兵优先论上来，也是因为攘夷只是原则和手段的缘故。

⑨ 在幕藩制之下，集中住在城塀的藩士没有领地，领取禄米，可见实际上本来是支配土地和人民的，从而是能够自立割据的大名权力，也由于互相监视和互相牵制，独立性被削弱了，将军对大名具有剥夺和调转其领地的强大统制力量。这个德川将军家既是最大的领主，同时作为全国大名的统率者，其权力正象其领地分散在全国三十八个藩所象征的那样，只有依靠领主的集体体制才能存在。幕府末期封建制矛盾加深，所谓领主共同体制—幕藩制—的团结一旦面临松弛和解体的危机，将军的权力和权威立即丧失，封建统治者的不满集中于幕府的"失政"，将军不得不自发地奉还大政。参见远山茂树《明治维新史的前提》（历史学研究会编《明治维新史研究讲座1》所载）和远山茂树著《明治维新和现代》（岩波新书）152页。

⑩ 参见小岛晋治《农民与革命》（《中国文化丛书8·文化史》所收），渡边惇《清末哥老会的成立》，东京教育大学亚洲史研究会编《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所收）'酒井忠夫《现代中国的秘密结社》，（《近代中国研究》所收），铃木中正著《中国史上的宗教与革命》。关于根据易姓革命论的君主观的实例，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西田太一郎译《东洋文库》），秘密将其出版，鼓吹民权、共和之说的变法派的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例如谭嗣同的《仁学》（《中国古典文学大系·清末民初政治评论集》所载），浙江的会党龙华会的《龙华会章程》（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辛亥革命的思想》（《筑摩丛书》所收）。

⑪ 参照《民众宗教的思想》、《民众运动的思想》（均为《日本思想大系》所收的解说），芳贺登著《革世思想》。关于日本没有象中国那样的农民战争的理由，不应仅求之于会党之存在与否和民众宗教本来面貌的不同，村落结构、农民分化和商业＝市场结构的不同是基本的。在中国有离农无产者化和流民、游民化的庞大阶层，这和幕府末期的半无产者阶层大都留在乡村相对比，是有其特征的。

⑫ 《岩仓公实记》中卷712页。幕府为何以"自消自灭"的形式垮台，参看注⑨。

⑬ 都是1868、1869年岩仓具视的话。《岩仓公实记》中卷457、716页。

⑭ 1871年10月（阳历）大尝祭祝宴时，荷兰公使劝告要政权归一，"务必给人民以自主之权，注意教导化育人民之事，认为岩仓大使的派遣说明"其目标已定，走向开化"而表示欢迎之意（《岩仓公实记》中卷981页）。由此可知天皇政府在什么任务上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

⑮ 三条太政大臣对岩仓外务卿的咨询（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1.70号）。

⑯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2、488号，同上书第4卷1、173号。

⑰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91号。同书第4卷1、173号。

⑱ 台湾出兵，因有美国先例，被认为是大义名分之一；其次强调的是以保护人民和方今万国广开交际之时保护航海旅客安宁的"万国公法之至理"为根据；虽明知"得不偿失"，却"不问赔偿金额之多寡"，力求出兵"义举"的"名分"得到承认（《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195号）。这件事说明出征之举是在美国指使下策划的，后来由于英美发表局外中立宣言，得不到其军事援助，遂改而停止。然结果由于出征军的独断专行而又付诸实行，这个经过和追随欧美的性质，是明治政府在外交思想上主张正统性的表现。这时日本外交的从属性也受到清政府的批判。1872年，日本考虑欧美诸国对于上一年签订的日清修好条规的意见，要求进行修改。对此清政府提出反驳说："这莫非只是由于害怕外国评论而提起的吗？在我国，对此条也不是没有外评的，然而我惟以保持十八省的全局，有自主的特权为宗旨，何待他论"（同上书第5卷122号）。

⑲ 松方正义在《劝农要旨》(1879年)中批判了政府干与的劝业政策，指出"以政府所期望者课之于人民，从而促其成功……或以启人民之蒙昧为政府之任务，诸如政府着手各种民间企业，好事贪功，反而挫折人民自主独立之气势，养成百事依赖政府之风习，或妨害民间营业之利，致使国内生产力大为减退，其弊害不可得而测"（《明治前期财政经济史料集成》第1卷524页）。

⑳ 1871年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同少辅河村纯义、同西乡从道的《军备意见书》可以说是征兵制度的先驱意见，其中说"当北门之强敌日益迫近之秋"，不仅为了从前镇压内乱的目的，而且出之于防备俄国的对外目的而强调军备，以欧洲军制为模范，并在政治上要军政优先等等，这些话都是值得注意的（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43页）。再如，山县主张从财产多的人中优先征兵，同样主张征兵制的兵部权大丞谷干城主张当前应先士族而后平民。尽管如此，而所制定的现行免役规定却和这些意见截然不同（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论》上卷237、235页），这大概是由于地税实际上具有继承封建年贡的性质所制约的。

㉑ 1878(明治11)年7月，摩莱在东京府下公学的视察报告（《文部省第六年报附录》18页）。又如1877年9—11月视察新潟、长野两县的文部少辅神田孝平，在报告中，关于师范学校制定的教则明知不符合实际情况，却在所有地区一律强制实施的情况说，"教则初出，人民多有不服。只因是政府的成法，谕以不得违背，人民才不得已而奉行。今已经过若干岁月，虽然似乎了解了教则的便益，但一旦得知县官、教员可以随意增减，恐将群起议论教则之可否，反动之势恐将不复遵守它了"，这是根据县官和教员的话记录的（《文部省第五年报附录第一》13页）。这是了解以统一和强制为特色的文明开化政策是用来贯彻中央政府权威而发挥作用的史料。

㉒ 福泽谕吉著《文明论概略》(岩波文库)213页。1869年公布职员令和官位对照表，授与高级官僚相当于旧大名的高级位阶，并且各自选称王朝时代那样的源、平、藤、桔等姓氏而贵族化了。接着在1871年规定十五等官，严格区别了敕任、奏任和判任。

㉓ 加藤弘藏(弘之)向公议所提《废除非人，秽多建议》(《明治文化全集·宪政篇》142页)。这和以1872年的玛丽亚·鲁斯号事件为契机，从对欧美的体面出发，禁止人身买卖和娼妓的典身一事，属于同样性质。此外，正象同发布解放令有直接关系的民部省建言书中所说的那样，这一措施既与东京、大阪设立劝业局制造靴鞋、马具、牛乳、干酪的振兴产业政策有关(小早川欣吾著《明治法制史论·公法之部》上卷139页)；另方面由于废除差别称呼，把迄今为止受差别待遇的部落民所享有的处理死牛马的独占权也废除了，这是为了把发展军用洋式皮革业移交给同新政府相勾结的特权商人、(三井组 西村胜三、后来的藤田组、大仓组)手里的一种措施(皮革产业沿革史编集委员会编《皮革产业沿革史》上卷173页)。总之，很明显，这不能说是单纯的取消身分制。关于"解放令"的意义，参照部落问题研究所编《部落的历史和解放运动》。

㉔ 区制是和1871年5月(阳历，以下同)的户籍法一起，作为办理户籍事务的区域而设置的，其所以作为一般地方行政上的区域而制度化了，是因为1872年5月的太政官布告(117号)决定废除过去一直办理行政事务的"庄屋"、"名主"、"年寄"的缘故。随后，同年11月在大区之下设立的小区，也得到了法制上的承认。参照龟卦川浩著《明治地方自治制度成立过程》24页。

㉕ 参照三重县令向内务卿提出的报告(大江志乃夫著《明治国家的成立》214页)。又，木户田四郎《维新期的农民暴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2》所收)。

第一章　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修改施政方针的摸索

颁布三项新法

1878(明治11)年5月，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乘马车进宫，途中被刺而死。刺客是自由民权派的石川县士族岛田一郎等六人。他们在“斩奸书”中列举堵塞公议，压制民权，视政治为私物，排斥慷慨忠义之士，猜忌忧国敌忾之徒，酿成内乱，遗误外交之道，丧失国权等罪状，谴责了大久保的专横和失政。这是士族民权派的典型主张，是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在野士族群众借欧美式的自由民权思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大久保早在上一年镇压西南叛乱时，就考虑修改和重新制定施政方针。在临死的两个月之前，曾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提出了“关于普遍殖产与对华族、士族授产的请示”和“申请修改地方体制等”两个建议。①

前者是拿出六百万日元的经费，贷给国有土地，创办开垦、畜牧、纺织和其他工业的计划，主要目的在于救济那些没有恒产而“一向郁愤不满”的士族生活。根据这个建议，政府在5月制定了“创办实业的公债证券发行条例”，将一千万日元兴业基金的一半以上贷给士族的各种事业。以此为动力，后来又用劝业资本金、劝业委托金等名义投入士族授产事业的经费竟达到一亿日元以上。②政府想让士族从事开垦，使其既成为地主，又成为能致力于增进出口、遏制进口这一国家目的——工业近代化的旗手，以便使他们脱离反政府运动。如前所述，此外还对华族给以优异的保护，除1877年

设立第十五银行外，还让他们投资于确实有利可图的铁路、银行、海运、工业等企业或公债，务使他们的财产得到稳定的增殖。

大久保晚年对直接引进欧美文化的政策进行了反省，说：不过是移植了“欧亚（应为欧美——引用者）的皮毛”，“不知表面装潢远远超过了实力，可以说铺张过份”③。放弃解放人民使之自由、平等这种“表面装潢”，使政权变成专为拥护华族和士族利益的机构，于是就象下述那样，尊重传统的村落秩序并以此为依据，这就是所谓转换政策的要点的一个侧面。

第二个建议有关地方制度改革的意见，经过第二次地方官会议和元老院的审议，在他死后的7月，颁布郡区町村编制法、地方税规则和府县会规则等三项新法，得到了实现。

郡区町村编制法是，废除废藩置县后设置的统一行政区划的大区小区制，改成郡、区（城市）、町、村系统，以尊重“固有习惯”为标榜，承认町村具有“居民社会独立区划”的性质。至于府县和町村的中间单位郡的郡长，则给以监督町村的强大权限，由官方选任；而町村首长的户长，则尽可能由居民公选。这是为了把地方居民对于町村——传统社会秩序的首长的自发性的服从，用到中央行政向地方渗透的目的上去。④

地方税规则是把原来的府县税、民费等错综复杂的地方财政明确地分为府县财政和区町村财政，前者由地方税开支，后者由协商费支付。而地方税共分为：（1）地税的五分之一以内，（2）营业税和杂税，（3）门户捐等三种；并规定了由此开支的费用项目；但是，这时原来应由国库负担的项目（例如警察费，河港、道路、堤防、桥梁费、郡区厅舍建设费等）划归府县财政负担了，这就给町村财政带来影响，压迫了地方财政。

府县会规则中规定召开府县会，讨论通过应由地方税开支的经费预算和地方税征收方法。其目的在于希望顺利地征收曾是人

民争论焦点的地方税，这是政府委员在元老院审议时公开说出的。[5] 府县会议员的被选举权限于年满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缴纳地税十日元以上者；选举权则限于年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6]，缴纳地税五日元以上者[7]。府县会议的权限受到严格限制，既没有议案的提案权，而会议通过的事项在实施时还必须经过府知事和县令的许可，而且会议的讨论如果被认为妨碍国家安宁或违犯法律和规则时，府知事和县令可令其暂时休会，然后请求内务卿的指示，内务卿据此得以命令其闭会或解散。根据此府县会规则，从1879（明治12）年到1881（明治14）年，全部府县都设立了府县会。有选举权的人共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为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接着还逐渐地召开了区町村会，而1880（明治13）年4月公布的区町村会法，一方面是为了培植它，另方面也是为了控制它。

对于三项新法，在制定者的意图中含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因素。第一是，象尊重旧惯例这种口实所表示的那样，对中央集权和文明开化政策施行过火而加以纠正的保守化意图。第二是，对反对修改地税暴动所代表的民众动向和下述的自由民权派要求设立民会的让步和限制。它承认了早在幕藩制下就有的町村居民集会的既得权力，对以土地所有者为中心的地区共同体的有势力者豪农虽有限制也给了一定的参政权，为将来采用立宪制做了准备。[8] 第三是，作为废藩置县以来一贯采取的中央集权官僚统治体制形成的一个环节，确定了"地方自治"的地位，以此来使占地方费总额达百分之七十的国政委任事务费[9] 的府县财政和町村财政得以确立。

教育令及其修改

施政方针的修改和重新制定，是在还没有确定开化和保守、采用立宪制和加强官僚统治相结合的方向，而向这方面的摸索还在

摇摆和错综的情况下试行的，这是1878—1881年这一时期的特色。这一点在教育政策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天皇在巡视地方中视察学校的结果，1879年8月将"教学大旨"和"小学条目二件"，作为"圣旨"传达给重臣和文教当局⑩。其内容是：我国教育的根本精神以讲授仁义忠孝的道德为第一，指责最近的弊害主要在于竞尚洋风，小学教育必须对实际生活有用，不能只教一些高尚的东西。这是对学制基调的文明开化主义所进行的正面攻击。

可是在9月中实行的学制改革，却和教学大旨的路线完全不同，即重新发布教育令，对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学制大加修改。在教育令中，废除了大学区、中学区、小学区的学区制，改为一个町村或几个町村联合设立小学校，校务则由町村居民选举的学务委员管理。学制本来是下等小学和上等小学合在一起的八年制义务教育，但考虑到实行困难的实际情况，加以果断的削减，改为最低以十六个月（四年的课程）为义务，至于是否征收学费则改为交由地方决定。这次修改是从效仿法国教育制度的中央统制主义转变为美国式的地方分权主义，是三项新法对新地方制度的适应，也是对于人民不满和反抗学制的划一主义以及强制就学方针的让步。

不过，对教育令的非难，立即从天皇的近臣和地方官中掀了起来。侍讲元田永孚顽强主张通过天皇对教育的干预来恢复儒教道德；在1880年2月的地方官会议上，出现了政府缓和控制造成就学率降低和设立小学因而停顿的意见，京都府知事槇村正直和山梨县令藤村紫朗联名向三条太政大臣提出修改教育令的建议。于是教育政策的倒退以"圣旨"为支柱而开始，9月，文部省认为现行的小学教科书中有四十种不合适，勒令禁止使用。其中包括福泽谕吉、箕作麟祥、加藤弘之、中村敬宇和津田真道等被视为领导文明开化的洋学者的著书。随后在12月，实行仅仅一年多的教育令被修改了，废除了学务委员的选举制，小学校的教则要根据文部卿

发出的纲领由府知事和县令来编制，并经文部卿认可等，加强了政府的领导和监督。

第二年的5月发布的小学校教则纲领，最重视的是修身，其次是历史，规定"要养成尊王爱国的志气"，还制定了小学校教员须知和学校教员品行检定规则，对教员的思想和教育方针进行严格的控制。[11]而且值得注目的是，小学校教则纲领和小学校教员须知，在公布之前得到天皇的预览。这是天皇对教育的直接干预。[12]

天皇亲政和整顿军制

尽管施政的试行一再发生错误，不，正是因为一再错误，才以极大的努力向国民中间渗透天皇的权威，实行了空前绝后的一次接一次的地方巡幸。以1876年6月从东北到函馆的五十天巡幸为开端，实行了诸如1877年1月到关西，1878年8月经信州到北陆、京都、东海道的七十天，1880年6月经甲府、松本、木曾路到名古屋和京都的四十天，1881年7月再到东北和北海道的七十天的一系列大旅行。[13]其巡幸情况，例如1878年的一次旅行，带领以岩仓右大臣、大隈和井上两参议等政府首脑为首的三百名随员，还加上担任警卫的四百名警察。路险马车无法通行时，由人夫用轿抬着天皇走，在各地听取了县官、法官、校长们的汇报，视察了产业和教育的现场，表彰了孝子节妇。这些巡幸密切了地方官吏、户长、豪农等地方领导者同天皇之间的关系，使人民知道了天皇的存在，起到了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抗奠定天皇制基础的作用。[14]

天皇的地方巡幸，是为了加强官僚统治的软弱体制和天皇积极干预政治互为表里的。早在1877年8月，在宫内设置辅佐天皇的侍补，由保守派的吉井友实、土方久元、元田永孚等人充任。这个制度是鉴于士族叛乱和自由民权运动，为确立天皇亲政的名义，由伊藤博文和大久保利通提议而建立的[15]。于是将太政官移至宫

中，规定内阁的机要事务由御前会议来决定。大久保死后，侍补要求实行天皇亲政的声浪更加强烈，其意图在于批判文明开化政策的天皇侧近保守派集团参与政治，并插手于参议的人选。因此，同主张宫中府中有别，维护大臣、参议的辅弼体制的内阁发生了冲突。于是，1879 年 10 月废除了侍补制度，侧近集团后退了一步，但政府对天皇发挥政治机能的期待并没有改变，此后仍然由大臣一名每日、参议一人定日晋宫值勤，听取天皇的指示。

天皇的权力以上述的教育和下文的军队统率为据点，在整个政治上得到了加强。1878年 12 月，废除陆军省的参谋局，设立参谋本部，把掌管用兵作战的军令与军政分开，作为独立机构直属于天皇，并加以扩充。这一年，桂太郎由德国回来，由他筹划引进德国的军制，其成果之一就是设置参谋本部。随后第一任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于 1879到1880 年派桂等十几名军官分别以驻在武官和语文研究生的身份前往中国，并将其侦察结果写成《邻邦兵备略》一书出版。书中主张，为了对抗清国陆军，扩张军备乃当务之急。山县在向天皇呈上此书的奏章中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利始可论，交际平行（对外交往平等——引用者）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提出了强兵优先于一切政治课题的军国主义主张⑲。这和七十年代前半的征韩论的军国主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使立宪制成为附庸而加以利用的近代军国主义，由军部的领导者率先提了出来。当然，这个方针形成施政的根本是几年以后的事，这时期的对外政策，仍然保存上一时期的性质，这表现在冲绳归属的经过中。

冲绳的归属

1875（明治 8 ）年 5 月，根据千岛、库页岛交换条约，规定千岛为日本领土，第二年的10月，以向各国公使通告的形式决定小笠原

群岛为日本领土，确定了日本的最后国境，1879（明治 12）年 4 月，建立了冲绳县制。

冲绳在江户时代一方面是萨摩藩的"附庸国"，另一方面，琉球国王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向清朝贡，但在幕府末期，又以独立国的姿态同法国、美国、荷兰缔结了通商友好条约。然而日本政府为了以冲绳宫古岛岛民遇难而问罪为理由，作为掀起征台战役的前提，有必要明确冲绳的对日归属。于是在1872（明治 5）年10月（阳历）改琉球王国为琉球藩，将它同外国的交往事务移归外务省管辖，随后在征台战役之后的 1875 年 5 月，命令琉球藩王晋京，日本军队驻扎，断绝同清朝的朝贡关系，采用明治年号，施行日本刑法，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对此，琉球王朝不同意断绝同中国的传统关系，一再请愿，并向清政府以及英国、荷兰、美国公使请求援助，进行抵抗。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采取强硬措施，1879 年 3 月，内务大书记官松田道之率警察一百六十人，步兵四百名进入首里城，甚至决心用武力拘禁藩王，宣布了废藩置县。琉球王朝的官吏和士族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松田以严厉的态度进行了镇压。所谓拯救受苛政折磨的冲绳人民的苦难，是政府用来"处分琉球"的大义名分（即要人民对天皇尽忠、守臣节。——译者），以期冲绳人民支持这种强硬措施⑰。

冲绳不论从人种和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说，或者从过去的经济关系来看，同日本实行民族的统一，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这个统一是在冲绳居民的自主要求还没成熟之下，以武力的强制手段实行的；而且主要是在作为士族对策的征台之役背后的征韩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对清政策的见地之下设想和实现的⑱。由下述事实可以说明政府不是以日本人民和冲绳居民的民族一体化为最高原则而实行了"琉球处分"的。即 1879 年 8 月，当美国前总统格兰德在漫游世界的途中经过东京，根据中国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

居间调停，提出分割冲绳建议时，日本政府提议将冲绳的宫古和八重山岛让给中国，以此为交换条件，修改同中国的条约，加进与欧美同等的最惠国条款。这次交涉由于清政府内部出现不同意见而以失败告终。日本的修改条约提案本是出于企图排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总之，冲绳成了统治朝鲜政策的牺牲，陷于被分割的命运⑲。而政府对冲绳县政的方针，直到甲午战争时为止，采取了容忍旧统治阶层特权、保持旧惯例的政策，这就使冲绳的落后性扩大并固定下来。

① 《大久保利通文书》9，39，92页。

② 参照吉川秀造著《士族授产的研究》，石冢裕道著《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大久保计划由迁移士族来开垦福岛县安积原野的四千町步土地和开凿附属的安积疏水渠，这个计划在他死后实现了。和政府这些为士族授产的开垦事业相配合，旧大名在1878年以后买到了北海道的官有地，扶植旧家臣团迁移开垦，后来随着开拓的进展，把大部分土地分给了旧家臣。又，1879年以后，国营开垦预定地的枥木县那须野原，也分给了萨长系的最高级官僚（后来的新华族），计划建立大规模的直营农场（实际的开拓是在1887年以后）。不过，直到1880年代前半期为止，皇室、旧大名和政商等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并不占统治地位。这时的开垦作为振兴产业政策的一环，是以对穷困士族的授产事业为主的，这也最后在1886（明治19）年停止对移居北海道士族的保护，放弃了士族地主化的努力（参见旗手勋著《日本大农场的发生和发展》）。

③ 1876年12月行政改革建议书（《大久保利通文书》7，447页）。还有，大久保被刺的当天，对福岛县令山吉盛典说，对华族和士族"不能不给以特殊保护，这不应拘泥于理论"（同上书9，166页）。

④ 作为代替幕藩制下地区统治方式的维新政府新制度的大区、小区，虽然和以前的町村无关，是统一设置的，但实际上不能无视町村的机能。1876年10月，各区町村的"金谷公借"、共有物处理、土木事业施工规则，和区一起，町村是财产权的主体这个法律地位，也得到了承认。即当这些地方团体公借金谷，买卖共有土地房屋、兴建土木工程时，规定必须取得正副区户长以及各町村内不动产所有者或由他们选出的代表各十分之六以上的同意。这意味着一度在法制上采取了忽视原则的町村的团体性，重新得到法律承认．可以视为郡区町村编制法的先驱。此外，关于三项新法可参照龟卦川浩著《明治地方自治制度成立过程》，大岛太郎《地方制度》（《日本近代法发达史5》所收），大石嘉一郎《地方自治》（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所收），福岛正夫、德田良志《明治初年的町村会》（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地税改正和地方自治制》所收）。

⑤ 政府委员松田道之说："对于非设立府县会不可的各种原因，愿陈述其最主要之点。府县设置以来，百事虽稍就绪，唯征收民费尚无确定之法，往往招致民间物议

（中略）。无论征收民费或征收地方税，如无其法，地方官也将几乎苦于无法施行。如设此法，不仅便于地方官之征收，而且人民不致产生疑惑，无群情激昂之烦扰”（《元老院会议笔记》前期第5卷108页）。

⑥ 关于府县会议员选举权，在地方官会议上出现了女子也应给与选举权（广岛县少书记官平山静彦），和对年满三十岁以上的女户主应当承认有选举权（岩手县大书记官冈部纲记）的意见，但由于政府委员提出女性智能低，理应服从丈夫的反对意见而被否决（龟卦川同上书57页）。在民会中有承认女户主选举权的实例（如高知县），府县会规则是倒退了。

⑦ 缴纳地税五日元（地价为二百日元）者，如一反的地价为四十日元（各地不同），是下农中的上层，缴纳十日元（地价四百日元）地税者，是拥有一町步水旱田者，即自耕农的上层。和后来制定的国会议员的选举资格（直接国税十五日元以上）相比，其限制所以较低，是由于地方税的大众课税性质使然。

⑧ 这既是立宪制的准备，也是对在野的立宪制要求的控制。最初政府想在府县规则中加进“不得泛及大政”这样一句，但认为这个限制乃理所当然，结果没有加进去。此外关于以财产限制被选举权，政府作了如下的说明，即“目前期望开设议会的人虽与日俱增，但当民智未开之际，如财产少者亦可当选，则议员将被误认为徒事议论的人，必将选出象现在这样的代表，或选出架空的民权论者那样的人。果真如此，就不能说没有认为抵抗地方官就是民权，登上讲坛喋喋不休地议论其措施，而扰乱人心的人。”（前引《元老院会议笔记》137、48页）。此外，参照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

⑨ 如把1873（明治6）年到1877（明治10）年的五年平均一下，民费总额（全部府县区町村的）中的各项费用的比率是，行政机关费百分之三十三，国税征收费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土木费百分之二十一点三，教育费百分之十点七（以下略），国政委任事务费占民费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藤田武夫著《日本地方财政制度的成立》44页）。

⑩ 教学大旨是任侍补职的儒学者元田永孚整理的，强烈地反映出他的意见。对此伊藤博文上奏“教育议”，主张道德不应由政府管制，元田更以“教育议附议”进行反驳说，“圣上陛下有为君为师的天职”（元田永孚《古稀之记》《元田永孚文书》第1卷所收，《伊藤博文传》中卷）。这个对立被认为是“明治藩阀政府内部开明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武田清子、中内敏夫《天皇制教育的体制化》岩波讲座《现代教育学》5所收），应当说这是极其相对的而且是流动的。元田确实认为日本的立宪制必须是“君主亲裁的立宪政体”（1879年），在他的宪法草案“国宪大纲”中载有“天皇统全国政教之权”这样条款，这和伊藤的宪法意见有所不同，但1881年以后，两者的见解迅速接近，1890（明治23）年由于发布教育敕语，元田的意图得到了实现。

⑪ 在小学校教员须知中，教员的任务定为“振起尊王爱国的志气，使风俗淳美，民生富厚，以增进国家之安宁福祉”，并规定“为教员者，常养宽宏之量，持中正之见，就中涉及政治与宗教不得有执拗矫激之言论”。此外关于学校教员品行检定规则的宗旨，文部卿福冈孝弟解释时说，“性情暴戾，言论诡激，恐有误学生之教导”者不得任教员（《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2卷260、228页）。

⑫ 天皇对于文部省的小学校教则纲领原案中的历史部分提出意见说，战争的教材多，这有使民思乱之虑，应使其兼顾古时王政时代所举的治绩，结果从新改写了（《明治天皇纪》第5，340页。海后宗臣著《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110、112页）。

⑬ 巡幸的记录参照《明治文化全集·皇室篇》、《明治天皇纪》第3、4、5。

⑭ 地方巡幸对于不知有天皇存在的民众来说，在使其认识天皇的权威上有很大效果。社会主义者木下尚江少年时在松本亲眼看见1880年的巡幸，在其自传《忏悔》(1906年)中就当时的情况记述如下，"……在雨中从十日里、二十日里的山中，背着婴儿，扶着老人，互相招呼，出来'参拜'天皇。卤簿过完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豁出弄脏了衣服在泥中争抢起来。他们拚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的和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他们之间普遍地流传着，'如果拿到天子走过的砂石，则家里安宁、五谷丰登'这样的信仰"。(《木下尚江著作集》第5卷76页)。对于代替旧藩主的新"主君"的卤簿，进行就地跪拜迎送，这种光景是从对待本愿寺法主"巡化"那样的"活佛"、"活神仙"的神秘威力的宗教归依中产生出来的，从一点来说，并不是新玩意儿。

⑮ 元田永孚《还历之记》(《元田永孚文书》第1卷所收)。《明治天皇纪》第4，245页。渡边昭夫《侍补制度和"天皇亲政"运动》，同《天皇制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天皇亲政"的思想和运动》(《历史学研究》第252、254号)。关于侍补的作用，侍补之一的佐佐木高行说："昔之为天子者，信如现在这样就可以称明君了，今者须从对外交往上考虑其形势，而国内的情况，乃是神武帝以来空前未闻的民权之议论已成为世之公论，况立宪政体的敕令既已宣布(指1875年逐渐树立宪制的诏敕——引者)，建立议院已为期不远，圣虑如不全注于政治，即内阁的议事也断难决定。因已有迟缓之感，非全体同人迅速考虑充分对策，尽辅佐之任，不能安心。"据说这取得了全体侍补的同意（津田茂麿著《明治圣上与臣高行》406页)。他们对于维持君主制的危惧，由此可以推测出来。

⑯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93页。还可参照《陆军省沿革史》(《明治文化全集·军事篇》所收)，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论》上卷。

⑰ 冲绳归属日本的史料，见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12卷，《琉球处分》(《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4卷外交篇)，《冲绳县史》12，冲绳通史则有比嘉春潮著《冲绳历史》。

⑱ 关于《琉球处分》的评价，战前伊波普猷的"琉球处置是一种奴隶解放"(1914年新里惠二编《冲绳文化论丛1、历史篇》再录)，由它代表的见解很占优势，但战后井上清认为琉球是"自古以来的独立国"，认为用武力将其合并是"侵略的统一"(《条约改正》岩波新书30页)。对此，新里惠二著《冲绳史考》中重视冲绳民众对萨摩统治和琉球王朝的反抗，反对"侵略"说法，认为是"自上而下的民族统一"，金城正笃指出同外交问题上的关系是主要的侧面，说是"由于明治政府单方权力的恣意贯彻而实现的"(《"琉球处分"与民族统一问题》《史林》50卷1号，新里编前引书再录)。此外，关于冲绳的差别地位应当在考察继续加强的日本帝国主义形成期的问题中来予以评价一点，可参照远山茂树《日本近代史上冲绳的位置》(《历史学研究》382号)。

⑲ 关于冲绳分岛问题的外交经过，见藤村道生《琉球分岛交涉和对亚洲政策的转变》(《历史学研究》373号)及前引金城论文。

第二节　开设国会运动的高涨

爱国社的重建和国会期成同盟

西南战役方酣的1877（明治10）年6月，土佐的立志社向住在京都行宫的天皇提出了开设民选议会和建立立宪政体的建议。在论述政府内政外交的八条失政的最后一条“外交干涉处分的错误”中论及台湾、朝鲜、库页岛问题和修订条约问题，虽然还有士族的国权思想色彩的残余，但关于内政却提出了人民对于修改地税、征兵令、振兴产业政策的不满，开始显示出脱离在野士族反政府运动的框框。随后立志社于1878年4月决定重建自由民权政社的全国联络组织爱国社（1875年以来处于消灭状态），为促其实现向西部日本派出宣传员。于是1878年9月，在大阪召开了爱国社重建大会，参加者只有近畿以西的政治社团，其士族出身者代表的思想，同主张保卫身体和财产，扩充国民的富力，充实地方的“爱国社重建宗旨书”的思想，还有很大的距离①。

第二年3月，爱国社第二次大会，出席的政治社团增加到十八县二十一社，为了向关东、东北扩大组织，提议在东京设立爱国社分社（但被否决），决定发行报纸等，出现了新的气象②。同年11月的第三次大会，包括东日本在内增加了五个政社，尤其福岛县的石阳社、三师社（代表为河野广中）、福井县的自乡社（代表为杉田定一）等以豪农为中心的强有力的政社参加了，以及在议事中决定来年3月的大会讨论和通过向天皇提出的开设国会请愿书，并批准了从上次会议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东京分社的设立，是一次具有划时代内容的集会③。

随后，以加盟政社员全国宣传的成果为基础，1880（明治13）年3月，除加盟的二十七个政社之外，加上未加盟的各地有志团体

（约三十五个），共二府二十二县八万七千余人④的代表一百一十四名聚集在大阪，召开了第四次大会。据《自由党史》载，把爱国社改名为国会期成同盟⑤，通过了同盟章程。在章程中制定了值得注目的运动方针，即在向天皇提出请愿书之后，直到国会开设为止，无论经过几年，同盟也不解散；在东京置常设委员；请愿书得到批准时，向政府提出制定国会宪法的全国代表选出方法和国会宪法的建议，并确定由片冈健吉和河野广中两代表向天皇提出全国各地签名者代表联名的"请求批准开设国会请愿书"。请愿书的内容是，主张明治维新的各种改革必然导致立宪政体的建立，并论述了人民的民主自由精神乃是国家独立、国权伸张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指出由于修改了地税，国土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再不属于政府私有，主张征税一定要和全国人民共同商议，提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则。

在这前后，全国各地的民权派竞相发动开设国会的请愿和建议的运动。早在1880年1月，冈山县的有志者发表"告同胞兄弟"的檄文，并向元老院提出了请愿书；福冈共爱会也在这个月里进行请愿，要求修改条约和开设国会，在国会期成同盟的请愿书提出以后，这种活动更加活跃，仅现在知道的就有五十多件⑥。各府县的代表委员来到东京，要求会见大臣，热心开展了运动，但不是被驳回就是没有得到回答。

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第二次大会首次在东京召开。参加者中关东、东北、北九州的比重增加，反映运动正在扩大。⑦决定来年10月召开下次大会时，各政社要带来宪法希望草案。这个运动的方针，不单是要求开设国会，并意味着民权思想向"自由主义的国会"方向前进的深化⑧。与此同时以各地区和政社代表的名义通过了蒙难者援护法，用平素募集的捐款来救护因运动而坐牢的人，并且表明了同政府利用4月公布的集会条例的镇压进行斗

争的决心[9]。

豪农的民权

从爱国社的重建到国会期成同盟第二次大会止，只有二年多。在这期间，自由民权运动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在这样发展的前提下，和民会、府县会结合的地方政社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1875年6月的第一次地方官会议上，以议论公选民会的可否为契机，自由民权派主张作为国会开设的前提公选民会，并在部分府县得到实现[10]。可是就在这时，一方面希望以此启发人民的政治意识，另方面企图安抚民心使之协助征收租税，在这一点上，开明派官僚和地方豪农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士族民权派的政社和以区户长阶层、豪农阶层为中心的政社，利用这样的地方官的施政，或者通过推动它的施政，扩张了势力。但是一度设立了民会，并在这里建立起豪农阶层走上政治舞台的据点，在民众的斗争力量高涨的条件下，就会象远州民会那样，成为修改地税斗争的中心，有可能转化为被称作"人民的议会"那样的人民抵抗组织[11]。

(8)

政府对三项新法下的府县会期待发挥圆滑和加强官僚统治的机能，已如前述；但这也和民会的情况一样，造成"民情为之一变"的机会[12]，由于民权派的推动和它的实力，已经具有牵制官僚统治的力量了。在福岛县会，由于自由民权派议员的活动，大幅度地削减了预算，即1879年度削减了百分之四十点八，1880年度百分之二十一点七，1881年度百分之二十点三。土木费、户长和郡吏的薪金、警察费等国政委任事务费性质的开支项目是主要的削减对象，这是根据地方自治的要求的[13]。于是自由民权政社以这种县会活动为背景扩大了组织。这种趋势，由于各府县会议员为争取开设国会取得联系而得到了促进。1879年6月，千叶县的民权派樱井静向各府县会议长呼吁，要求全国府县会议员联合起来，在东京开会以

便通过开设国会的法案，许多报纸登载了这个呼吁，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个计划由于集会条例的公布虽未得到实现，但却产生了冈山县会发起的结成山阳道各县县会议员联合会的呼吁，以及一府九县的府县会议员联合向元老院提出开设国会的建议⑭。另方面，和县令进行了激烈斗争的三重县会于1880年6月提出"各地方交换县会决议记录的建议"⑮，这说明试图把县会斗争联合起来，尤其关于事实上等于增税的备荒储蓄法案（1880年6月公布），大分、和歌山、滋贺、石川、静冈、千叶、神奈川、茨城、福岛等县的县会一齐起来进行了斗争。政府对此以限制府县会的权限来对抗，1881年2月，决定府县会对于法律上应当讨论决定的法案不加讨论决定时，府知事和县令可呈请内务卿取得批准付诸实行。

地方民会和府县会的斗争，形成把士族中心的民权运动转化为以广泛的农民各阶层为背景的、以户长、豪农阶层为中心的力量了。这时修改地税实施的结果已经具体化了，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渗透到各个农村和农民各阶层的生活中，同时西南战役后通货膨胀的加剧使农产物价格飞涨，这使地主、富农和中农从事生产者的商业活动的热情高涨起来，使他们的眼界扩大到了全国的政治、经济领域。民权派抓住农民负担的地税问题和征兵问题积极进行了宣传⑯。农民对于国税和地方税的共议权寄托希望于开设国会，要求府县会议讨论此事，如果根据地税修改条例补充第八章的规定，地价要在六年后比照买卖价格加以修改，那末在1880年地税额估计当然要提高，而自由民权的压力成功地使地价再冻结五年⑰。不过，政府尽管在这里向农民卖弄了仁慈，1880年11月却把地方税占地税的五分之一以内改为占三分之一以内，打开了增税的途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分化的进展，促进了农村共同体的解体，但还没有达到决定性的崩溃地步；在地主、豪农同贫农间的阶级对立尚未达到激化的地带，自由民权运动发展了。

农村共同体的有力者地主、豪农，一方面对于中下层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怀有敏锐的危机感，另方面以这种不满为背景，向政府要求对地方行政、国政的发言权和政治的改革⑱。他们成了农事改良团体的领导者，谋求结成工商业的同业组织，组织经济和政治的学习小组，创办或参加自由民权政社⑲。因此，他们在农村共同体及其联合的地区社会的领导权得到了加强。

对开设国会请愿在短期内征得了大量的签名，其条件之一是因为户长和豪农阶层的代表利用了他们在地区社会的控制力量，把居民集聚于一室，征取盖章，或者取得一揽子委任而联合签名的情况可能也不少⑳；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即签名者的意志是自主的，对于代表的行动预先明确写在委任书上，按照地区的不同，实际上可能是多种多样的㉑。总之，包括中农、贫农在内的农民各阶层拥有超出村郡范围的、对于整个国家政治和国家机构的发言机会，其影响是很大的，开始出现了农民以自由民权的理想来对自己的意识和行动进行理论武装的动向。㉒

民权派的宪法草案

根据1880年11月的国会期成同盟大会决议，各地的民权派召开宪法研究会，草拟了宪法草案㉓。由民间起草的宪法草案（私拟宪法）中，属于民权派的，就现在所知有近二十篇之多㉔。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嘤鸣社的宪法草案（1879年前后）㉕，（2）交询社的私拟宪法草案（1881年4月），（3）立志社的日本宪法希望草案（1881年9月前后），（4）植木枝盛的日本国国宪草案（1881年8月起草㉖）。

在这些草案中，（1）和（2）传播较广，影响较大。嘤鸣社是沼间守一、河津祐之、岛田三郎、末广重恭（铁肠）、田口卯吉（鼎轩）等知识分子团体，发行《嘤鸣杂志》（1879年10月创刊），并通过沼间

主持的《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发表言论。交询社是庆应义塾系统的小幡笃次郎、矢野文雄、中上川彦次郎、藤田茂吉、马场辰猪等人在1881年4月创立的团体，发行了《交询杂志》。这两个宪法草案都是温和主义的，采取二院制和政党内阁制，人权保障是有限制的，立法权是采取了皇帝和国会共有这种妥协的原则立场，但和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议会的权限很大。

（3）和（4）较为急进，采取一院制，人权保障是无条件而且详细的，承认抵抗权和革命权，特别是（4），是以主张地方自治和使日本成为联邦国家为特色的[27]。至于立法权则由属于日本人民全体的人民主权说的立场出发，议会作为控制立法权的主要部分的机构，权限极大。然而就连在这一点上最为彻底的（4），也是皇帝握有行政权和兵权，对议会的决定可以要求重新审议，并且没有达到明确提出主权在民原则的程度。[28]

而（1）、（2）系统的渐进主义的宪法意见是当时的民权派思想的主流，除政党内阁制和议会的修改宪法议决权各点之外，和下述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所采取的原则，在性质上并不是对立的。（3）、（4）这样急进的宪法意见，莫如说是例外的，在严厉的取缔言论的情况下影响力很小。尽管如此，自由民权派没有等待政府的宪法起草，就自主地研究和草成了独自的宪法草案，这种努力是可贵的。通过这一工作，他们的政治思想当然有了飞跃的进步。可是它的成果只限于同起草有关的部分先觉者，如后所述，还没有充分时间看到这些宪法的设想在民权派群众的政治意识中扎下根，宪法的研究和起草运动就消失了，这对于自由民权运动是个致命的弱点。

① 了解爱国社重建大会的情况的史料，有《爱国社再兴议事录》（《历史评论》86号）和《密侦报告书二篇》（《历史评论》80号、家永三郎著《植木枝盛研究》所收）。还可以参照内藤正中著《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佐贺县的木原义四郎在大会席上发言：

"不同意什么都是民权论，希望把民权二字换成勤王"。对此，板垣退助辩解说："木原是当年的勤王家，是九州有名的人士，如以此人之丹心作为主张民权的心，其功效可盖九州"，竟不顾多数反对，主张让他加入（《密侦报告书二篇》），可见当时自由民权思想的原则还是暧昧不明的。

② 关于第二次大会的史料有《公会决议录》（庄司吉之助著《日本政社政党发达史》所收）。

③ 据《自由党史》（岩波文库本上 264 页）载，福冈的共爱会向大会提出修改条约建议，主张应当遵循国权扩张；对此，立志社提出希望开设国会，后者得到通过。而据此时的《公会决议录》（庄司前引书所收）并没有记载关于建议修改条约的提案和讨论的情况。不过，尽管没向大会提议，而在共爱会中确实有提出这样建议的动向。

④ 下山三郎认为《自由党史》所载的这个数字是不正确的，和东京大学明治新闻杂志文库收藏的小册子以及《纂辑国会建白》所载的数字对照查核，是九万六千九百人。把这个数字和《自由党史》记载的国会期成同盟第二次大会的委托者数，1880 年提出的国会开设建议书、请愿书五十四件的参加者等合起来考虑，推测请愿运动参加者的实数为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名（《自由民权运动——其地区的分布——》《东京经济大学会志》37号）。

⑤ 爱国会与国会期成同盟（也叫国会期成同盟会）的关系不详。早在爱国社第三次大会上，国会请愿书就有应以爱国社的名义提出的意见（以立志社为中心的高知联合社、松山公共社、鸟取共立社等）和不管是否参加爱国社，"而与公众共同行动"的意见（福冈正伦社、越前自乡社、磐城石阳社等）的对立，后者得到通过。根据这种情况，内藤正中认为"并不是爱国社因发展而解体，变成了国会期成同盟会的，而是在爱国社之外，另创立了国会期成同盟会"（前引书 227 页）。

⑥ 向元老院提出的建议（1879 年 12 月—1880 年 2 月）的百分之八十收集在《明治十三年全国国会开设元老院建白书集成》（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明治史料第2集》）中。此外，建白书是由元老院处理的，1876 年 1 月的《建白提出须知》规定其取舍不另告本人。与此相反，请愿书则没有任何规定。对于国会期成同盟的请愿书，太政官命令向元老院提出，而元老院则以并非建白书为理由拒绝受理。1880年 12 月的太政官布告中规定有关一般公益的人民上书，不论以什么名目，全都作为建白书处理，逃避了答复的责任。

⑦ 据《自由党史》载，在这次大会上，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大日本国会期成有志公会（中卷 20 页）。而下山三郎的理解是，有志大会（公会）是包括未参加同盟的团体代表的大会名称，并不是大会以后的组织本身这样称呼（《自由民权运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 3》133 页）。

⑧ 嘤鸣社的草间时福在大会的发言。他进一步主张说："只拘泥于国会的名义而不问是什么主义，就满足于现政府以一纸官定宪法来开设国会，而解散本会吗？"（《国会开设论者密议探闻书》《明治文化全集・杂史篇》180 页）。明确表示了同钦定宪法进行斗争的意志。

⑨ 这次大会讨论的第一个重点是，避免和上次大会期间发布的集会条例的严厉

取缔规定相抵触，改变组织、运动方针呢，还是宁肯冒着危险也要谋求扩大发展呢？第二是要继续请愿开设国会的意见和主张请愿已经没用了，当务之急在于团结地方和培养实力之间的对立，议论陷于纷歧。也还出现了小岛忠里的如下意见，他以“当前最要紧的是培养敢死之士”这种理由支持蒙难者援护法（前引《国会开设论者密议探闻书》)。大会上通过的宪法草案拟成运动和制定蒙难者援护法这两者和大会讨论的争执点有什么关系，是今后的研究课题。

⑩ 关于民会可参照尾佐竹猛《藩议院和地方民会》(《日本宪政史论集》所收），福岛正夫、德田良治《明治初年的町村会》(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地税改正和地方自治制》所收)，大石嘉一郎《地方自治》(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所收)。

⑪ 原口清著《明治前期地方政治史研究》上453页。在松滨县，围绕修改地税问题，面临农民暴动勃发前夕情况的1876年4月，豪农出身的区长冈田良一郎和副区长青山宙平受县令的委托出面斡旋，为了说服农民而提议开设公选民会，结果县令发表开设民会，冈田任当年8月开设的远州国州会的议长。州会成为农民修改地价运动的中心，州会的决定移至小区会审议，加强了农民的团结，形成了支持以请愿委员资格晋京的冈田等人奋斗的力量。此外，关于高知县的民会见家永三郎著《植木枝盛研究》和《高知县史·近代》。关于福岛县的民会则有《福岛县史·政治编》，大石嘉一郎著《日本地方财行政史序说》。关于熊本县的民会见大江志乃夫著《明治国家的成立》。

⑫ 福泽谕吉在《时事大势论》(1882年)中说：以府县会的开会为“民情一变的期限”，“盖府县会的开设决不是由人民促成的，政府也没打算促成它，只不过是朝廷考虑施政上的方便企图利用民议而已。然而从其结果来看，与预期大不相同，开会一举而打开了人民的耳目，成为首次尝到政权甜味的机会，这是事与愿违，诚可谓偶然的事变。”(《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239页)。

⑬ 大石前引书339页。

⑭ 前引《明治十三年全国国会开设元老院建白书集成》8页。关于这个计划的经过参照铃木安藏著《自由民权》141页以下。

⑮ 内藤前引书205页。

⑯ 政府的密探报告说，开设国会的煽动者有如下的论述。“盖国会乃文明各国亲自体验的最好制度。所以如果开设国会，就不许政府浪费国家财富，不许招募无用的军队，全国租税因而减少，决不容怀疑。愚民不知国会为何物，唯喜其减税（下略)”(《明治十三年八月国会愿望之事件侦探概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月报》30号所载)。

⑰ 在审议冻结地价五年法案的元老院会上，议官山口尚芳发言说：“试看，虽尚未至修改地税的期限，而乞求及早修改者，各府县比比皆是。故一旦本按语（指地价不适当时特予修改的但书——引用者)公布，则请愿者纷至官衙，其混乱情况将大有再次出现修改地税之观，而人民则争先群集，废职弃业，徒费资财，卒至危害国家安宁，亦在所难保”(《元老院会议笔记》前期第8卷282页)。

⑱ 户长、豪农阶层具有既可以变成与人民为敌的地方权力者，也可以变成站在人民一方面的领导者的复杂的过渡性质。哪一面占优势呢，这决定于各个时期的形势和本人的态度。还因为当时处于寄生地主制尚未确立的阶段。豪农民权家之一、新潟

县蒲原郡下田乡的西潟为藏是1868年改革世道暴动的领导者（多数的会津民权家是1868年暴动的被袭击者家出身，两者是好的对照），在修改地税时，他曾经作为地主的代表协助县厅，但对于官方的独断措置持批判态度，后来成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参照金原左门《草根民权主义——西潟为藏与新潟自由民权运动》（《明治之群像5·自由与民权》所收）。又，西潟的回忆录《雪月花——西潟为藏回忆录——》（本间洵一、沟口敏麿编），是了解豪农民权家的思想、行动的好史料。户长的公选改为官选是1884年5月。

⑲ 由县议员松泽求策提倡，于1879年11月创办的松本的民权政社奖匡社，是以高知县人坂崎斌的犹兴义塾为基础，除了县议员、户长、町村会议员团体，以松本新闻为中心的记者、长野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员团体外，还有交询社、松本农事协会、东筑摩郡农谈会、生丝制造者的团体友谊社等成员参加（有贺义人著《上条螘司之自由民权运动及其背景》，上条宏之《信州之民权镜——松泽求策与信州民权运动》《明治之群像5·自由与民权》所收）。又据色川大吉的调查，仅南多摩一郡（当时属神奈川县）据说就有十一所自由党私设的教育机关（《新编明治精神史》36页）。这样的学习活动是和政社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着。关于三多摩地方的学习小组和政社，参照色川大吉《明治前期的民权结社和学习运动》（《东京经济大学人文自然科学论集》第21号）以及《町田市史史料集》第8集。

⑳ 试看提到国会期成同盟第一、二次大会的签名者人数（《自由党史》所载）每每有一百人代表，一千五百人代表，三千人代表等的记载，这是否是每个人签名的总计不无疑问。此外奖匡社第二次大会收集了二万八千多委托者的签名，所用的方法是，由发起人分头拜托各町村的户长、议长、教员等有力者，预先将其用意通知给町村居民，在一定日期召集到户长的办事处或学校等处，在发起人临席之下盖章（后藤靖《战后的民权运动的研究》《历史学研究》247号）。还可以参照上条宏之《自由民权运动结社的组织过程及其背景——松本奖匡社的场合——》（《信浓》13卷6号）。又如第二次大会的越前自乡社的情况，有七千零四十一名的代表杉田定一的记载，而杉田家文书中的《各村签名簿》中共有两种：（甲）各村的签名前后参杂，每人字体也不同；（乙）每村以同一笔迹汇总连签。前者大概是利用演说会等形式收集的，后者可能是委托村内特定的有力者收集的；（乙）比（甲）占压倒多数（大槻弘《民权政社的展开过程和国会开设请愿运动》，《大阪经济大学论集》21号，《论集日本历史10·自由民权》再刊）。

㉑ 在对进京的福岛县耶麻郡代表原平藏的委任契约书（1880年11月）中，有二十一个村二百五十八名农民签名，规定了在京逗留日期，往返日数和每日出差费。在京日期如有变更须经委任者同意，并写明除委任状所记事项外受托者不得擅自专断处理其他事项（庄司吉之助著《日本政社政党发达史》151页）。试看有多数人签名的米冈村针生部落，三十七家农户中有三十二家签了名（其中一家两人签名者有二户）在所有土地各不满五反的三家中，有两家签名。这个部落中住有民权派的有力活动家三浦文治，其养父六郎是村的户长，旧藩时代是村里的头行人，所以可以设想，这一方面是由于三浦文治的个人努力，同时也有他本家门第的影响（大石嘉一郎著《日本地方财行政史序说》312页）。又，注⑱所介绍的西潟为藏所收集的下田乡九十九人的签名，还向

每人各募五十分钱的捐款，可以认为是豪农的自主运动（本间洵一《西潟为藏小传》前引《雪月花——西潟为藏回忆录——》所收）。

㉒ 采取委托签名方法居多的自乡社情况也是，请愿开设国会签名运动和反对修改地税运动紧密配合之下进行的，因此，不能简单断定说农民签名并非出于自主。在越前的修改地税工作中反对官方片面决定的农民，1878 年发动了暴动，在立志社社员的支援下，试图团结各个不服从的村，在斗争的浪潮中，豪农兼酿酒业者的杉田定一结成学习组织自乡学会（1879 年 12 月），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民权政社自乡社。不服从村的领导者是以杉田为首的自乡社或自乡学会的社员居多，自由民权思想成了他们斗争的理论武器。接着在 1880 年 7 月，由继续反对运动的四百八十七个村结成南越七郡联合会，在其"开设大意"中也高唱人民的独立不屈精神，显出自由民权思想的反映。从 1879 年 12 月起到第二年的 10 月进行的国会开设请愿签名运动，在农村是以不服从村为据点的。然而自乡社作为一个组织来说，并没有积极进行反对修改地税运动的活动，这是值得注目的（大槻弘《反对修改地税运动——越前自由民权运动的生成——》《大阪经济大学论集》18 号）。这大概是因为把自由民权运动看作是超越地方利害的国政级的政治运动而自己克制了的缘故。这里就存在着和地方居民结合的局限性。

㉓ 据《国会期成同盟本部报》，仅 1881 年 6 到 8 月之间，就得知在高知、盛冈、名古屋、仙台、筑后各地成立宪法研究会，着手制定草案（江村荣一《"嘤鸣社宪法草案"之确定以及"国会期成同盟本部报"的介绍》《史潮》110、111 号）。此外，神奈川县（现在的东京都）西多摩郡五日市的民权派团体，以小学教员千叶卓三郎（仙台藩士族）为中心，以嘤鸣社草案为基础，拟成了拥有独自的先进条文的宪法草案（色川大吉编《民众宪法的创造》），由此可以推测，宪法草案制成运动已相当广泛。

㉔ 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荣一著《明治前期的宪法设想》中收录了大部分私拟宪法，民权派的草案共十八篇（包括只剩下一部分的和备忘录式的东西）。关于其内容可参照稻田正次著《明治宪法成立史》上卷，下山三郎《自由民权运动》（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 3》），家永三郎著《植木枝盛研究》。

㉕ 世人所熟悉的共存同众（小野梓、马场辰猪、岛田三郎等知识分子团体）的私拟宪法意见（《明治文化全集・正史篇下》），稻田正次推测可能是嘤鸣社的宪法草案（前引书），而江井秀雄则说是另外的东西（《嘤鸣社宪法草案研究》前引《民众宪法的创造》所收）。江村荣一推测说嘤鸣社案可能是私拟宪法意见的修正案（前引论文）。总之，两草案有密切的关系，但先后顺序须待今后研究。

㉖ 家永三郎认为植木枝盛的草案清抄本之一是日本国国宪案，另一个是以东洋大日本国国宪按为题的。此外还推测说立志社的日本宪法希望案是植木草案的增删本（《植木枝盛研究》208—210页）。对此，稻田认为日本国国宪案可能是日本宪法希望案的成案，顺序正好相反（前引书上卷 421 页）。

㉗ 试举值得注目的条文于下，在日本宪法希望案中，第四十一条规定，国民得储藏武器。第四十三条，国民有抗拒非法不正的权利和理由。在日本国国宪案中，第五条，日本的国家不得制定或行使削减日本个人的自由权利的规则。第十三条，日本

联邦对于日本各州不得干涉其各州内的事务(后略)。第二十九条，日本各州除与日本联邦有大抵触者之外，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不论实行何种政体政治联邦不得加以干涉。第四十五条，日本人民不论有何罪行，不得夺其生命。第七十条，政府违背国宪时，日本人民得不服从之。第七十二条，政府如恣意违背国宪，擅自摧残人民自由权利，妨碍建国之宗旨时，日本国民得打倒它，并建立新政府。第一百十四条，关于日本联邦的立法权是属于日本人民全体的。第一百二十三条，联邦立法院得讨论和决定关于联邦的军制(前引《明治前期的宪法设想》250、238页)。

㉘ 关于植木枝盛对于君主制的想法，家永三郎认为，在原则上持主权在民说，从实际并不否定天皇的存在的意义上看来，是"消极的共和主义"的思想(前引书330页)。自由民权派的指导理论家中江兆民、马场辰猪也都承认共和制比君主制进步，但按照国民现在的政治思想程度，以立宪君主制为宜。对于长达二百多年一直延续下来的将军、大名政权的垮台，有切身体验的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天皇观和后来相比是较为自由的，在自由民权家的演说中也有过否认天皇权威的言辞。因为其史料多半是警察和政府方面的记录，内容或有些夸张，但有过这样的言论则是事实(家永三郎《日本的共和主义传统》《思想》401号)。但不能否认，民权论者的大势还停留在主张君民共治的立宪君主政体，对于专制主义天皇制还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松尾章一著《自由民权思想研究》159页)。在八十年代，因为天皇制机构尚未确立，对于天皇的政治机能体验得还很少，很难想到天皇的存在对于立宪政治是个决定性的障碍，莫如说人们希望他充当政府和国会、官僚和国民之间的调整角色，或者说发挥国民统一的象征的机能，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尽管有这样的局限性，对于他们的重视民权的思想上的进步意义是应当给予评价的。

第三节　明治十四年政变

政府的消极态度

1876(明治9)年受命编纂国宪的元老院，于1880年12月整理出《国宪草案》，呈上天皇。由于岩仓具视和伊藤博文的反对而没有采纳。伊藤博文大加批评说：这是欧洲各国宪法的拼凑和纂改，完全没有考虑我国的国体和人情。岩仓已经向三条太政大臣进言说：对于1875年的逐步树立立宪制的诏敕，当时是不同意的，但是诏令既然发布，也就无可如何，因而提议希望以天皇的圣意来确立适合国体的宪法①。政府在国民对于立宪制的要求还不强烈的时候，对之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是，一旦自由民权运动要求开

设国会的请愿强烈起来，就立即消极起来，以国体为口实，立宪制的想法变保守了。政府首脑有鉴于欧美先进国家的革命历史，对于自由民权运动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其关心主要倾向于对此应如何处理，还是镇压。1880年4月，效法欧洲的镇压法令，制定出使自由民权运动事实上无法进行的禁止条款详尽的集会条例，这就说明政府的态度已经转向反动化了⑧。

根据岩仓的意见，从1879年12月到1881年5月止，各参议分别提出了宪法意见。除表面上持时期尚早论、实际反对开设国会的萨派首领黑田清隆之外，大多数持慎重的渐进论。他们的意见的特点，与其说在于主张采用立宪制的积极意义，毋宁说在于承认开设国会是形势上迫不得已。伊藤说："当前世事的变化，乃宇内大势推动所致，非一国一州之事端"，法国革命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山县有朋说，为了消除民心不信赖政府不服从政令的情况；井上馨则说，为了摆脱政府不能威服人心的危机，必须开设国会。因此，认为开设国会，造成"君民共治的大局"，乃"关系变更国体"的旷古大事（伊藤），"唯最难者在于定君民两权之制"（山县）。伊藤主张将以华族、士族为议官的元老院改为上院，设公选检查官，以天皇的裁断确定采取渐进主义；山县主张设立由府县会议员选拔的咨问机关特选议会；井上说，应当先制定民法，同时设立日后足以对抗民选议院的上议院（由华族、士族选拔）。对自由民权运动的不理解和怀有敌意，是所有意见书共同之处。连被视为参议中"开明派"的伊藤也说，丧失财产的士族在鸣不平，终将唱过激之论，抵抗政府，激成世变而后快。

1881（明治14）年3月，由于受到秉承天皇旨意在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督促，首席参议大隈重信才提出自己的意见书。他请求有栖川宫不要给其他大臣和参议们看他的意见书。他的意见书是由福泽谕吉的门生太政官书记官矢野文雄起草的，主张在本

年内制定宪法，1883年初开设国会，采用英国式的政党内阁制，这和其他参议的意见大不相同。矢野是交询社私拟宪法案的主要起草者。岩仓和伊藤看过大隈的这个意见甚为惊讶，激烈反对说“这是把君权抛给人民的东西”③，从而怀疑大隈可能与福泽及其系统的民权派暗中有所勾通。

岩仓把大隈的意见书交给其智囊太政官大书记官井上毅，命令他为政府准备决定宪法的意见。可能是要认真地和自由民权派的宪法意见相对抗。井上在外务省法律顾问德国人罗埃斯勒帮助之下进行了调查④，所起草的大纲作为岩仓的意见，于7月上奏天皇。其内容为：（1）用钦定宪法的体裁，（2）帝位继承法载入皇室宪则，不列入宪法，（3）天皇拥有统率陆海军之权，（4）天皇有宣战、媾和以及与外国缔结条约之权，（5）天皇有铸造货币之权，（6）天皇有任免大臣以下的重要文武官员之权，（7）天皇有授与位阶、勋章以及尊号等之权，（8）天皇有恩赦权，（9）天皇有召开和解散议会之权，(10)大臣对天皇负有重责，(11)为分立法权，设元老院和民选议院，元老院由特选议员和华士族中的公选议员组成，民选议院的议员选举法设财产的限制，(12)岁出的预算在政府和议院达不成协议时，全部按上年度预算施行，后来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骨架早在这时已经准备好了。

开拓使出售官产事件

在8月时，各报纸一齐揭露了开拓使出售官产事件。主要是沼间守一的《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和福泽门下的藤田茂吉、箕浦胜人等的《邮便报知新闻》。事件的内容是，担任开发北海道的开拓使以本年为限将要废除，乘此机会把投下一千四百一十万日元的国有事业，仅以三十八万七千日元而且分三十年无利息偿还的条件，售给开拓使官员创办的北海社和关西贸易商会。当时的开拓

使长官是萨派的黑田清隆，售给的对方关西贸易商会是萨州藩士出身的勾通官府的政商五代友厚和与长州阀勾结的前山口县令中野梧一经营的，因此，民权派谴责说，这是官僚与政商之间非法勾结的关系，藩阀专制政治弊端的暴露，并在各地召开了攻击政府的讲演会。尤其因在报纸上报导了政府内部有关出售的机密，猜疑的目标便集中于大隈和他属下的官僚了。此外据政府推测，认为同关西贸易商会争夺开拓使利权而失败的三菱，可能对反政府派给予了资金援助⑤。攻击政府的激烈情况达到连“穷乡僻壤的黎民百姓”都谴责政府不公平，致使政府感到忧虑，如民权派乘此时机以政府失政为口实主张开设国会，说不定会造成“法国革命的情况”⑥。特别是政府内部分裂的危险，和首都居民开始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使政府首脑陷于惊恐万状。

面临这样的政治危机，岩仓、伊藤等所依靠的，第一是天皇、政府控制着的陆海军和警察；第二是准备下足以和民权派所依据的英法式宪法相对抗的、以君主主义普鲁士宪法为规范来制定宪法的基本方针；第三是拥有以“天皇的圣断”来激发全国华族、士族的勤王之心的王牌⑦。于是岩仓、伊藤和井上毅等私相密谋，在天皇从率大隈随行的东北、北海道巡幸回京的10月11日晚，由三大臣和除巡幸时随行的大隈、大木两参议之外的其他七名参议联署的有关立宪政体的奏章呈上天皇，第二天下了停止出售官产，和以即将到来的1890（明治23）年为期开设国会的诏敕，并发表了免去大隈的官职。被认为是大隈派的河野敏谦、前岛密、北畠治房、矢野文雄等自由主义官僚也一齐被免职。这就是明治十四年的政变⑧。

政变后的政策

政府所以公布开设国会的时期，是对自由民权派攻势的让步和抚慰，不过，也是为了收到先发制人的效果。以国会的组织权限

要由天皇亲自裁断，徒事急躁紊乱国法者，断然予以惩处的诏敕为楯牌，对自由民权运动加紧镇压，强行制定钦定宪法。首先于1882(明治15)年1月颁发出"赐给陆海军人的敕谕"(军人敕谕)。"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如头首，其亲殊深"，以此强调了天皇直属军人的特殊身分意识，是以对天皇及其代行者的直属长官绝对服从为军纪的根本的。并且严戒军人干预政治，排除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同时还期望其发挥"王室爪牙"即天皇权力的忠实使徒的作用⑨。

随后在2月由三大臣联署上奏，明确表示实行参照各国宪法的立宪制，皇室财产与国库分开，置于国会讨论之外；振兴将来组织上院的华族子弟的教育；对位于人民之上的士族加以安抚劝导，使之成为"忠良之门第"；整备各行政部门的组织以便对抗立法议院以及力求整理纸币稳定财政等等。这些方针踏踏实实地实行了。岩仓向内阁会议提出意见书说，把全部国有山林和部分国有铁路、工厂拨归皇室财产，陆海军的经费完全由皇室财产支付，这样做了即使在国会发生任何过激论，或者拒绝讨论国家的经费，也易于加以镇抚和使之驯服。这个意图没有照样实现，但在1884年，把日本银行的五百万日元和横滨正金银行的一百万日元的股金拨给皇室，以此为开端，并把劝业银行、兴业银行、北海道煤矿铁路公司、东洋拓殖公司、东京电灯公司等特权的银行和公司的股票拨归皇室财产。又，1885年，宫内省新设"御料局"，将北海道新冠牧场的一万三千六百町步土地，和千叶县下总种畜场拨归皇室所有，后来皇室的所有地与年俱增，木曾、飞驒的森林和北海道、东北、四国、九州的国有山林原野也划归皇室，佐渡和生野的两个矿山也编入了皇室财产(但两矿山于1896年售给三菱)。于是，皇室的所有地在1883年为一千三百零三町步，而到开设国会的1890年，骤增至三百六十五万町步，占全部国有地的百分之十七以上⑩。

对立宪制加以限制或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逐次地实行起来。1882年6月修改了集会条例。修改之点是，向警察申请许可的手续严厉了，内务卿根据情况得以禁止讲演者一年内在全国演说和议论政治，不论以学术会或其他任何名义开会都须由警察临场监视，以及内务卿可以禁止集会结社。特别是把现行的禁止同其他政社联系和新定的禁止设立分社相结合，使全国的政治运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了。还有，第二年4月，修改新闻纸条例，设立保证金制度，禁止代替他人发行报纸，以及内务卿可以禁止或勒令停止发行和没收印刷机，对报纸实行了严格取缔。

岩仓于1882年12月说："开人民犯上之路，生蔑视政府之想者，无非是因开府县会之时机尚早，失进步之顺序"，他建议三条太政大臣停开府县会，这个意图在同月颁发的修改府县会规则中得到部分实现。即继上述的上年2月的修改(见前文1881年2月规定)之后加强了这项规定，内务卿认为府县会的讨论危害国家的安宁或违反法律、规则，令其停开时，直到令其再开为止，府知事和县令得以单方地确定地方税的经费预算和征收方法，经内务卿许可之后实行。与此同时，还禁止府县会议员以有关会议事项同其他府县会议员联合开会或互相通信。这是想削弱府县会的权限，镇压府县会议员的联合斗争，以便达到"堵塞弊害所由发生的根源"⑪。

教育也加速保守化了。1881年11月，井上毅建议振兴以士族子弟为对象的中学和职工农业学校，奖励汉学和德国学；但是第二年的2月，元田永孚向文部卿传达贯彻儒家思想教育方针的"圣谕"，12月以"敕谕"将元田编纂的专门强调孝道和忠节的《幼学纲要》"下赐"给地方长官和学校教员，以为修身教科书。于是教育界成为象福泽所批判的使子弟化为"小心翼翼规规矩矩的良民"，"恢复到天保年间的往昔"那样的情况⑫。象征着统治者这种气氛的是，东京大学总长加藤弘之的旧著文明开化之先驱的《真政大意》、

《国体新论》不再出版，而出版其批判天赋人权论为妄想的《人权新说》，主张优胜劣败是乃天理。

以这样的反动情况为背景，伊藤博文于1882年3月为考察宪法到欧洲去了。在德国听了毛瑟(G. Mosse, 1846—1925)的讲课，在奥地利听了施坦因(L. von Stein, 1815—1890)的讲课，留欧三个月便掌握了制胜自由民权派的理论和手段，他满怀信心地说，"充分确立了巩固皇室基础，使大权不至旁落的大道理"⑬。

政党的建成

总之，自由民权派没有看清政府首脑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所抱的决心和企图。掌握攻击开拓使出售官产问题主导权的是东京的新闻界和知识界，但是，以《邮便报知新闻》为据点的三田派，从一开始就希望靠政府内部立宪派的力量转向立宪制方面，因而认为通过这次政变，所希望的政体已经确定，主张官民协力进行准备。福泽谕吉在1882年3月创办《时事新报》，主张专以国权之利害为社论之基准。对此，立志社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说，城市民权派是"官民的混血种，决非纯良的民权家"⑭，板垣退助在事件的高潮中进京，虽然受到在京各派的欢迎，却立即踏上东北宣传的旅途。国会期成同盟首脑们专心致志于早在上次大会时就推进的自由党结党工作。对于应当拿到下次大会上进行审议的宪法希望案，也以因原则的对立恐将分裂组织为理由，确定了将其集中于本部束诸高阁的方针⑮。井上毅指出，"英国式的宪法论尚未深入人心"的情况是政府可乘之机，而自由民权派的弱点正在于此，他们还没有批判宣布钦定宪法的1881年诏敕并对此进行抵抗的明确的宪法论。

在政变前夕的紧张形势中，前曾预定召开的国会期成同盟大会还没召开时，仅由到京委员(一道二府九县的十八名和本部委员

林包明）在10月2日突然决定改为大日本自由党成立大会，月末建成了以板垣退助为总理的自由党⑯。建成是勉强的。因为干部人选和领导权之争，迄今为止一直是主要活动者的沼间守一的嚶鸣社和九州集团掉了队，板垣所标榜的舍小异的各派团结的目标，在结党一开始就破灭了，这是以立志社系为中心，从嚶鸣社分出来的马场辰猪、末广重恭等国友会集团与河野广中的东北有志会系集结起来的。而且本应成为政党组织根本的盟约也是抽象的，只列举出"第一章、吾党应扩充自由，保全权利，增进幸福，谋求改良社会。第二章、吾党应致力于确立善良的立宪政体。第三章、吾党应于日本国中与吾党主义相共、目的相同者一致合作，以达成吾党之目的。"和立宪改进党的政纲相比，非常缺乏具体性。这大概是出于避免违反集会条例的考虑，或者象党员小久保喜七回忆谈所说的那样，或许认为政策应该是在立宪制建立之后再提出来⑰。总之，可以看出，在党首脑心目中具有如下的想法，即承认钦定宪法已是既定事实，而自己是准备接受的政党。

被视为自由党别动队的有立宪政党。草间时福、古泽滋、永田一二等关西民权派以自由党副总理中岛信行为总理在大阪建党，1882年2月发行了机关报《日本立宪政党新闻》。可是在《立宪政党大意》中却说，"并不是为了议论有关政治事项而结社的"。这大概也是为了避免集会条例的取缔而这么作的，从事实来看，也不能认为已经具有可称为政党的组织。此外，1882年3月，嘉悦氏房、山田武甫等九州的民权政社代表集会建立了自由党系的九州改进党（正式名为改进党）。参加政社的政治观点从福冈玄洋社的国权论到熊本公议政党的渐进民权论，范围极广，似乎没有超出联络组织的范畴⑱。

最具有近代政党体裁的是1882年4月由大隈重信任总理建立的立宪改进党。其纲领是："一、维护王室尊荣，保全人民幸福。

二、以改良内政为主，兼及扩张国权，三、避中央干涉之政略，建地方自治之基础，四、随社会进步程度，扩展选举权。五、对外国力求少搞政略上交涉，多搞通商关系。六、货币制度坚持硬币主义"等等，都很具体，明确地打出了与自由党的急进主义相对立的渐进主义的旗号。副总理河野敏谦在党的成立大会上讲话时说，自由党以袒护贫民为标榜，爱护少壮活泼之士，而我党则组织资产家、学者和老成持重之士，干部则由河野、前岛密等前政府官僚、沼間等嚶鸣社员、矢野文雄等三田派的东洋议政会、小野梓等的鸥渡会的知识界各派组成，和自由党的性质完全不同。这个党开始时是以住在东京的人为中心，后来在各地扩充了组织，因此同以国会期成同盟为基础的自由党相比，一开始组织力量就很弱(后来力图使府县会议员组织化，扩展了势力)。加之，主张国权优先和扩充军备的三田系，和主张内政优先的嚶鸣社系的意见有很大隔阂，纲领可能是在两派无原则妥协之下制定的，这就成了党活动的弱点⑲。

和这些民权系的政党相对抗，1882 年 3 月，以政府党自任的立宪帝政党成立了，以《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明治日报》的丸山作乐、《东洋新报》的水野寅次郎等为发起人，以主权在君的钦定宪法主义为纲领，以士族、神官、僧侣、退职官员、市町村的吏员和御用商人等为号召对象。在创立过程中，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田显义等曾经给以支持，但他们并不想积极参与政党，随着他们的撤手，党势也就萎靡不振了。

国民开始拥有叫作政党的具有一定纲领的经常性政治组织，这件事本身意义就很大。不过，与其说这是从自由民权运动的广泛发展中必然产生的，莫如说好象由于明治十四年政变的偶然事件而早熟的、非正常诞生的。这就使已经团结或即将团结于国会期成同盟周围的势力，由于以前的因缘和集团间的利害关系或者地区性的对立，反而现出了分裂的消极面。

① 关于伊藤，见12月21日伊藤致岩仓书翰（《伊藤博文传》中卷188页）。关于断定是1880年写的，见稻田正次著《明治宪法成立史》上卷336页。关于岩仓，见《座右日历览书》1879年12月(《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第1,94页)。

② 在审议集会条例的元老院会议上，楠本正隆议官反对说：人民会认为本案的公布是政府不开设国会的手段，改进的萌芽也将一朝消灭（《元老院会议笔记》前期第8卷321页）。

③ 7月伊藤上朝时遇上大隈，其攻击意见书的话是佐佐木高行日记中记载的。据说当时伊藤说："你任参议重职，竟充福泽之徒的代理，极为可笑"（稻田前引书上卷499页）。

④ 6月9日，井上毅的提问和罗埃斯勒的解答，收在《明治文化全集·杂史篇》。主要是明确了英国宪法是"国会政府"，普鲁士宪法是"君主政府"的区别。井上起草的意见第一、第二、第三是比较英国和普鲁士的宪法，批判元老院的《国宪草按》和交询社的《宪法草案》的，收在《秘书类纂·宪法资料》。大纲领载于《岩仓公实记》下卷。

⑤ 通往北海道的航路，是由开拓使的定期航路和当时垄断国内主要航路的三菱汽船公司开创的。三菱乘废除开拓使之机，请求开拓使把船舶卖给它。而政府却把船舶和其他国营事业一起卖给了北海社和关西贸易商会。但关于三菱给反政府派提供资金援助，没有确证。

⑥ 可称为宫廷派的元老院副议长佐佐木高行的建议（《岩仓公实记》下卷745页）。1882年12月，岩仓回忆了出售官产事件的情况说："一旦以诡诈之社论煽动人心，则上下混乱，官民鼎沸，虽日常忠实之官吏，其向背亦不定，以至真伪黑白不分。夫此不逞之徒赤手空拳，徒事鼓口舌弄笔墨。固无三军之众，又无枪剑之器。而政府之岌岌可危惴惴不安之状，实令人不胜惊愕。呜呼，大权下移之渐以至于此，其情可察。"（同上书下卷948页）

⑦ (1881年)7月12日井上毅书翰。"政府如果以排斥英国式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维持普鲁士君主政治为朝政之方针，则实行明治8年之圣诏，设政府主义之宪法，以巩固横流中之壁垒，指示人心所向，实不可一日从缓。行普鲁士式宪法之事，在如此风潮中虽为至难之势，而在今日犹应实行，取得多数，以至成功。因英国式宪法论尚未深入人心，地方士族中维护王室之思想，犹有余沥，必居过半之数。如失此机，付之因循，至二、三年之后，天下人心既胸有成竹，虽百般辩解亦难挽回，政党之优势全属于彼而不属于我，政府提出之宪法成案为舆论所唾弃，而民间之私拟宪法，将占全胜。故今日制定宪法之举，宁失其早，勿失其迟"（井上毅传·史料篇》第4,47页）。二、三年之后，民权派之宪法草案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估计，值得注意。

⑧ 明治十四年政变的研究，有渡边几治郎《论明治十四年政变》(《明治史研究》所收)，大久保利谦《明治十四年的政变》(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明治政权的确立过程》收载)，永井秀夫《明治十四年的政变》(堀江英一、远山茂树编〔自由民权期研究》第一卷所收)，中村尚美著《大隈财政研究》。此外，关于福泽谕吉所见的政变原因，参照《明治辛巳纪事》(《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所收)。

⑨ 军人敕谕的原案是由西周（原"明六社"员）起草，井上毅修改、福地源一郎修

饰文字的。关于其制定经过，参照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论》上卷，梅溪升著《明治前期政治史研究》。当颁布宪法时，陆相大山岩对部下团队长作了不干与政治的说明，他说："军人依据圣敕，根据宣誓，对天皇保持特别亲密的情谊，宜呼吸于其关系之下。与其他国民相比，其感情之亲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与其他国民不同而无参政权一点则说"这就是军人的本来面目，亦军人之所以为军人者也，而直隶于天皇，保持亲密的情谊关系之本意亦在于此"，再三强调处于同天皇的特殊关系之上（松下前引书 下卷346页）。后来军人干与政治，毋宁说是由此种特权意识产生的。

⑩ 岩仓建议载在《岩仓公实纪》下卷 821 页。关于皇室财产，参照户田慎太郎著《天皇制的经济基础分析》，井上清著《天皇制》，旗手勋著《日本大农场的发生和发展》。

⑪ 在元老院审议此府县会规则修改案时，政府委员安场保和说明宗旨，指出"世之风潮逐年倒行逆流，立法之原意尚未达到，议事秩序尚未完全，而身为议员者早以民权论为奇货，以自由说为孤注，逾越本分，动则对地方当权者发火，甚至略加凌辱，其最甚者，竟公然议论地方长官之更迭而无所忌惮。其僭越亦可谓之极矣。"（《元老院会议笔记》前期 15 卷 1622 页）。与岩仓的府县会观有同样看法的，在政府内部可能很普遍。

⑫ 《急变论》1882 年 12 月（《福泽谕吉全集》第 8 卷 462 页）。天保为日本年号（1830—1842），江户幕府实行了保守性改革。——译者

⑬ （1882 年）8 月 11 日，伊藤致岩仓书翰（《伊藤博文传》中卷 296 页）。

⑭ 坂本直宽（南海男）《论民权家的行为》（《爱国新志》第 8 号，1880 年 10 月，土居清夫编《坂本直宽著作集》上，31 页）。对于学者、新闻记者之职司处于官民之间，调和其一致的说法（指三田派）进行批判，讽刺说：此辈乃"求官民权家"、"糊口民权家"、"阴谋民权家"、"标签民权家"、"名利民权家"。

⑮ 据 1881 年 8 、9 月的《国会期成同盟本部报》（第 12、21 报）载，从下次大会如讨论宪法草案，恐组织陷于分裂，以及"如单使后会（下期大会——引用者）止于宪法的讨论会，则太遗憾"的想法出发，便以宪法草案"仅供后日（详后）参考，而储藏于本部"，计划首先建立政党，然后召开"所谓日本宪法议会"，以决定宪法（江村荣一"《嚶鸣社宪法草案》之确定及《国会期成同盟本部报》的介绍"）（《史潮》110，111 号）。可是并没有为召开这个宪法议会作出努力，因而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把宪法草案束诸高阁而作的辩解之辞。

⑯ 关于自由党成立的情况有，内藤正中《自由党的成立》（前引《自由民权期的研究》第一卷所收），江村荣一《自由党的结成和政体设想》（《史潮》89 号，《论集日本历史10。自由民权》再录），稻田正次《国会期成同盟的国约宪法制定工作和自由党建成》（稻田正次编《明治国家形成过程研究》所收），山田昭次（《明治十四——十五年的自由党》（大冢史学会编《东亚近代史研究》所收）。

⑰ 警惕抵触现行法的话是自由党结成总则（1881 年 10 月）中指出的（后藤靖著《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128页）。此外，参照《小久保喜七谈话速记》（冈义武著《近代日本政治史》（1），220 页所引）。又，1882 年 3 月的《自由党组织大意》说：创业的政党与西欧各国的守成政党不同，"我党不争精细之主义，而为粗大之运动，用以尽力团结成一大政党"（《自由党史》中 112 页）。

⑱ 水野公寿《九州改进党党书》(《近代熊本》11号)。

⑲ 林茂《立宪改进党的地方分布》(《社会科学研究》第9卷4、5号)。山田昭次《立宪改进党党书》(《史潮》89号。伊藤隆《明治第十年代前半的府县会和立宪改进党》《史学杂志》73编6号,《论集日本历史10·自由民权》再录)。松尾章一著《自由民权思想研究》。

第二章　自由民权运动的败退

第一节　军国主义的促进

朝鲜的壬午事变

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使政府政策更加走向军国主义方面的，是壬午事变（壬午军乱）。由于在1876（明治9）年的日韩修好条规中有了治外法权的规定，以及签定通商章程时的往返照会中所取得的暂时豁免关税的特权，使日本的对朝鲜贸易增加了十几倍。这个数目虽然在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朝鲜进口的重要物品大米和黄金，却在日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①。即日本大米从1872年以来主要向欧美出口（最盛期是1888年），为了缓和由此造成的供给不足或歉收时的米价腾贵，进口了廉价的朝鲜大米。造成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加重荒年灾害的是地税和地租的过重，这是不待言的，而朝鲜大米就是用来作为补救的。此外，由于国内黄金产量很少，同外国的金银比价的差额和贸易的入超，硬币的外流连年增大，因此，从朝鲜进口黄金是很重要的。

然而对日本政府来说，朝鲜已经超过了这种经济上的利益，"是我国对亚洲近邻间在权威上直接感受的'政治的'和'战略的'重要关系"②。特别是由于新疆的伊犁问题俄国同中国的关系恶化，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对俄国向亚洲侵略的危机感，都在加强。于是朝鲜问题开始同对俄问题联在一起，使两国政府的朝鲜政策积极起来。日本和中国都分别邀请考察团和留学生，劝朝鲜政府开国图强，以便加强对朝鲜的指导权。在这种情况中兴起的朝鲜开

化派的开国和开化的主张中看到有对日本和美国从属的意图，对此表示反对的儒生们掀起了尊华攘夷和卫正斥邪的上疏运动，国王的父亲大院君的势力与此结合起来，同采取开国政策的王妃一族的闵氏政权形成尖锐的对立。

当时乘朝鲜国王着手改革军制之机，政府让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要朝鲜向日本请求援助，对新编的洋式军队（别技军）派遣公使馆的武官堀本少尉担任教官。因新军的创始而感到受淘汰危险的旧式军队的士兵，由于对粮饷的欠发和对揭露出与此有关的贪污行为的愤怒，于 1882 年 7 月掀起暴动，群众起而与之合流，包围王宫，并杀了堀本少尉，袭击了日本公使馆。由于当时日本商人囤积大米，米价暴涨，士兵粮饷流进黑市，发生从中取巧的贪污行为，使群众生活陷于穷困，对此，不满情绪爆发了。这就是壬午事变③。

花房公使放火焚烧公使馆，然后脱逃，乘英国军舰回到长崎。政府一方面压制黑田清隆的立即开战论，另方面决定派遣陆海军和进行外交交涉的方针。对花房公使的训令中指示：如果朝鲜政府有重大过失情况时，可以用"严厉逼迫"的谈判，予以"强使赔偿的处分"，使其割让巨济岛或郁陵岛，除谢罪和赔偿之外，还罗列了扩大通商、获得资源的许多要求④。8 月，花房公使率领军舰四只、运输船三只，陆军一个大队（约一千五百人）开赴汉城；以此武力为后盾向国王提出了处罚凶手、抚恤受害日本人、赔偿损失、开放杨花津等地，准许公使、领事及其随员在内地旅行、驻扎保卫使馆的日本军队等各项要求，以最后通牒限期三日之内做出是否接受的回答。借此次事变机会掌握了政治实权的大院君对此确定了拒绝的方针，在着手动员军队的同时，要求驻在马山浦的清国军队代表马建忠入京。马建忠提议在日朝间进行调停，为了压制朝鲜方面的对日强硬论，将大院君绑架到天津。主张对日缓和论的闵氏派

于是又掌握了政权，承认了日本的大部分要求，8月30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

中国想要阻止日本在朝鲜扩大势力，但同时又想避免同日本的武装冲突。由于中国的斡旋，朝鲜和美国在这一年的5月缔结了修好通商条约。中国更进一步推进这个政策，采取了把列强势力引进朝鲜用来牵制日本扩张的政策。另方面，英国驻日、驻清公使巴夏礼（E. S. Parkes）为防止清日间的战争在李鸿章和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斡旋。为了亚洲市场的安全，为了防止俄国侵入朝鲜，这样做是必要的。日本、中国、英国各有自己的想法，但在侵略朝鲜上有一定程度的共同利害，这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壬午事变的消息刚一传到，就有主张立即开战的，请求献纳军用资金的，志愿当义勇兵的，还印出了许多彩色板画，来煽动对朝鲜和对清国的敌忾心。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的社论中，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断定发动这次事变的"顽固党"是"文明的敌人"，说"要向世界万国宣扬我们的政略是文明改进的政略，其军队也是文明改进的军队这种主义"。⑤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形势的是军部和政府。参事院议长山县有朋在8月，海军卿川村纯义在11月建议扩充军备。结果，陆军方面制定出三年后开始实行的兵力一举增加一倍的计划，海军则制定了从第二年起八年中建造四十八只军舰的造舰计划。不过，扩充军备必须实行增税。增税的困难，正象山县说的"增税之令一发，必然喧嚣不已，驳之者，议之者以及攻击者纷纷起来，全国一时为之骚然"⑥这种情况政府首脑是熟悉的。因为自由民权派的主流以及自由党或立宪改进党都曾从优先改革内政和尊重民权的立场批判了政府的朝鲜政策⑦。所以，为了扩充军备，首先必须公然否定内治优先的原则，然后压制自由民权派。政府下定了决心。11月，对地方官发下说明必须扩充军备的敕谕，12月，又向诸省卿发出必须改革从前"休养民力、培植根本"的一贯方

针的天皇的诏敕⑧。前述的岩仓上奏停止府县会，挟军警之威势，“使民心有所战栗”的奏章，就在这个时候，也是福岛事件发展到尖锐化的高潮之中。

福岛事件

对自由民权派的首次大规模镇压是福岛事件。福岛县是自由党的有力据点，拥有议长河野广中等二十七名党员县会议员，加上立宪改进党议员，控制了县会的半数。萨派的县令三岛通庸曾经说出以征伐自由党为自己使命的豪言壮语，1882 年 2 月到任伊始就命令会津六郡郡长着手建设三条道路（以若松为起点通往东京、山形、新潟的）的大工程。而工事费中的三十七万日元则由会津六郡负担，其居民不论男女凡十五岁至六十岁者，在两年内，每月出工一天⑨，不能出工服役的，男子每日出十五日分，女子每日出十日分的工夫钱，此外还规定征募捐款。另方面尽管县会再三要他出席，三岛县令都不答应，于是县会在 5 月做出了全部否决预算案和其他议案的空前未有的决议。对此，三岛行使了上年 2 月修改的府县会规则，要求执行预算原案，6 月，内务卿作了若干修改之后予以批准。斗争不得不在县会之外进行了。自由党员一致召开讲演会攻击县令的专制和恶政，同时为了提起停止三条道路工事的诉讼而开始组织农民。这个诉讼同盟立下如下规约，即在县会恢复人民权利之后设置六郡联合会，考虑民度，根据地方人民的利益测定道路的路线，为工事的施行和监督选出委员，同路线联接的郡县人民缔结同等施工的合同，以及上述条件不实现时决不施工。诉讼运动迅速扩大，10 月中缴纳同盟会费的人达七千之多，他们向县方提出，在诉讼中不服劳役。

对此，县当局把拒绝服役的农民传到郡公所，威吓说不去服役而又不缴工夫钱时给以拍卖土地的处分。于是在 11 月对顽强分

子强制实行首次拍卖，并且逮捕了为此向喜多方警察署进行群众抗议的领导者原平藏、三浦文治（都是自由党员）以及诉讼委员宇田成一（自由党县议员）。抗议逮捕的几千农民集合在盐川街道的弹正原，包围了喜多方警察署，而这时群众中有人投掷石块（据说投石者大概是由警察授意的挑拨者），警察借机拔出刀来袭击群众，砍杀数人。从第二天起，以聚众行凶罪大肆逮捕自由党员和诉讼同盟的活动家，被抓者达二千人之多。这时有人供出本年8月河野广中等六名干部在自由党福岛本部无名馆血书签订的“誓约”内容[10]，警察认为这是以道路诉讼为借口而以暴力颠覆政府的阴谋，对河野等自由党员骨干分子五十八人以内乱阴谋罪起诉（1883年9月，高等法院判处河野监禁七年，其他五人监禁六年）。

在这次事件中，福岛县的自由党员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是同自由党中央直接联系的河野等首脑部的动向，想要把县会斗争和反对筑路斗争引向建立日本全国公议政体的运动上去。第二是由企图建立“急进党”的花香恭次郎（县会书记）所代表的动向，想要通过团结敢死之士达到打倒专制政府的目的。第三是着重组织农民发动诉讼运动的动向，县议员和户长阶层民权家以外的中农出身的活动家开始登上领导地位。而第一动向和第二动向并没有和第三动向的运动实行全面合作，这个空子成了县方派出奸细实行有计划的镇压政策取得成功的原因[11]。福岛事件给予会津的民权运动以毁灭性的打击，县会的斗争力量完全丧失。在1883年2月改选县会议员半数时，反三岛派几乎完全被清除，剩下的二十二名也被关进了监狱。

当建立自由党时，地方民权家和大城市民权家发生了分歧，已如前述，而当福岛事件时，倾向中央斗争方针和重视地方斗争方针的对立更加显著了。

自由党与困民党

自由党中央对于会津的斗争不仅没有给以组织上的领导和支援，而且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和大干部后藤象二郎以考察欧美立宪政治为名出访欧洲，正是会津镇压疯狂化了的1882年11月。他们出国旅费的出处可能没告诉板垣，但后藤与受伊藤指示的井上馨、福冈孝弟（土佐出身）之间确有使板垣脱离自由民权运动的密谋，结果以延长陆军省同三井之间的承包合同的期限为代价，使三井的大老板三野村利助拿出了这笔钱⑫。首先是党内有人反对在发展党的重要时期出国，田口卯吉、大石正巳、马场辰猪、末广重恭等国友会系干部因此退出了党。此外，立宪改进党系的报纸举出同样的理由和出国旅费出处可疑进行了批判，为此，从1883年春季起，两党之间演成混战式的互相攻击。自由党方面为了对改进党系报纸揭露出国旅费出处的报复，攻击大隈和改进党接受了三菱的钱，对三菱的“暴富”声称要“治服海怪”，对改进党的“无节操”则叫嚷“消灭伪党”。时当福岛事件以后政府镇压加紧之际，自由民权运动衰退，3月立宪政党解党，到这一年半，声明解散的自由党系政社有十三个，改进党系政社有十五个。

板垣6月归国，立即宣讲世界大势，慨叹“那些曾经高唱自由平等，以文明炫夸的外国人，他们恣意滥用自己曾经厌恶过的贵族权力，来虐待和凌辱东洋人的情况”，主张为实现修改条约，必须“上下一致协力”扩充海军⑬。后面所述1882年以后欧美列强加强海外扩张政策的国际形势，成了他转变基本态度的口实。当时从财政上支持党的资产家因受压迫，对政治的态度消极下来，因此资金枯竭，甚至连维持党本部办公处和机关报都困难了。1883年11月，临时大会通过了以十万日元的募捐来“确立长久维持的办法”，但出席者只有东日本，尤其限于关东。以板垣为首的土佐派主流已经对党务失掉了热情，倾向于解党论⑭。所剩下的据点关

东，因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严重问题。

由于明治14年的政变，大隈下台之后继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为了挽救因币值下跌和物价腾贵而陷于破产状态的财政，着手整理纸币，1883年5月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限制营业年限由创办算起二十年，并在此期间收回其发行的纸币。于是从1885年5月起，开始发行日本银行（1882年10月开办）的兑换银行券，1899（明治32）年末，政府和银行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全部收回完毕。与此同时，为了补救亏欠，把构成财政负担的国营工厂、矿山以低廉的价格售给民间，承购者有三菱、三井以及古河市兵卫、川崎正藏、浅野愬一郎等同政府关系密切的特权政商。为保护民办企业而发出的贷款停止了，因此，机器纺织的先驱、拥有二千纱锭的纺织厂，几乎全都失掉政府的保护而破产了。这些工厂是为响应政府防止棉线进口的号召，接受政府售给的机器，由士族、豪商、豪农等经手创办的，是民间有代表性的机器纺织工业。另外，在1882到1885年，对造酒和纸烟实行增税，并新设了卖药印花税、酱油税、糕点税，用以增加收入。这样，总算闯过了财政危机，但这种紧缩政策结果造成了农产物尤其大米、蚕茧、生丝的价格下跌，中等大米的行市1881年每石九日元零九分，而1884年落到四日元七十一日分，秩父地方的蚕茧每斤价格从1882年的一日元四十日分暴跌到1884年的八十日分。这就意味着地税及其附加税实际上加重了。水田一反的平均收获米中，由于地税和地方税中的地价附加、地税附加、地亩附加，国家剥夺所占的比率，1882年为百分之十八点五，1883年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五，1884年竟上涨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一⑮。这个比例比江户时代的年贡率还重，在超过年贡率之上，还实行了上述的增税。

农民的这种过重负担，使农民分化更加激化。农商务省聘用的外国人麦耶特（P. Mayet，1846—1920，德国经济学者——译者）在

《日本农民的疲弊及其救治策》(1893年)中举出了如下的数字。从1883(明治16)年到1890(明治23)年期间，因为拖欠地税和地税附加税等税款，财产(土地)受到强行处分的农民有三十六万七千人(农家总户数约为五百万户)，其拖欠税款共十一万四千日元，每人平均仅三十一日分，由于拖欠而被政府没收或拍实的土地为四万七千町步，其地价额为四百九十四万四千日元，农民一人的受害额为八日元三十一日分，为拖欠税款的二十七倍。此外，1884到1886年的三年间，据计算有二亿零三百三十万日元的土地作为借债抵押品因过期而流入高利贷的手里，而此抵押地所借的借款额为一亿六千五百八十日元。这时丧失土地的不只是贫穷农民，也有很多富农和中小地主。缴纳十日元以上地税取得府县会议员被选举权的人数，在1884到1886年之间减少了十四分之一，又，缴纳五日元以上十日元以下地税而只有府县会议员选举权的人数，在同一期间减少了七分之一。缴纳五日元以下地税的人数，虽然不知确数，但估计大约占总数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丧失了土地，沦为佃农⑯。

1884年的农民骚动达一百六十七件，大都是围绕着偿还欠债的，⑰发生在神奈川、静冈、群马、埼玉、山梨、长野等养蚕地带。由于自由党员和受其影响的人的参加，在这些骚动中农民是以借钱党、贫民党、困民党为名的组织进行斗争的⑱。从1884年初起，借钱党在伊豆展开了活动，5月，群马的借钱党爆发了下述的群马事件，8月，在八王子北方的御殿峠有数百名借钱党蜂起，9月，多摩三郡三十三个村的困民党，为抗议领导者被捕，包围了八王子警察署。11月，发生了秩父困民党的大暴动(秩父事件)。困民党以集体力量同官厅、高利贷和借贷公司进行交涉。在这次交涉的对手借贷公司、私立银行的干部中有自由党员地主。自由党员分裂为困民党方面的和其敌对方面的，还有站在两者之间的仲裁者立场上的⑲。自由党中央在无法对此进行领导和统制的情况下，逐步固

执起敌对的姿态⑳。

① 日本向朝鲜的出口，主要是把买进的棉制品等英国商品向朝鲜出口的转手贸易，因此，在朝鲜没有免税权，生意就不合算。关于日朝贸易，参照南德子《甲午战争与朝鲜贸易》(《历史学研究》149号)，姜德相《李氏朝鲜开港后朝日贸易的开展》(同上265号)，彭泽周著《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研究》。

② 1876年2月驻俄公使榎本武扬致寺岛外务卿书翰（《日本外交文书》第9卷15号）。朝鲜于1881年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其访日的使节团有1876（明治9）年和1880年的两次，尤其后一次有金宏集、洪英植、鱼允中等后来成了开化派的官僚，参观了行政、军事和教育的设施。这时金宏集得到驻东京中国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朝宪策略》，并将此报告国王，其内容是，朝鲜为对抗列强、尤其俄国的侵略，应联合中日两国实行开化，并应与美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见解一方面反映了日本朝野的意见，另方面也反映了张之洞等中国官僚的"联日反俄"论。《朝鲜策略》一方面影响了朝鲜政府的开国方针，同时也引起两班儒生的卫正斥邪运动的反驳，但这种三国提携意见所以没有成为日清两国的朝鲜政策的主流，是因为自从征韩论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中国和朝鲜存在着宗属关系，以及中日两国官僚的对欧美从属倾向的缘故。参照田保桥洁著《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和彭泽周前引书。

③ 山边健太郎《论壬午军乱》(《历史学研究》257号)，申国柱著《近代朝鲜外交史研究》，中冢明著《日清战争研究》。

④ 田保桥前引书上卷794页以下。8月9日外务卿的补充训令中提出要取得（1）咸兴、大邱、杨花津的开放，（2）取得公使馆员、领事馆员的内地旅行权，（3）元山、安边的对日本人"暴行事件"的解决，（4）关于通商条约的让步。同月27日又训令为了补偿赔款，掌握端川金矿的监督权，以其产金充作赔款。

⑤ 《朝鲜政略》(1882年8月，《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251、259页)。

⑥ 1882年12月山县对地方长官的训话(《陆军省沿革史》《明治文化全集·军事篇》170页)。

⑦ 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社论《论对朝鲜的政略》(1882年8月8日)批判武力行使论说："必须知道，我国之内治尚未整备，必须了解，此次战乱所费为几何，并且必须考虑，征战胜利之后给民权带来如何结果"（复刻版第1卷134页)。立宪改进党的领导人之一小野梓在1882年10月的"论外交"的演说中说：日本要从东洋文明先驱者的立场上同清国、朝鲜两国提携，谋求东洋的和平。"对中国与以解疑之便，给朝鲜以解怨之便，勿使西洋各国干涉东洋的外交"(西村真次编《小野梓全集》上卷478页)。此外参照山田昭次《立宪改进党的对亚洲意识和资本主义体制的设想》（《史苑》25卷1号)。

⑧ 给各省卿下的指令说："戊辰以来，休养民力，培植根本，唯考虑内政之急，顾方今宇内形势，整备陆海军实为不得已之事，此际宜酌定时机，竭尽庙议，庶几不误国家之长久大计，此令"(《明治天皇纪》第5卷844页)。这简直可以说是转向军国主义的

宣言。

⑨ 劳役虽然是每月一天的比率，但实际上，这个地区积雪期长，12月到4月之间不能施工，服役集中于农忙期的夏季和秋季。而且由于治安关系，要特意到六至八日里外的远地去劳动，加上往返的路程，实际上要三天。

⑩ "誓约"本文没有发现，根据记忆所及，被告田母野秀显口供中的记载如下。"第一，我党以颠覆自由的公敌专制政府，建立公议政体为己任。第二，我党为达到我党之目的，抛弃生命财产，割断恩爱羁绊临事不考虑一切。第三，我党应遵守我党会议通过的宪法，同心一体共同行动。第四，我党在我党之志愿尚未实现时，无论遭遇任何困难，经过多少年月决不解散"。这个"誓约"是河野的合法主义和花香恭次郎的非合法主义妥协的产物，可能对于诉讼运动的路线前途没有自信，在寻求推动斗争飞跃发展的方策上取得了一致的。

⑪ 关于福岛事件的研究有大石嘉一郎著《日本地方财行政史序说》，下山三郎《福岛事件小论》(《历史学研究》186、187号，《论集日本历史10·自由民权》再录)，高桥哲夫著《福岛自由民权运动史》等等。史料集则有《暴民反迹》(警察书类，《明治文化全集·自由民权篇续》所收)，尤其《福岛县史·近代资料1》是集大成的。

⑫ 尾佐竹猛著《明治政治史点描》第8章。彭泽周《板垣退助外游费用的出处》(《日本史研究》75号)。

⑬ 《自由党史》中，322页。

⑭ 《自由党史》(中，362页)说："多(指出席者——引用者)感有形政党很难存在，以至主张精神结合的必要"。另参照下山三郎《论民权运动》(《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历史讲座》第5卷所收)。

⑮ 丹羽邦男《修改地税与农业结构的变化》(《日本经济史大系·近代》上，272页)。

⑯ 服部之总、小西四郎监修《明治农业论集》208—225页。

⑰ 青木虹二著《明治农民骚动之年次研究》64页。

⑱ 关于秩父困民党的组织，有人指出有干部小组和本地组织者(一村代表的村活动家和耕地活动家一百到一百三十名)(井上幸治著《秩父事件》、《中公新书》83页)。关于武相困民党，据1884年11月的《协商规则及维持法》(《町田市史史料集》第8集281页)说：选出监督、干事、会计等干部，其下有各村代表。关于这个史料内容的理解，要注意它是秩父困民党在蜂起失败和加紧镇压中重建组织时的东西。此外，在所谓静冈县的借钱党的北伊豆的储蓄社规章中记载：本社的参加者而由借贷公司借钱者，不论金额多寡和有无抵押品，均按无利息分十年偿还的办法处理。参加者应按借款金额，每月积存若干日元，作为还债之资。并由参加者选出三十六名代表，负责同借贷公司交涉，另雇两名沼津的代言人，准备法院审判。原口清《静冈事件的社会背景》(《静冈大学法经论集》3号，再录于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民权运动的开展》)。

⑲ 在秩父，从1882年以来就有地主和知识分子的自由党员，但1884年，尽管党全体的活动陷于停顿，却有没落的中小农民二十人入党。其中有落合寅市、高岸善吉、坂本宗作、井上传藏等秩父困民党的组织者，自由党的影响是更加广泛了(井上幸治前

引书 30 页)。而武相困民党的情况却不同了，四名监督之中只有若林高之亮一人是自由党员。这两党之间的关系，据色川大吉评论说：整个来说是分离一平行的关系(《困民党与自由党》《历史学研究》247 号)。

⑳ 《自由新闻》关心农民的穷困，并为之耽忧。《皇家之贼，国民之蠹》的社论(633号，1884 年 8 月 17 日)是以支持府县会议员主张节约国费为主题的，文中说，"夫我国民间的疲弊无过于近年者……地方贱民之中，欲尽纳税之义务则苦无生活之资，欲保存生活之资则不得不顾忽纳税义务，徒呻吟于穷途者往往不少，其甚者竟至全村皆破产还债，何其惨之甚耶。府县会议员虽非此贫困中人，但亦此贫人之同胞，岂无怜悯其惨状，拯救其困苦之心哉"(第 5 卷 161 页)。这是从议员和中央指导者立场出发的怜悯。

《自由新闻》报导了困民党的骚动。但关于注 18 的伊豆储蓄社的活动则记述"如此党与所以兴起，本因不尽负债义务，其罪虽可恶，然时当极不景气之际，其心情不无可悯之处。公司与其贪非法之利息，应于借贷者间容纳其哀恳，谋求远大之利为宜"，表明了仲裁者的立场(659 号，9 月 17 日，前引书 268 页)。另以"社会主义的萌芽"的标题写道："近来我日本亦时有贫民结合搞种种暴动之警报，可谓国家之一大严重事件。近来茨城县内有一书题名渡世指南，系抄本，在有志者之间传播。书中精神无一非宣传社会主义者，其悲壮文字一读之下使人怒发冲冠。不知是否果真"。这是表明将困民党与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的看法(653 号，9 月 10 日，前引书 243 页)。宣布困民党格杀勿论的10月 7 日社论《国家心腹之患》(见下节注)的逻辑，其一部分已在 9 月中准备下了。

第二节　各种事件的激烈化

自由党的解散

1884(明治 17)年 5 月，汤浅理兵，日比逊等自由党员所率领的群马县农民集聚在妙义山麓的阵场原，捣毁了冈部为作的生产公司(在甘乐郡一带有十多个分店的高利贷公司)，还计划占据松井田警察署和袭击高崎兵营，蜂起后四天，粮食用尽，群众离散，领导者被捕。审判结果，四十二人以强盗、放火、杀人、啸聚凶徒的罪名判处重刑。这个事件，在农民方面，是事件有关地区周围的困民党围绕偿还负债的斗争而广泛发动起来的，但蜂起本身则是士族民权派的激进派自由党员鼓动农民企图利用其力量，和下述的秩父事件有所不同。原来是自由党员借中山道铁路工事落成典礼的

机会，计划暗杀大官，后来仪式延期，无法抑制这种骑虎之势，便率领蜂起的农民搞起举兵计划①。

这时关东的自由党员中，为对抗政府镇压的疯狂化而诉诸恐怖手段的倾向强烈起来。其典型就是加波山事件。想为福岛事件报仇的河野广躰等的福岛集团、鲤沼九八郎等栃木集团和富松正安等茨城集团，以自己制造的炸弹为武器，计划暗杀兼任栃木县令的三岛通庸，但由于警察的严厉追究，来不及等待原订的栃木县厅落成式的机会，1884年9月，由十六名同志登上茨城县的加波山，发出“要颠覆自由的公敌专制政府，而后建立完全的自由立宪政府”这一“革命举兵的檄文”，为袭击县厅而下山时，受到警察队的攻击而解散逃跑了。事件的关系者在审判中，不是作为国事犯而是以强盗犯被处死刑的七人、无期徒刑七人、有期徒刑（九——十五年）四人的空前未有的重刑②。这是因为公然标榜革命和使用炸弹使政府感到恐怖的缘故。政府以加波山事件的嫌疑为借口，逮捕了关东各地的自由党员三百名。当时自由党的中心在关东，因此，党势受到严重打击。政府系的《东京日日新闻》、立宪改进党系的《东京横滨每日新闻》，都指责自由党对此次事件有责任。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为了维护本党的立场，发表社论说，参加的党员的行动是“轻举暴动”，认为借钱党（困民党）的活动是“国家心腹之患”，应该扑灭其凶焰③。

这一年3月的党大会通过的决议说，“近来我党的形势有专偏于东北，而与关西的联络几乎完全杜绝的倾向”，在这种衰微情况下，以党的中央集权化和加强总理的统制权限为目标修改党规，并为培养少壮有为的党员设立文武馆④。此文武馆（名为有一馆）的开设，是在困民党蜂起激化的8月，本想收容激昂的青年党员，由党本部来直接加以控制。然而加波山事件的勃发暴露了这种试图是无效的，以此为转机，前曾倾向于解散的党首脑，决心赶快实

行解散。上述《自由新闻》的社论无非就是这一意图的表现。而用作这一决定的口实则是下述的在中法战争中看到的国际紧张形势。《自由新闻》发表了长篇社论《国权扩张论》，分析欧美列强向亚洲扩张的国际形势，论述有必要"在独立权以上扩张国权"，主张"把那些壮年有志之士的热忱由内事转向外事"，以及为了对外主张停止官民的抗争⑤。于是在10月29日建党三周年纪念日，一百多名代表聚集在大阪，几乎全场一致通过了解散的决议⑥。这是为了甩掉那些党首脑已经无法控制、而热衷于非法暴动的壮士党员和企图同困民党结合起来的农民党员而搞的解散。

秩父事件

自由党解散大会三天后，发生了秩父事件。以农民的困民党为主体，本地的农民自由党员参加了领导。当困民党同高利贷的交涉受到警察、郡公所、法院的取缔和干涉无法进行时，便决定在9月掀起暴动，排除了要求指导的大井宪太郎的慎重论，11月1日集合在秩父的椋神社，作了总理田代荣助和副总理加藤织平(均为自由党员)以下干部的部署，并编成了两个大队。这时他们约定救济困民，捣毁高利贷，烧毁户长公所的文件，有人被逮捕时夺回，以及强烈要求废除国税以外的各种税和小学校费，设立"革命本部"。领导者表明这是以颠覆政府和立即开设国会为目的的"革命之乱"，在这一点上，它具有超过了其他地方困民党水平的农民的民权运动、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性质。然而困民党军原想和群马、长野的困民党联合起来，结果没有办到，在同军警战斗中失败，经十二天后完全被镇压了。被逮捕的人单是埼玉县方面的就有三千六百多人，审判结果，实行大量处罚，包括田代等七名干部死刑在内，重罪二百九十六人，轻罪四百四十八人，罚款者二千六百四十二人。这就是秩父事件⑦。

从此以后，自由党员的蜂起计划接二连三地遭到警察的检举。1884年12月，想仿效俄国虚无党，袭击名古屋镇台、并在大阪等城市散发檄文的计划，也事前被发觉了，造成了村松爱藏等田原的自由党员和饭田的自由党员（爱国正理社员）等被捕的饭田事件。爱国正理社组织起罐头工人和贫农，预定在蜂起时要求减轻地税、废除印花税、修改征兵令和救济贫民。接着又发生了因与饭田事件有关系的名古屋党员和土佐党员奥宫健之等三十人被捕的名古屋事件。此外，1886年6月，发生了说是企图暗杀大臣有一百多人被捕的静冈事件⑧。这些尖锐化了的事件的第一个特点是，除爱国正理社外，既没有依靠现有的政社组织的，也没有依靠农民的力量的。事件有关人员本想利用农民和城市下层穷困居民和困民党蜂起的形势，但除了散发檄文（饭田事件时计划印刷五万份，值得注意）外，并没有进行组织民众的活动，⑨而是要联合关东各地敢死之士，一齐点起暗杀和举兵的烽火，使全国陷于混乱，一举打倒专制政府。第二个特点是，计划向饭田事件中所看到的军队内的士兵进行鼓动，实际上也和军队内的同志进行了策划。1882年的陆军常备兵力增加二倍的计划，从1884年起进入准备阶段，加紧了对于逃避征兵的取缔，增加征兵人数，激起了国民的不满，激进派利用这种不满，把希望寄托在士兵的武力上了。因为通过加波山事件和秩父事件的经验，深知志士和农民所拥有的武力不足以对抗警察和军队。第三个特点是，在名古屋事件和静冈事件时，为了获得资金，为了防备潜入党内的警察特务，预先置同志于死地，让他们搞强盗活动，这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邪门歪道的志士意识的表现。本来，自由党员一方面对于政府权力的反抗意识很强，同时其反抗精神是靠士族民权派残存的志士意识的；正如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所指出，"认为自由是放纵不羁之行，认为平等是铲除破坏之业，有慷慨悲歌而自喜"的"怀旧因素"。当

1881年，暗杀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件报导传来，介绍俄国民粹派的恐怖主义（虚无党）行动的书籍大量出版，这就更加助长了这种倾向。这些激烈事件导致了自由党解散后的民权派激进势力陷于孤立而被各个击破的结果。

立宪改进党也在1884年12月，先由总理大隈重信、副总理河野敏谦、前岛密、北畠治房等高级官僚出身的最高干部退党，随后小野梓也追随其后，党的活动极其衰微。大隈等退党的理由是讨厌集会条例的束缚，主张废除党员名簿而未被采纳；还因为沼间守一等人想发起建议减轻地税运动，和大隈主张为扩充军备必须增税的意见发生了对立。承认扩充军备，提倡官民一致，是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首脑们共同的想法，这就成为这一时期主张解散的动机。自由民权运动并不是在1884年结束的，如后所述，在没有中央组织之下仍继续了活动，但已经丧失迫使政府陷于危机境地的力量了。

自由民权运动的意义

自由民权运动几乎遍及全国全部府县，正在向包括士族、地主、自耕农民、商工业者在内的所谓全民规模的政治运动发展。原来从爱国社重建到自由党解散，其真正的活动只不过六年，因此，各地区的发展差距很大，而且向直接生产者阶层的渗透程度很小，但是，却明显地表现出向国民运动发展的步伐。由于他们依靠政社和政党的团结和群众的请愿运动的力量，终于迫使政府决定采用立宪制。

自由民权运动是早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所以说早熟，是从下述意义来说的，即无论在经济上、阶级上和思想上都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尽管这样，只是由于国内矛盾的特别尖锐化，和工业资本主义进入成熟期的世界历史条件才发动起来的。正象

在序文里所说的那样，由于靠藩阀官僚专制而建成的统一国家，强制实行文明开化政策和军国主义政策而产生的深刻矛盾，加剧了官僚和华族以外的所有阶级、阶层对于施政的不平不满。为使士族继续支持政府而实行的士族授产事业几乎完全失败，他们的贫困日益加剧，为让地主参加府县会议来支持政府政策而设置府县会议的企图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竟使士族、地主批判政府的调子更加激昂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租税过重，使土地所有和农业经营无法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本来应当是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地主阶级，反而转到批判政府派的立场上去了。

一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是迎合政府采取立宪制方针和文明开化政策的，并且是想利用它的。因此，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个运动中，由板垣和大隈代表的专制主义势力内部的反对派谋求藩阀垄断的政权实行门户开放的要求，培养为富国强兵自主献身的国民的意图，和要想对这种天皇制国家体制的先天虚弱加以补救加强的动向，以及对基础尚未巩固的官僚专制政权一举实行变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动向，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这种自由民权运动的广泛性质，成了在短时间内扩大发展的条件。

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输入，和幕府的崩溃、变革世道暴动的高涨等明治维新的国民体验相结合，成为非当权派国民的思想武器的意义是巨大的。自由民权运动作为民间自己的自主的启蒙运动和教育运动，取得了成果。只凭政府的文教政策和教育施设，不可能带来九十年代的国民就学率的上升。八十年代各地的农业恳谈会的建立和农业技术的改良，各种商工业团体的建立和技术、经营的改善成果，也都是受自由民权运动的直接间接刺激的。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进展，不仅由于它而得到促进和深化，它的思想影响还波及到中国、朝鲜、越南，为九十年代东亚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自由民权运动毕竟没能摆脱兼具知识分子性质的士族和地主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范畴[10]。民众尚未明确认识到日常生活上的要求就是生产和生活的权利，这种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使自由、平等、人权、革命等政治思想仍然停留在外来的非日常性的程度，从而削弱了把生产者的要求组织成为立宪制要求的组织活动。特别是运动时期过于短暂，不可能克服这个弱点。由于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已经过去，由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开始僵化的帝国主义阶段前夜的世界历史条件，日本统治者从欧美学到了革命的恐怖和巧妙的镇压办法，而自由民权派也认识到革命过头的弊害以及扩充军备和海外扩张是不得已的事。到了八十年代后半期，阻碍自由民权运动顺利发展的内外条件已经具备了。外则如后所述，在亚洲有欧美列强的加紧侵略及其相互间矛盾的增大，以及与此相关的围绕统治朝鲜的日清两国的冲突；内则有由于原始积累过程的进展而使农民分化日趋激烈，地主与佃农的对立愈益尖锐，如果把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来考虑的话，自由民权运动应当说是从八十年代前半期这个空隙中冒出的极为过渡的不正常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11]。

① 关于群马事件的研究有：后藤靖《关于明治十七年的诸激烈事件》（堀江英一、远山茂树编《自由民权期的研究》第 2 卷），下山三郎《明治十七年自由党的动向和农民骚动的情况》（同上书第 3 卷），江村荣一《自由民权运动》（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讲座日本史》5），稻田雅洋《群马事件及其背景》（《历史学研究》405 号）。

② 参照远藤镇雄著《加波山事件》。关于史料则有：野岛几太郎著《加波山事件》（东洋文库重印），关户觉藏编《东陲民权史》（《明治文献资料丛书》重印），《加波山事件关系资料集》。

③ 《自由新闻》（668 号，9 月 28 日）的社论《闻茨城县民暴举有感》中对于举兵一事进行辩解说："我党对此轻举妄动深为憎恶。但转念这些紧急行动究竟起于哪个地方呢？如果不是人民有严重困难的地方，那末只有在对身受此困难的人民发出最深切同情之感的地方才能发动，此外则不知有发生此种事变者……这些轻举妄动都是以局部而害全局的失策，因此我党不得不诚恳地警告我同志不能再陷于不得已而搞这种失策举动的境遇"。（重印版第 5 卷 297 页）。所以提出加波山之举与农民贫困的关

系，是想把党员“暴举”的责任归之于农民的贫困和政府的失政。接着在社论《国家心腹之患》(675号，10月7日)中关于借钱党说：“我党窃思此党派将来之变迁，决不止于债主与负债者之间的纷扰，一变而成为地主与佃农间之争论，再变则成为贵贱贫富之倾轧，最终成为单纯之复仇主义，亦未可知。今如不讲求扑灭此凶焰之策，其弊害将不知止于胡底”(同上书第5卷，325页)。所谓“单纯复仇主义”可能是心头中怀有俄国虚无党的恐怖主义的发言。

④ 《自由党史》中367页。

⑤ 《自由新闻》669(9月30日)，670、673、674号(10月5日)所载。1884年后半期该报论述对外问题的社论中也说，实现修改条约的最好手段，不在于扩充海军，而在于立宪政体的树立(修改条约并不难吗》618—623号)，俄国、英国、普鲁士、法国之侵略不足畏，“今日我邦宜以急内事缓外事最为得策”(《内外之缓急》629—631号)，并批判说，“彼欧洲人民，因东西人种不同，对东洋诸国常施偏爱，以行无道理之事，岂非我国人民所深恶者耶?”，这和中法战争时，主张我国宜据道义力量、博爱思想，坚持局外中立之态度的言论(《清法论》148号)相比，基本论据是不同的。上项社论的背后有姑息欧美的判断和轻侮中国的意识，是不能否认的。毫无疑问，这是“国权扩张论”对外意见大转变的宣言。

⑥ 《自由党史》(下81页)中关于解散的记载是“全场无一人唱异议者，全体起立通过解党”。但据《雪月花——西潟为藏回忆录——》载，由于事先作了工作，大势已决定解散，表决时有西潟等新潟自由代表五、六名反对，大会后还和大井宪太郎等十数名进行了秘密协议，可见这些都是非解散派(731页)。下山三郎在详细分析解散前的党内外形势之后说：“大胆说，可以断定，尽管尚有可以维持党的客观条件，却强行解散了”(《明治十七年自由党的动向和农民骚动的情况》前引《自由民权期研究》第3卷78页)，同西潟回忆录对照来看，这个推测大概是对的。

⑦ 井上幸治著《秩父事件》(中公新书)，同《秩父事件——其社会基础——》(《历史评论》26号，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自由民权运动》再刊)，江袋文男著《秩父骚动》，平野义太郎《秩父事件——其资料和分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收)。史料有《秩父事件史料》(埼玉县方面的史料)。

⑧ 关于饭田事件参照后藤靖《饭田事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人文学报》II，前引《自由民权运动》再刊)，关于静冈事件参照《静冈市史·近代》，原口清《静冈事件的社会背景》(静冈大学法经论集》3号)，此外参照事件关系者小池勇的自传(《历史评论》89、90号所载)。

⑨ 和农民结合的特殊事件是，名古屋的爱国交亲社率社员农民二百余名闯进岐阜县贺茂郡的户长公所，要求减低地税至百分之一，废除各种税，废除征兵令的1884年7月的贺茂事件。爱国交亲社是以城市贫民化的前草莽队员的士族(贫农出身)为中心，把组织扩大到农民的政社，曾经参加过国会期成同盟会，但后来和自由党对立。这次蜂起的最后目的也是要从名古屋监狱夺回以暴行罪而被逮捕的社长庄林一正，是利用农民的。爱国交亲社在贺茂事件前夕，被宣布禁止结社而分裂，其非蜂起派之一部与名古屋事件有关系(长谷川昇《贺茂事件》，前引《自由民权期研究》第2卷所收)。饭田

事件、名古屋事件时，有在大城市印发檄文五万份的计划，这或许和以城市贫民为主力的这个政社的性质有关系。后藤靖把贺茂事件也列入自由民权的激烈事件之内（《自由民权》中公新书，191 页）。

⑩ 《自由新闻》社论《论志士的责任》（687 号，10 月 22 日）说："古来泰西各国，其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无一非出诸人民大多数之希望者，我国今日之处境适与此相反，虽在人民大多数尚未有此希望之时，便不得不实行此一大改革也"，指出与欧美各国之条件不同，在缺乏立宪政体的被治者资格的人占国民大多数的今日，断然实行急遽的改革时，"我辈窃恐其成为'半上落下'（只是脱离人民的统治者的改革之意——引者）的改革，如退而犹豫，我辈深虑我国运愈益衰颓，终至无可挽回之时期也。呜呼，我帝国今日诚可谓处于进退两难之地位"。其结论是不可采取革命手段（前引书第 5 卷373 页）。这篇论文的主旨在于为解散乃不得已的判断做辩解，坦率地道出自由民权运动的特殊困难立场。

⑪ 关于自由民权运动的评价，战前平野义太郎认为"工业资产阶级、豪农地主的自由民权运动，是在藩阀官僚政府之下只停留在'希望'有限度的'开设国会'，从一开始就丧失了民主主义的实质。"对此，断定以半封建的佃农、贫农、小自耕农民为主体的福岛事件、秩父事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结构》177、173 页）。服部之总认为建议开设民选议院以及自由党是"'由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以秩父事件为顶点的明治 15 到 18 年的各次斗争，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正在进行中的农民革命（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对自由民权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做了较高的评价（《明治维新的革命和反革命》《服部之总著作集》(1)85,89页）。战后 1955 年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堀江英一、后藤靖等人的共同报告，把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过程划为士族民权→豪农民权→农民民权等各阶段，并断定以秩父事件为代表的农民民权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纯化"（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与民族》，堀江英一著《明治维新的社会结构》）。对于这样高度评价各激烈事件的研究动向，井上清强调了日本国民首次具有了全国性的政治结社，以及具有天赋人权论和国民主权理论的意义（《关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历史的评价》载于《思想》379 号）。此外，大石嘉一郎论证说，从国内的条件来看，是由资产阶级的发展即农民阶层分化的初期阶段所规定的初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本来是专制主义成立期的农民斗争）；但在正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世界史的发展阶段上，在完成了高度发展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实行的天皇制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的整个机构中，运动所处的位置是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本来是地道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两者间的空隙则由小资产阶级领导者们鼓吹输入的革命思想来补填了（《日本地方财行政史序说》293 页）。六十年代以后研究角度的中心是和大石的这种见解有关联的。历史学研究会编《明治维新史研究讲座 5》，后藤靖《自由民权运动研究的成果和课题》（《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所收）。

第三节 钦定宪法的制定

甲申事变

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建成是在1890到1900年间，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方面的动向已经明显，东亚也被卷了进来，成为日本政治形势开始大转变的契机，这就是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1882年签订三国同盟，同年英国占领埃及，1883年法国变安南和东京为保护领，紧接着是中法战争。不仅是列强对瓜分世界后剩下的地区加紧侵略和加强现有殖民地的统治都更为明显，而且正象1884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所表现的那样，它们在尖锐的对立中，既竞争又联合，开始形成了使殖民地统治更加深化的世界体制。从受欧美列强压迫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在一国的侵略必然引起几个列强的共同侵略的情况下，从已形成体制的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摆脱出来是极其困难的。在1884年的甲申事变和中法战争的背后，开始了这种世界史的结构的变化。

壬午事变之后，中国越出了从前朝鲜国王从属于清朝皇帝的宗主权的范围，采取了实际上加紧统治朝鲜的政策。这是为了同日本的侵略朝鲜政策相对抗。李鸿章推荐马建常（马建中之兄）和德国人穆麟德为朝鲜政府的外交顾问，使袁世凯训练朝鲜军队，提供近代武器，同时又驻扎了很多中国军队。随后于1882年10月缔结了清韩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依此规定朝鲜为中国的"属邦"，中国人除具有领事裁判权之外，还获得了能够在朝鲜内地购买货物等没有许给其他外国人的贸易上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中国想借欧美列强的力量阻止日本的侵略，劝告朝鲜政府于1882－1886年同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结果彻底地向世界资本主义开放了。另方面在朝鲜的官僚内部，企图拥戴国王

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金玉均等开化派（独立党）扩张势力，从对抗中国的压迫和反对亲清的闵妃派（事大党）的立场出发，接近日本。围绕统治朝鲜而同中国加深对立的日本想利用他们当亲日派①。

1884（明治17）年，因法国侵略越南爆发了中法战争。8月，法国舰队攻击基隆和福州，清军败北。这次战争，作为欧美列强开始侵略东亚的征兆，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福泽谕吉预测说："难以期望庞大的东洋老大帝国他日不会陷于瓜分龟裂，成为西方数国所分有"②。外务卿井上馨认为这是从朝鲜赶走清国势力的好机会，策划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法国方面要求和日本合作的情报，更加助长了他的企图。在这之前，金玉均来到日本，向井上、福泽和后藤象二郎等求援。福泽和后藤为金玉均奔走政治资金的借款，福泽还派门生井上角五郎前往朝鲜，使他援助开化派。又据《自由党史》载，后藤和自由党干事小林樟雄同板垣退助一起去访问法国驻日公使，说明朝鲜的"独立"计划，请求给开化派一百万日元的借款，对此法国公使以个人资格表示赞成，并提出法国向朝鲜派遣舰队。这个阴谋计划由后藤泄露给伊藤博文，为井上所得知，促进了他的积极政策。这个传说虽然难以如实地相信③，但是在甲申事变背后利用中法战争，想通过同法国合作来推行侵略朝鲜的外交政略，确是事实。

这时金玉均派正在和公使竹添进一郎、井上角五郎密谋策划武装政变④。于是12月4日，在汉城庆祝新建邮局开幕的晚宴席上，日本人刺客袭击了闵氏派要人，金玉均、朴泳孝等乘此混乱，在日本守备队的支援下占据了王宫，把国王置于势力之下，建立了开化派政权。新政府发表了废除同中国的宗主关系等各种改革方针。

对此，接到请求救出国王的清军出动了，打败了少数的日本军，开化派政权只维持了三天就垮了，竹添公使同金玉均等亡命者

一起逃回长崎。在这混乱期间的汉城，日本侨民有三十人被杀。日本政府以井上馨为全权，率军舰七只开往朝鲜，第二年的1月7日，在汉城开始谈判，同时为了防备万一，动员海陆军集结于下关。井上因为抱有“竹添公使所作所为，是否违法，必将决定这次事件是否有理”⑤这样理屈的想法，所以在交涉时反而用了“强硬的手法”。结果1月9日缔结了汉城条约，朝鲜除向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外，还同意由朝鲜出钱给日本守备队修建宿舍。这就是强迫朝鲜承认公然以武力干涉朝鲜内政的日本公使馆的行动。这就是甲申事变。⑥

中国鉴于正在进行中法战争，还有日法缔结了相互援助密约的传闻，便采取对日妥协的方针；1885年4月，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签订了事变善后的天津条约。其内容为日清两国以四个月为期由朝鲜撤兵，如果将来朝鲜的变乱严重化，日清两国或者一国派兵时，首先互相行文照会，事件平息时立即撤兵。这是后来甲午战争的开战交涉时，陆奥宗光外相作为“表示两国对朝鲜具有平等权力的唯一明文”用来做为口实的条约⑦。

侵略的国内舆论

据说金玉均在起事时认为无论中国和日本都在全神贯注于国内事务，而没有余力，因此虽然利用日本的武力也能保持朝鲜的自主性。可是和两年前的壬午事变当时不同，日本官民对侵略的冲动都与时俱长了。不明真象的一般舆论谴责清国军队杀伤了日本人，东京的公、私立学校学生以运动会为名发动了讨清示威⑧。知识界和民权派也统一步调煽动侵略气氛。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带头主张立即对清开战，说要准备天皇的亲征，而立宪改进党的干部藤田茂吉、箕浦胜人、犬养毅、尾崎行雄认为应乘此次事变“干涉朝鲜内政，努力实行吞并”，并向伊藤参议献策说：“与中国之纠

纷，乃吾等为国家所最希望者也”⑨。旧自由党方面也不甘落后，《自由新闻》的社论《处分朝鲜》（1884年12月19日）主张占领汉城，恢复开化派政权，对清进行交涉，如遭拒绝则诉诸干戈。早在事变前的1884年8月，就以“区别国家之盛衰者无不在于外交政略如何”为宗旨，在上海成立了东洋学馆，其首倡者中，同国家主义者一起参加的有小林樟雄、杉田定一、植木枝盛等自由党干部，接着由末广重恭担任馆长。末广在三年前主张为了达到对抗欧美列强侵略的目的，亚洲各民族要为改良政治团结起来，而现在却为解决国内对立的弊端，促使人们的关心转向海外，希望东洋学馆为此进行活动。这种使青年关心转向海外的话，福泽也说过，上述《自由新闻》的社论也这样主张，这就是当时知识界人民和政治家的所谓舆论⑩。

脱离了对专制官僚政府进行斗争的战斗行列，是自由民权派转向侵略论的根本原因。而加快其行动的是对这时国际政治重大变化的认识，以前以防御的军备论和小国联合论为内容的改良内政优先论，在国防危机的重压面前轻易地崩溃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朝鲜问题的背后，有欧美列强“联合”侵略的危机迫在目前⑪，俄国要求使用朝鲜东岸的永兴湾，对此英国于1885年4月占领了朝鲜南岸的要地巨文岛，这些事件以事实印证了这种危机感。当时在阿富汗，英国和俄国的对立尖锐化到发生战争的危险程度。由于中法战争、甲申事变、巨文岛事件，使东亚在1884到1885年被纳入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在帝国主义之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是放弃其本来的革命任务，变成把本国化为帝国主义的动员民众的组织呢？还是转化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以至倾向社会主义呢？二者必居其一，自由民权派走上了前一条道路⑫。

甲申事变的第二年1885年，发生了自由党反干部派的领袖、在关东的激进派中拥有势力的大井宪太郎等，推行援助朝鲜开化

派的举兵计划，11月，因被发觉而遭逮捕的大阪事件。大井在公审法庭上陈述说，他们的举动，不是想侵略朝鲜，而是出之于日朝两国人民互相同情怜悯和患难相助的“好心主义”；但另方面的意图则是，为了打开民权运动的沉闷局面，以朝鲜问题为契机，掀起同中国的对外危机，以此迫使政府对轻率的镇压方针进行反省，用来促进国民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认为除非把国民政治意识煽动和助长成为军国主义，谋求自由民权运动的再起是不可能的。这就表现出当年自由党“左派”的形象[13]。

修改条约问题和大同团结运动

继甲申事变之后，修改条约问题把自由民权派拉到国家主义阵营来了。修改安政不平等条约，作为我国完成独立的主要条件，是朝野上下一直迫切希望解决的课题。政府早在1871（明治4）年岩仓大使巡访欧美时就向缔约各国表示了这个意图，自由民权派对于1881年为对抗外国商人的专横在横滨设立联合生丝存放站予以支持[14]。以这种舆论为背景，外务卿井上馨于1880年7月开始修约的预备交涉，1886年的6月才努力达到正式交涉的开始。他想要采取“唯有把我帝国和人民化为欧洲国家那样和欧洲人民那样”的欧化主义政策，制定“泰西主义”的法律，以此取得欧美各国的信任，来逐渐实现撤销治外法权。为此，政府连日在高官、华族同欧美人进行交际的场所鹿鸣馆里，举办西洋式的宴会和舞会，奖励和夸耀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的欧化。传统的演剧、音乐、美术也迎合这种风气，出现了改良运动，甚至还出现了日文的拉丁化，和通过与外国人结婚的人种改良论。这就是所谓鹿鸣馆时代。

可是，极端保密的交涉内容，一旦从政府内部泄露出来，反对的声浪就高涨了。尤其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任用外国人法官以及制定法律要经缔约国家承认诸点，被认为有伤国权，受到政府内外的

谴责。在政府方面有以农商务相谷干城为首，鸟尾小弥太、三浦梧楼、曾我祐准等将官，和元田永孚等宫廷派起来反对，外务省翻译局次长小村寿太郎联合民间的国粹主义者掀起了反对运动。因此，1887(明治 20)年 9 月，井上辞职，修改条约的交涉中断了⑮。

这时自由民权派认为是挽回势力的好机会，批评政府的对外方针屈从软弱，一味地诉诸国民的国家主义意识。10月，后藤象二郎召集各民权派的代表，号召"把眼前腐败已极的空气变成新鲜的(中略)，使同胞进而把独立不屈的国旗飘扬于海外"，发动三件大事的建议运动，同时策划不仅旧自由党员也包括立宪改进党员在内的民权派的团结，展开大同团结运动。所谓三件大事是减轻地税、言论集会的自由、挽回外交的失策三点，而其重点在于攻击修约交涉，抬出国家主义者谷干城为领导展开了运动。自由民权派攻击政府的内外失政，秘密出版了包括格奈斯特(H. R. von Gneist, 1818—1895，德国法律学者。——译者）的讲义笔记和罗埃斯勒(K. F. H. Roesler, 1834—1894，德国法律学者，外务省顾问。——译者)的宪法草案在内的《西哲梦话》，揭露了政府准备的宪法草案是具有普鲁士式专制内容的。伊藤博文内阁（1885 年 12 月创立内阁制度）最害怕反对修约变成批判钦定宪法。伊藤首相在地方长官会议席上申明镇压方针时说，对宪法的亲裁提出异议，或把属于天皇大权的外交交给人民公议，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于是 1887 年 12 月，在整个东京部署了警察和军队之后，公布了保安条例，以"有阴谋和教唆内乱并妨碍治安之虞"为理由，命令五百七十名民权家退到距皇宫三日里以外之地。还有，为了分裂大同团结运动，起用立宪改进党的前总理大隈重信为井上的后任外相，接着在 1889 年 3 月，后藤被任为邮政大臣，参加了黑田清隆内阁。因此，大同团结运动立即陷于四分五裂⑯。

在大隈外相的修约方案中，大纲是踏袭井上案的，但任用外国

人法官只限于最高法院，取消了编纂法典要预先取得各外国承认的规定，此外，改变了井上的列国会议的方式，采取同各国分别交涉的方式。于是取得了德国和美国的同意，但1889年4月，这个内容在《伦敦泰晤士报》上一经登出，旧自由党员又掀起了反对运动。不过大同团结运动已经分裂，运动的主导权掌握在鸟尾、谷、陆羯南等国家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手里了。在阁内也有人认为采用外国人法官是违反宪法的意见，10月，大隈被右翼的玄洋社社员来岛恒喜用炸弹炸伤，黑田内阁实行总辞职，修约交涉又告中断。

制定宪法的准备

1883(明治16)年8月，由欧洲回来的伊藤博文，第二年3月，为了准备起草宪法，在宫中设置了制度调查局，自任长官，并兼任宫内卿。他闭居宫中，准备应付预料可能出现的"各种诽谤邪说"⑰。首先搞出来的是同年7月制定的华族令，为了加强上院的中心——华族，除旧诸侯，公卿之外，加上士族有功勋者，对他们授与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萨摩藩和长州藩出身者占过半数的旧藩士"功臣"三十二名列为华族(包括旧华族，共五百零九人)，接着，1887年5月又追加十七名，其中有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和大隈重信。板垣因旧自由党员有反对意见而辞退了，但政府逼迫说要与皇室为敌吗？强使其接受了伯爵爵位⑱。

1885年12月，废除了太政官制度，建立了欧美式的内阁制度，结束了只有亲王和公卿才能充任大臣的传统，并规定辅弼国政的责任由总理大臣和各省大臣各自单独负责，明确了宫内和府中(政府)之别。于是三条太政大臣改任内大臣，进入宫中，伊藤担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了内阁。随后，作为立宪制的前提和防壁，整顿和加强了官僚制度。过去士族官僚的徇情任用改为按资格任用，根据1887年7月的"文官考试试补及见习规则"，建立了

任命中级官僚判任官的普通考试，和为任命高级官僚的高等官的高等考试制度。尤其以法律知识为主的高等考试和对帝国大学毕业生给予免试的特权这种作法，使具有制定和运用法律的能力的人，在政权内部形成了拥有特殊地位的特权官僚势力。同时根据“高等官宦等薪俸令”（1886年3月）确立了敕任官和奏任官对下级官吏和人民的绝对优越的地位[19]。此外，根据修改官吏服务纪律（1887年7月），规定官吏首先应当对天皇和天皇的政府持忠顺勤勉态度。

山县内务大臣全力以赴的是整顿警察制度和地方制度的。山县聘德国人黑恩为警官练习所教官，使其培养警察干部；又根据他的建议，从1888年到1889年在全国设立警察分驻所，采取分散布置的方式，大量增加警察署的数目。这时还把从前的国事警察改称为高等警察加以充实。关于地方制度，1888年4月，公布市制和町村制，第三年5月，公布府县制和郡制，彻底修改了三项新法。内阁顾问德国人毛瑟建议组成自治体是宪法颁布前应当完成的急务。根据这个建议，山县以“与国家休戚相关”、“有财产并具有知识的有力人物”充任自治体议员，和以这些“老成练达的人士”组织众议院的“政略上的目的”为目标，改革了地方自治制。[20] 如后所述，所谓“老成练达的人士”的“地方名望家”，政党也对这些新的骨干寄与希望，而另方面，政府也要求他们承担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职责。市会和町村会的选举，根据缴纳市町村税税额多少，采用前者为三级，后者为二级的等级选举制；郡会是由郡内町村会议员选举的议员，和拥有土地的地价一万日元以上的大地主互选的议员来组成；府县会议员则是采用由市会、市参事会、郡会、郡参事会的成员选举的所谓复选法。总之，是对地方居民参加政治活动严加限制，保证资产者政治优越性的；是为达到山县所说的目的而周密编制的。根据这个新法律，町村除自治工作外，为了负担征税和户籍

等庞大的国政委托事务及其经费，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町村合并，1888年末的七万一千三百一十四个町村，到第二年末骤减到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个町村。这就促进了改变和重新编组从前的村落共同体的机能，使代替了旧“庄屋”和豪农地主的商人资本家的地主即地方名望家易于统治町村，通过他们，加强了政府的干涉和控制。

军制也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变更。随着扩充海军，1889 年 3 月，海军参谋部独立了；在陆军方面，1888 年 10 月，发出统一军内勤务令的“军队内务书”，企图用来确立以对天皇效忠和服从上级为中心的秩序，而更重要的则是 1889 年 1 月的修改征兵令。根据此令，免役条项大量削减，户主、嗣子、承祖孙等为了继承家系的免役规定全被废除了。此外，中等学校以上的在学者和外国留学生的免役也废除了，改为到二十六岁为止暂缓征召，对他们给以一年志愿兵的特权。还废除了教员的缓期征召制，改为师范学校毕业生一律服六个月的短期现役。这次修改的目的在于增强以对外战争为目标的常备兵力和增加预备役干部，当初制定征兵令的以四民平等为原则的国民皆兵理想，结合军国主义的强化，这才得到实现[21]。然而，阻碍其彻底化的却是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年志愿兵制和培养预备役干部，都是对地方领导层（当时中等学校毕业者在壮丁中是百人中有一，也就是所谓地方名望家的子弟）灌输军队精神为目的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还是产生了准许有产者在征兵上有特权这种矛盾。这次修改还以减少逃避征兵为目的，并且也是以此为前提的。还加上了严厉监督市町村的征兵工作和对逃避者实行首先征兵的条款，这意味征兵仍然没有摆脱实际是赋役或惩罚性的劳动。

学校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学校教育要适应资本主义秩序，这在森有礼文相改革教育制度时就着手进行了。学制里所标榜的国民皆学和为生产、生活的“实学”这种理想，随着为提高就学

率做出了努力和学校制度近代化的整顿，一方面好象是接近实现，而另方面实质上是更离远了。1886 年公布了小学令、中学令、师范学校令和帝国大学令，学校制度才首次整备成为一贯制。森文相的教育政策的根本精神在于人民的护国精神、忠武恭顺之风才是国家富强所需要的“唯一的资本”、“至大的宝源”，而培养这些的是教育，这是国家主义教育观。于是教育和学问截然分开；中小学校是教育的场所，大学是学问的场所；前者重视儒教色彩浓厚的道德教育和锻炼健康身体的体育，特别重视军事体操，并且训谕说：“学校的目的应以培养优秀人物为首要，而以培养学力为次要。和以前学力为第一，人物为第二是完全相反的”。此外，培养小学教员的师范学校，学费全部是公费，实行全住宿制度，每周有六小时军事训练，校内从教员和学生的服装起完全是兵营化。此外还采用了上述的短期现役制。大学则与此相反，使其专心引进和摄取欧美先进国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文化，帝国大学令高唱“以教授适应国家需要的学术和技艺，以及研究其精华为目的”，指明从国家目的出发的重视研究的方针。森所创设的教育制度，成了后来教育体系的基础㉒。而森的教育政策所表明的典型的文明开化主义、传统的儒教主义和强兵的军国主义之间分工与协作的组合，正是下述钦定宪法的原理。

宪法的颁布

1886(明治19)年 6 月，伊藤博文和法制局长官井上毅、首相秘书官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一起在极端保密中着手起草宪法。其重要参考资料是外务省法律顾问德国人罗埃斯勒的草案。第二年的10月，原型已大致完成，被称为“十月草案”，是对在夏岛（神奈川县金泽）的伊藤别墅起草的“夏岛草案”，根据井上和罗埃斯勒的意见加以修改的。1888 年 4 月中旬，征求毛瑟的意见之后脱稿㉓。

另方面，皇室典范草案的制定也是在伊藤博文手下进行的。早在1881年的岩仓具视的大纲领中就规定帝位继承法载在皇室宪则，宪法中无需记载，后来这个方针没有改变。1886年6月，起草《帝室典则》，提交给三条内大臣，随后经帝室制度调查局总裁柳原前光、井上毅、罗埃斯勒、伊东巳代治等研究讨论，1888年4月脱稿。

1888年4月设立枢密院。这是天皇的“至高顾问之府”，枢密顾问官十七名，除公卿东久世通禧、旧幕臣胜安芳、熊本出身的元田永孚之外，由萨州四人、长州三人、土佐四人、肥前三人的藩阀势力所把持。伊藤任议长，首相改由黑田清隆担任。这一年的5月，举行枢密院开院式，提出宪法草案和皇室典范草案交付咨询，6月开始的会议是在天皇出席之下举行的，第二年1月审议完毕。为了严防草案在这期间泄露出去受到社会议论，通过决议规定出席枢密院时由书记官手交议案，退院时一定交回。审议的结果虽然做了字句和其他小的修改，但并没有涉及到根本的重要变更[21]。

1889(明治22)年2月11日，天皇在宫中的贤所，对皇祖皇宗宣读制定皇室典范和宪法的文告，在文武官僚参列的宫中正殿授与内阁总理大臣，以这种形式公布了宪法和议院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贵族院令等附属法典。纪元节之所以定在这一天，是为了给国民以这样的印象，即虽然采用了宪法，但以神武天皇即位为国家起源的天皇制国家的国体，并没有丝毫变化。

① 关于金玉均、朴泳孝等“开化派”的评价，山边健太郎说，这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其思想和行动没能摆脱封建社会的框子。然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金玉均研究》断定为在当时具有最进步的爱国志趣的“资产阶级改革派”，其所以向日本要求援助，是想利用“在朝鲜互相对立的侵略势力间的国际矛盾”(日译本165页)。此外姜在彦把开化思想摆在十七世纪以来发展的实学思想开展的线上，断定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朝鲜近代史研究》80页)。对开化派评价的不同产生了对朝鲜史中甲申事变意义的不同理解。见山边健太郎《朝鲜改革运动和金

玉均》(《历史学研究》247号)和朴宗根《朝鲜近代改革的推移》(同上杂志300号)。

② 《东洋的波兰》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75页)。

③ 《自由党史》下126页。对于这个记载，山边健太郎说，完全是虚构的(《关于甲申事变——尤其有关《自由党史》的错误——》(《历史学研究》244号)。对此彭泽周说，据法国公使桑基厄维兹(Sienkiewicz, J. A.)的文件载，板垣、后藤和公使的会见以及板垣的提议都是事实，但公使答应借款和派遣军舰之事并非事实(《围绕朝鲜问题的自由党和法国》同上杂志265号)。此外，上述法国文件中公使致外交部长的信函说："据他们(板垣、后藤——引用者)看来，法国应当是日本人的模范国，他们希望法国对远东问题的影响更要加大"，信函还记述板垣等提出，作为借款的保证，把朝鲜的矿山开采权让给法国。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摆出了自由民权思想→依存于欧美先进国家→对亚洲各国的蔑视和侵略的理论。

④ 事变后井上外务卿的调查报告《查明事实始末书》(《秘书类纂·朝鲜交涉资料》上卷所收)中说：竹添公使始终和这个事件没有牵连，但是11月12日的竹添向伊藤和井上提请在"以煽动日本党掀起朝鲜的内乱为得策"的甲案，和"不使同清国发生事端"的乙案中，决定采取哪个方案；而在收到政府决定采取乙案的训令之前，竹添就执行了甲案，真相大概是这样(前引山边《朝鲜改革运动和金玉均》)。此外，在政府内部支持竹添行动的动向很强，这从12月19日井上毅致伊藤、井上和吉田外务大辅的信函，以及同月27日井上致伊藤、井上、山县、松方的信函(《伊藤博文关系文书》(1)、349、351页)可以看出来。

⑤ 1885年2月2日，井上馨致伊藤的信函(《伊藤博文关系文书》(1)，190页)。另有1884年12月28日井上馨致伊藤书(同上书189页)。

⑥ 关于甲申事变的经过，除注①和③的论文外，还有田保桥洁著《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事变关系者的记录有金玉均《甲申日录》(《秘书类纂·朝鲜交涉资料》上卷中的《金玉均自书日记》)。此外关于《甲申日录》的史料价值有山边的《甲申日录研究》(《朝鲜学报》第17辑)，以及对此进行批判的金思亿《关于〈甲申日录〉》(前引《金玉均研究》所收，但日译本中删去)。还有福泽谕吉记录的《京城变乱始末》(《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所收)，外交史料则有《日本外交文书》第17卷和金正明编《日韩外交资料集成》第3卷。

⑦ 陆奥宗光著《蹇蹇录》(岩波文库)24页。

⑧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感受事例，1884年12月东京专门学校学生上书伊藤博文慨叹"损坏我帝国之名誉与权威"，披沥了"发扬国威"的决心(《秘书类纂·外交篇》中卷172页)。

⑨ 臼井胜美《修改条约和朝鲜问题》(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4》所收)。

⑩ 福泽谕吉说：政治言论过激的贫穷不平的书生"如富贵不求之于内，可去海外之地"(《贫富论》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所收)。关于东洋学馆参照田中正俊《中法战争和日本人之中国观》(《思想》512号)，山田昭次《自由民权时期的兴亚论和脱亚论》(《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6集所收)。

还有后来的记述，马场辰猪《日本之政治状态》(1888年，原文为英文)认为"全面得

到本国外务大臣信用的日本公使的行动是非常不名誉的，而且是不可理解的"，"这样不名誉的事件，只让朝鲜国民付出了牺牲，而由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解决了（中略）。只就日本政府来说，往昔日本武士的高尚纯洁的精神消失了，而由懦怯和无信不实的精神所代替"，这样批评的是例外的言论（《明治文学全集——大井宪太郎·植木枝盛·马场辰猪·小野梓集》296 页）。

⑪ 1884 年 11 月，驻俄公使花房义质建议，应乘中法战争之机占领台湾，书中指出"现今欧洲正在联合，保持和平，以余力倾注亚洲和非洲"，"欧洲人称雄于五洲已二百年，今后将更加跋扈"（《秘书类纂·外交篇》中卷 184 页）。立宪改进党的尾崎行雄于 1884 年 12 月以"勿使中国、朝鲜增长倨傲之心"，指出欧洲列强侵略朝鲜之危机迫在眉睫，说"使欧洲列强窃据朝鲜之害，犹如弃九州或四国，任德、俄、英、法割据也"，认为朝鲜问题直接关系日本安全，主张强硬政策（《尾崎咢堂全集》第 2 卷 117 页）。

⑫ 自由民权运动始终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这里有着帝国主义阶段前夕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之一。早在 1879—1881 年时，许多民权派论述，为了预防在日本出现社会党，应采用立宪制（林茂《自由民权论的社会局限——关于其社会党论的考察——》《国家学会杂志》第52卷 8 号，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自由民权运动》再刊），及至自由党解散时，关于同困民党（借钱党）的对立→对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批判→向合法主义及体制内改良后退的观点更加明确化了。关于其社会主义批判参见《自由新闻》的社论《论虚无党复仇主义》（681 号）、《炸药》（689 号）、《自由主义的旺运》（710 号）。

⑬ 平野义太郎著《马城·大井宪太郎传》，另外，关于史料则有事件关系者福田英子的自传《我的半生》（岩波文库）。此外，关于平野对于大阪事件和大井评价的批判，参看平野前引书的复印本所附平野义太郎、福岛新吾编著《大井宪太郎研究》。

⑭ 1881 年 9 月生丝推销商人设立横滨联合生丝存放站，以便统一同外商交易，或直接进行出口，遭到外商的拒绝，引起纠纷，各地的大商人和商业会议所声援存放站的"恢复商权"运动，自由民权派也通过报纸和讲演会进行了支援。参照海野福寿著《明治的贸易》、铃木良《明治十年代的外国贸易和资产阶级》（《日本史研究》35 号），山田昭次《横滨联合生丝存放站事件和自由民权派各报的论调》（《史苑》26卷 1 号、27卷 1 号），《横滨市史》3 卷上。

⑮ 山本茂著《修改条约史》、井上清著《修改条约》（岩波新书）。史料则有《修改条约关系大日本外交文书》第 2 、3 卷，《世外井上公传》第 3 卷。

⑯ 大同团结运动起源于 1886 年 10 月的全国有志联谊会，是由星亨、末广重恭、中江兆民等人发起的，是为准备开设国会，呼吁一切在野势力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大的民党。可是，正赶上发生了修改条约问题，从1887 年 9 月起，发展成为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口号的三大事件建议运动。其主张的重点之一是国际形势紧迫下的民党大团结。1887 年 11 月在长野的信浓大联谊会上兆民讲演说："俄国一朝将取函馆，英人将取巨文岛。在此紧要之际兄弟不可吵架。'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诸位！彼此停止了兄弟吵架罢（中略）。今日的日本十分危急，不要兄弟互相吵架，招来不幸"（松永昌三著《中江兆民》189页）。主张的第二个重点是，旧型的民权家"壮士"和县会议员、地主、豪商

⑧

等"绅士"的"地方有志者"间关系的密切化,即实现后者的优越性。后藤说:"豪农和豪商对政治社会是最尽力的,在欧美各国,豪商等特别有势力",促其奋起(鸟海靖《帝国议会开设前"民党"的建成》《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科纪要》28辑·《论集日本历史10·自由民权》再录)·并且说:"成为时势之通弊,如绅士不容壮士,壮士不靠绅士,而经常分裂,殊非善处团结之良策"(三宅雪岭著《同时代史》第2卷345页)。这种性质的大同团结运动,结果只能演成以地主、资产阶级为中心、并偏重于国权论的政党的重建,和国会议员候补者选举地盘的开拓。此外,参照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庄司吉之助《大同团结运动与政党成立》(堀江英一、远山茂树编《自由民权期研究》第3卷所收)。

⑰ 伊藤就任制度调查局长官的第二天致三条实美的信(《伊藤博文传》中卷373页)。

⑱ 伊藤在1887年6月5日致井上馨书中主张不能准许板垣辞职说:"据我看来,他(板垣——引用者)平素的言论和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有共同之处,因此,我想当前必须使他明确认识他那套民权主义毕竟是我朝廷所不容的,为王室前途有害之物的大义"(《伊藤博文传》中卷533页)。

⑲ 据藤田茂吉《第一回国会始末》载,大臣的薪俸为工人平均工资的八十一倍,帝大毕业后六年就能当上各省局长的薪俸为工人的四十七倍,是突出的高薪,从而产生了"人人竞相走上宦途,而刻苦勤奋于独立自营之事业者几稀"的风气(《明治文化全集·正史篇》下521页)。

⑳ 1888年11月,山县内相在元老院会议的演说(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191页)。公布市制、町村制时附带了"保持和重视邻保团结的旧习惯,并益加扩充"的上谕,表明予以重视的意思,因为"旧惯"势在必变,所以特加强调。

㉑ 反山县派的将官集团月曜会(曾我祐准、鸟尾小弥太等)之一员三浦梧楼怀法国式的军制思想,1889年写出《兵备论》。其内容是以防御作战为目标,主张军备应从适应国家经济的见地出发,三年之兵役缩短为一年,根据护乡军(国民军)的办法改革军制。这个意见得到自由民权派的支持,对中江兆民的"土著兵论"给予了影响。而修改征兵令在性质上是和这样改革意见对立的(松下芳男著《明治军制史论》下卷135页)。

㉒ 中内敏夫《"国民"教育之方式》(岩波讲座《现代教育学》5所收)。大久保利谦著《森有礼》。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此外,1891(明治24)年11月,文相大木乔任在训令中说,"贫弱之人也从事于学问时,自信其可以获得一身之显赫,不计其资力,徒费岁月,终至酿成一身一家之不幸和一国之不利,这是目下教育之通弊也"(《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展史》第3卷130页),他这样说是继承了森的民众教育的理想,和从正面否定学问、教育的身分差别的学制精神有很大差距。

㉓ 稻田正次著《明治宪法成立史》下卷,屋佐竹猛著《日本宪政史大纲》下卷。主要史料,关于宪法归纳在《秘书类纂、宪法资料》上卷,关于皇室典范归纳在《帝室制度资料》上卷中。

㉔ 枢密院的审议情况,见清水伸著《帝国宪法制定会议》。

第三章　天皇制的矛盾和甲午战争

第一节　明治宪法的性质

宪法与天皇制

1889（明治22）年2月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有以下各种特点。帝国议会的权限以及国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天皇大权的严格限制。天皇拥有制定行政各部门的官制，规定文武官的薪俸和加以任免的大权（第十条），而且为了执行法律或为了维持公共的安宁秩序，得以发布命令（第九条），并拥有根据紧急需要，在议会闭会期得以发出代替法律的敕令（第八条）的独立的立法权。天皇拥有宣战、媾和和缔结条约的大权（第十三条），无需经过议会承认。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一条），决定军队的编制和常备兵额（第十二条），议会不得干预军事。预算的审议、讨论通过，是和法律的讨论通过同为议会的中心权限，但是，如果议会没有讨论通过预算或者预算没能成立时，规定政府得以实行上年度的预算（第七十一条），削弱了议会在预算上对政府的约束力。关于行政权，国务大臣"辅弼"天皇，对其负责（第五十五条），基本上采取了责任内阁的立场，但大臣的政治责任，对天皇是直接的，对议会则是"间接的、道德上的责任"。①

国民的基本人权大体上有了保证的规定，但却是以天皇恩赐给国民为原则的，并且附带着"在法律范围内"、"除法律所规定的场合之外"和"只有在不妨碍安宁秩序以及不违背臣民的义务之下"的限制。这意味天皇和政府具有限制国民权利的权限。以在枢密院会议中分发给顾问官的逐条说明书为蓝本而制定的《宪法义解》稿本说，"自由是在有秩序的社会下生活的意思"，而"法国的人

权宣言(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引用者)所说天赋的自由，是只要不妨碍他人的自由，就不受任何限制的说法，不过是妄想的空论②”，从而完全否定了自由民权派的天赋人权论。

帝国议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两院构成。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权只限于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在所居之府县内缴纳十五日元以上直接国税一年以上(缴纳所得税时为三年以上)的男子。而被选举资格为三十岁以上的男子，具有同等的纳税条件者。所谓缴纳十五日元地税的人，虽然各地有所不同，却是具有田地一町半到二町程度的人，也就是地主。1890 年第一次大选时的有权者总数为四十五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约百分之一点二四。选举人这样少而且最初的投票是记名的③，这一方面是便于官宪干涉选举的条件，另方面也是便于政党巩固其选举地盘的条件。贵族院除众议院有预算先议权外，其他权限与众议院完全平等，对众议院有很强的牵制力量。并且是以皇族、公爵和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之同爵中互选的；因对国家有勋劳或者有学识而由天皇任命的(敕选议员)；以及各府县内缴纳直接国税最多者的前十五名中互选的敕任议员(即多额纳税者议员)为其成员的。于是华族、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这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盘踞于贵族院。

以这样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原来就考虑这样很难凭国民舆论加以变更。只有天皇拥有修改宪法的动议权，即以敕命将议案提交议会讨论(第七十三条)，而且规定组成贵族院的贵族院令并不是法令而是敕令，其修改和增补需要通过贵族院(贵族院令第十三条)，以使众议院无法干预。加之，在枢密院的咨询事项中载有宣布戒严、公布敕令、对外国交涉的条约和协定，以及最重要的有关宪法的条款或附属于宪法的法律和敕令等的草案和疑义，也就是具有所谓“宪法监护人”的作用。用此两道、三道防线来保卫这个“不可磨灭的大典”。

通过颁布宪法、采用立宪制，天皇制绝对主义的本质改变了吗？制定宪法的人们反复强调，通过采用立宪制，国体丝毫也没有改变。天皇的统治权来自皇祖天照大神的神圣，制定宪法"均不外乎绍述皇祖皇宗贻于后裔的统治的洪范"，这是向宫中贤所奉纳的"文告"中说的。伊藤在演说中说明了起草宪法的宗旨，他说欧洲的立宪制度的基础是宗教，但我国的宗教不能起这样的作用，唯独皇室可以代替它。因此，"在此草案中，以君权为基础，深望勿加损坏，而不依据欧洲的主权分立的精神"④。确立君权制度是明治宪法的基本方针，用以区别于欧洲的宪法原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立宪制是装潢天皇制绝对主义的，统治人民的原则实际上没有改变。⑤可是在另一方面，第一，颁布宪法是天皇制绝对主义对自由民权运动高涨作一定让步的产物；第二，也具有这样一个方面，即为了实现修改条约和挤入欧美先进列强行列而采取想有"西欧主义"的宪法和法律的政策取得了成果。特别是宪法制定者以后一个意图来装潢表面，尽管在最低限度的范围内，却对引进立宪制原理，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了说服。当在枢密院会议上对于法律和预算须由议会"批准"一事提出异议时，伊藤谆谆劝说，只有这一点是宪法上不能缺少的，是"熟悉立宪政体实质所必需的"⑥。如果从另外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是欧美人民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迫使绝对主义者总算承认了采取立宪制的原理。

在不改变国体的原则下，谋求维持和加强君权的方针，和必须承认立宪制的原则即限制君权的方针，两者并没有统一、固定，相互之间有间隙，两者的比重是可变的。这就要看国民这方面的努力如何，宪法的作用是有活动余地的。

政党的反应

国民以祝贺之声欢迎了宪法的颁布⑦。各报纸的论调几乎全

都表示欢迎⑧。自由民权系的报纸也不例外。正象一向对政府进行笔伐的《朝野新闻》所说的"制定宪法实在是东洋万国生民从来没有过的，而我国则永为其仪表"⑨那样，是从东洋最初采用立宪制和我国居领导位置这种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来赞扬文明开化的。还有象一向标榜平民主义的《国民之友》所说的"超乎预想的完美"那样，从原来估计议会是个咨询机关的角度进行比较而欢迎的⑩。大同团结派的机关报《政论》，认为"法的运用如何，显然要看国民的团结势力是否有所作为"，承认了立宪的运用余地⑪。又如土佐民权派的《土阳新闻》尽管对制定的手续和各条款有很多意见，却主张必须最谨慎和极郑重地下笔批判，似乎把自己的意见留待日后再说，考虑到对批判言论的镇压。⑫

欢迎和肯定的论据是各式各样的。不过，自从1881年以来，自由民权派没有为把自己的宪法草案提交国民讨论，也没有在国民之间为普及其宪法观而做出努力，这种影响，不论对于国民以及他们自己，都产生了削弱批判意识的结果。自由民权派的大势是丧失了对宪法进行批判的热情。大同团结运动分裂后，旧自由党系形成三派鼎立之势，1889年12月，板垣退助等土佐派发表建立爱国公党，翌年1月，中江兆民、大井宪太郎、内藤鲁一等人重建自由党、河野广中等结成了大同俱乐部。其中自由党根据中江的主张，在党议案的第一项中提出"上请国会，审察宪法"，但遭到政府否决⑬。后来，三派要求合并的呼声高涨，1890年5月，解散了三派的政社组织，决定"组织一个大的自由主义政党"，首先组织了庚寅俱乐部。接着，9月，加上九州同志会，结成立宪自由党，在党议中提出节减政费，减轻地税，修改有关言论、集会、结社的法律，以及废除保安条例和修改国会法、选举法等。但对于宪法本身的批判和修改的态度，则大为后退。

颁布教育敕语

大日本帝国宪法不仅以天皇的权力为根基，而且依存于天皇的权威成为不可缺少的条件。1889年10月，大限外相的修改条约交涉搁浅，黑田内阁总辞职之后，一时出现了三条内大臣临时兼任首相的变相局面，接着在12月建成了第一届山县内阁，但这个内阁是在天皇临席之下召开内阁会议的⑭。内大臣兼任首相和天皇出席内阁会议这种违反立宪政治原则的现象，虽然是暂时的，却是在刚刚颁布了宪法之后发生的，这说明了明治宪法体制的实质。

天皇既直辖军事，又直辖教育，这在宪法颁布之前和颁布之后都是一样。因为这是最需要天皇权威的部门。所有有关教育的法律，都是以不经议会审议的敕令发布的。于是1890年2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中，预防因召开议会而产生民心乖离的对策成了中心议题，文部省决定了应当立即确定德育的方针、挽救国民道德紊乱的意见。阁议讨论了这个问题，文相芳川显正秉承了天皇的要编纂教育基础的箴言的命令，而山县首相表示了在教育上也要采取发布和军人敕谕一样方针的见解。于是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中村正直(敬宇、原为明六社员)受文部省的委托撰写了草稿，但由于它一方面以忠孝为人伦之大本，同时又有洋学方式的表现而被否定；以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的草案为基础，加上枢密顾问官元田永孚的意见，在这一年的10月向首相和文相"下赐"了教育敕语。全国各学校举行捧读其抄件的仪式，作为学校教育的大本。此后，在教育上，抓住一切机会宣扬天皇的精神权威和人民对它的绝对信奉和服从。1891年6月，文部省规定了小学校庆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章。明治维新后，本来定为宫中仪式的纪元节*、天长节、神武天皇祭以及元始祭、春秋之皇陵祭、神尝祭、新尝祭，是华族和官吏的祝祭日，而根据这个规章，这些祭日要在各学校、由校长以下

教职员、学生以及市町村的官吏、学生的父母和当地居民等参加之下，举行礼拜天皇像，三呼两陛下万岁，校长捧读教育敕语，并作“涵养忠君爱国志气”的训话，齐唱庆祝歌的庆祝仪式，并规定是义务。

在教育敕语中，规定天皇是干涉和决定国民的道德观和社会观，并具有政治和道德（即代替欧洲的宗教）双重大权的存在⑮。学问和信教的自由，尽管附有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应该说是受到宪法保障。然而自从教育敕语发布之后，这种自由反而受到威胁。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久米邦武的古代史研究遭到迫害⑯，奉戴教育敕语仪式时，第一高等中学校教师内村鉴三的行为被认为对天皇不敬而受到责难，终于不得不辞职等等，说明这种反动气氛的嚣张。撰写文部省发行的教育敕语解说书《敕语衍义》（1891年9月出版）的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抨击基督教是超国家的世界主义，不重视忠孝道德，违反教育敕语，舆论界和教育界与此相呼应，一齐对基督教进行迫害。可是基督教徒方面，大多数认为敕语的内容是普遍的实践道德，因此与信仰并不矛盾，基督教同国家主义、忠孝道德可以两立。对迫害进行正面抗议的，只有植村正久、押川方义、岩本善治和柏木义圆等少数人⑰。

神道和基督教

宪法颁布之后，天皇所具有的权力和权威的性质反倒加强，也是以日本宗教的多神教的特质为基础的。维新当初的神道国教化制度和禁止基督教，虽然有过明六社员和自由民权论者主张信教自由，佛教方面也出现了岛地默雷（真宗本愿寺僧。——译者）的政教不应混淆的建议，但主要由于受欧美各国的谴责，由于国民对信仰的纯洁性不太关心而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地撤销了。信教自由的思想，比起政治自由的思想来，是不成熟的。

宪法出现之后，神社神道与宗教的教派神道不同，被置于宗教之外，其祭祀是和宫中的祭祀相结合的。神道还由于被解释为"报本反始"**的国民道德，国家的统治者天皇拥有神社祭祀的大权，以国民道德的决定者的形式，观念的祭政一致的思想得到复活。于是神社神道在行政中和教育中被广泛地采纳进来，形成了独特的国家神道性格。与此相反，从幕末起到维新时创始的民众宗教，大和的地主的妻子中山美伎所创始的天理教，备中的中农川手文治郎创始的金光教，以及武藏的地主伊藤六郎兵卫所开创的富士信仰系统的丸山教等，在同现有宗教对抗中，在教义里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和救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取得发展，但由于发展布教必须取政得府的认可，便被纳入教派神道的系列，与此同时，对政权的批判性质削弱了，从八十年代末起到九十年代，教义上强调起崇拜天皇和国家主义思想以及现世利益来了⑱。

把继承以家为单位的祭祀权纳入法律之内，加强了国家神道体制的，是1898(明治31)年起施行的民法(本来应当是规定资本主义生活关系的近代市民法)。对制定此民法具有很大影响的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穗积八束规定，家是在崇拜祖先、祭祀祖先之灵的家长之下实行精神结合的血缘团体，说崇拜祖先的宗教是奉戴"民族的宗室"皇室，团结一国一社会的基础⑲。然而传统的家族制度，实际上正处于解体之中。早在修改地税时，地照不是发给家而是给予个人；1889年修改征兵令时，取消了户主及其继承人的免役特权，选举权也不是只准许户主的了。随着行政机构的近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政权不再是以家族为媒介，而是直接针对国民个人的。尽管如此，天皇制则强调坚持封建家族的道德是维护国体的基础。大日本帝国宪法是立足于天皇大权中心主义和立宪主义两根互相矛盾的支柱之上的，教育敕语也是在献身于国家这种公的"近代的"伦理和孝亲这种私的传统的伦理之间，具有

不少空隙。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对于敕语的主旨解释为“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的两根支柱，为了联结这两者而打出“一国是由一家扩充的”这种家族国家观⑳。正处于解体化之中、法律也一度忽视的父与子的家族关系，如果不打个比方，就无法期待国民对天皇—政权怀有自然的和自发的服从感情，因此，家族主义思想不仅在教育上，在法律体制上反而不得不加以强调和重建。下述1892(明治25)年的关于民法法典的争论就是它的象征。

政府在1890年4月公布了民法的财产编、财产取得编、债权担保编和证据编，随后在同年的10月又公布了财产取得编(续)和人事编。都是从1893年1月1日起施行。原来结合修改条约交涉而编纂的这些法律的第一稿，是以法国民法为蓝本，在布瓦索纳德(G.E.Boisonade，1852—1910，法国法律学者。——译者)指导之下制定的，几乎完全否认了户主中心的传统的家族制度，但在司法省法律调查委员会和元老院的审议中，户主权、亲权和夫权被大大加强了。就连上述的公布民法(旧民法)还受到法学者(主要为英国法学派)的指责，认为缺乏国家思想、缺乏社会的伦常，1891年8月，穗积八束攻击说“民法出而忠孝亡”。在这种尊重旧习惯和拥护家族主义的气氛高涨中，1892年的第三届议会通过了商法和民法延期实行的法案，政府为了修改两法典设立法典调查会，从1898(明治31)年7月起，开始施行了明治民法，它是在法律上强制实行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对以农村共同体秩序为基础的身分制的租佃惯例起了苟延残喘的作用㉑。

能够从理论上批判国家神道的是基督教。基督教的传布借助于文明开化和欧化主义的风潮逐渐发展起来，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不仅渗透到大城市，甚至渗透到地方城市的知识界和中产阶级上层以上的社会阶层，对培养近代的思想和伦理起了作用。尤其由于1883和1884年的号称信仰复兴的骤然高涨，信徒数由1882年的

四千三百名，到了1890年猛增到三万四千名。然而这种趋势，在上述教育敕语刚刚发布之后的"教育与宗教的冲突"争论之后，在政府和保守派攻击为反国家的面前，就一下子停顿下来。不仅是外来的压迫强烈，基督教界内部也有弱点。传道不深入下层社会，越来越成为城市的、知识分子的宗教，在教会内部，出现了企图脱离教会机构由日本人自己经营教会的趋势，两者相辅相成，出现了日本化、国家主义化的倾向，组合教会的1895年的传道方针中(甲午战争的影响也很大)提出"宜尽父子兄弟之道"和"宜振兴国家，增进人类幸福"的口号㉒。基督教也丧失了抵抗国家主义和天皇主义的力量。

① 伊藤博文在枢密院的说明(稻田正次著《明治宪法成立史》下卷687页)。

② 伊藤博文著《宪法义解》(岩波文库)53页。

③ 选举人要在选票上注明住址、姓名，并须盖章。这种记名投票制是在1900(明治33)年修改选举法时取消的，这时选举权的条件—缴纳直接国税额降低为十日元以上，并撤销了被选举权的纳税条件。

④ 当1888年6月18日枢密院召开宪法草案第一读会时，伊藤议长阐述"此草案起稿的大意"如下。宪法实施的结果，是对国家有利呢？还是与此相反呢？还不容预断，"虽然如此，既然在二十年前已经废除封建政治，同各国开始了交往，其结果在为谋求国家的进步上，舍此奈无其他处理之良途何"。这话，如果反过来说则是不是因为国民的需要和要求而制定出宪法，乃是因为对外交际的必要和建立统一国家的不得已的结果而采用的。接着又说："在欧洲，立宪政治的萌芽已经有千余年，不仅人民熟悉这一制度，而且还有宗教为其基础，已经深入人心，人心统归于此。然而我国宗教之力甚为微弱，无一可以为国家之基础者(以下略)。在我国可以作为基础者唯有皇室，是以本宪法草案，专用意于此点，尊重君权，力求不加束缚(以下略)。在此草案中，以君权为基础，务期不加毁损，而不采取欧洲的主权分立的精神"。(清水伸著《帝国宪法制定会议》88页)。

⑤ 共产国际的1932年提纲《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指出："日本在1868年以后建立的绝对君主制，虽然政策上已有许多变化，而其手中仍掌握无限的权力，不断建立压迫工人阶级和进行专横统治的官僚机构。日本的天皇制一方面主要立足于地主这一寄生的封建阶级，另方面还立足于正在急遽致富的贪婪的资产阶级，并一直和这些阶级的首脑结成紧密的持久的集团，以相当的灵活性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日本的天皇制仍然保持着以相对的独特的巨大作用和伪装的立宪形态进行略加粉饰的专制的实质"。并且评论说："对天皇制的作用估价过低，认为

议会和政党内阁宛如独立于天皇制之外的独特的资产阶级国家形态，和天皇制并立，是根本的错误”。(《日本共产党纲领集》71 页)，在这之前，战前的讲座派服部之总说：把1848 年以后的普鲁士的“旧时专制王政的今天解体形态，同时又是波拿巴主义者的君主制存在形态的”“表面上的立宪主义”(Schein Konstitutionalismus)的规定套用于我国，“在明治 23 年以后的‘表面上的立宪主义’之下，资产阶级和新地主取得平衡，往往对主张无产阶级及其利益的社会主义者的运动进行不必要的镇压，用来供资产阶级进行威胁的宣传，长期维护藩阀、军阀、官僚、贵族们的政权，这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波拿巴主义又是什么?”(《明治维新史》青木文库本 115 页)，对此，平野义太郎进行批判说：“部分市民阶级成为立宪政体的参加者和共同责任者，在这个规模上，其专横主义的放肆理论披上立宪的外衣时，一方面参加议会的市民阶级上层成为补充官僚的庶民因素，另方面绝对主义理论则以宪法为媒介，演变成为官僚、官宪政治的实际的统治理论”，“国会，对于人民来说，不过是掩盖有司的官僚政治的立宪的装饰品(Dekorations-stück)”(《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192 页)。

⑥ 清水前引书 159 页。此外，可将伊藤的下述主张同注④中他的论点对照一下。伊藤对森文相主张将“第二章臣民的权利义务”改为“臣民的身分”的说法，进行反驳说：“森的说法可以说是要取消宪法学和国法学的说法。盖创制宪法的精神。第一在于限制君权，第二为保护臣民的权利，因此，如果在宪法中不列举臣民的权利，只记载责任，就没有制定宪法的必要了。”(清水前引书 218 页)。

⑦ “明治 22 年春，宪法刚一颁布，全国人民欢呼如鼎沸。先生(中江兆民——引用者)叹息说，赐与吾人之宪法果为何物？玉耶？瓦耶？尚未见其真实，而首先陶醉于其名。我国民何以如此愚狂。及接到宪法全文，先生通读一遍，唯有苦笑耳。”(幸德秋水著《兆民先生》《幸德秋水全集》第 8 卷 40 页)。

⑧ 1889 年 2 月 2 日，井上毅致伊藤博文书中，关于政党、新闻等待颁布宪法的态度，说“据社会上的情况报告说，政党或著作家、新闻家已经准备了解说文，只等添入正文条款的已有数十位，大有 11 日何其来迟之感。不是为了驳斥宪法，目的是要就便搭乘宪法这只船。”(《伊藤博文关系文书》1，388 页)。

⑨ 稻田前引书下卷 914 页。

⑩ 《拜读帝国宪法》(《国民之友》42 号)。作为如此评价的理由，举出国民的基本人权有了明文规定，对前途抱乐观说：“若此宪法不失其生命，不麻痹其威力，则我国民将永为自由民”。

⑪ 永井秀夫《明治宪法的制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 3》193 页)。

⑫ 稻田前引书下卷 919 页。又被认为是本文的笔者植木枝盛虽然消极但却肯定说：“本来是钦定宪法，而不是国约宪法。现以此 11 日制定宪法，和以前的欧美各国以人民为委员起草制定宪法，由国家议会讨论通过，然后由国家元首采纳公布，或由该国帝王裁决颁布之宪法相比，其制定程序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如何，确是诞生了叫作宪法的东西(中略)。而日本人民不失为有宪法之国的人民，日本不失为世界列国中一个立宪国的成员。”(同上书 919 页)。

⑬ 三十二项党议案之中，除了第一项审察宪法外，其他修改华族令和废除新华

族，废除华族世袭财产法，改革兵役和缩短服役期限，赋与议会的弹劾权，府县知事和郡长的公选，废除警察厅和取消巡警佩刀，枢密院和宫中顾问官改为名誉职等八项均被否决。警察当局指示说："对否决的条项不得加以议论"。兆民指出民权有两种，真正的民权是国民经斗争而取得的"恢复的民权"，随后又说："纵令恩赐的民权其量如何少，其实质与恢复的民权并无不同，故吾等人民理应善加保护，多方珍重，如以道德之元气和学术之营养培育之，则随时势之愈益进化，世运之日益推移，将逐渐丰富成长，以至与恢复的民权相比肩，此乃进化之理也"。(《三醉人经纶问答》岩波文库本195页)以国民的力量来培养此恩赐的民权的方策，是审议宪法的主张。关于兆民的思想可参照桑原武夫编《中江兆民研究》、松永昌三著《中江兆民的思想》。

⑭ 井上毅在制定内阁制度时曾经有过以阁议为御前会议的意见，起草宪法时也曾这样主张。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实现(稻田前引书上卷744页)，但在"山县有朋关于颁发教育敕语谈话笔记"中写道："近来陛下常临席阁议，可以说是后来的御前会议。"(海后宗臣著《教育敕语成立史研究》150页)。

⑮ 1890年6月20日，井上毅致山县书中，关于教育敕语同立宪政体的关系作了如下的说明："本敕语不可与其他普通政务上的敕语同样对待。所谓'天生聪明，为之君为之师'，虽属中国旧说，如果按如今之立宪政体主义说来。则是君主不干涉臣民的良心自由(英国、俄国，原则上保存国教主义，君主自兼教主者又当别论)。现颁发敕谕，指示教育方向，有别于政务上的命令，必须视为社会上的君主的著作公告"。(海后前引书198页所载照片)。在这种法律的解释的苦心背后，说明了不能不承认教育敕语是干涉国民的良心自由的。

⑯ 久米邦武的论文《神道是祭天之古俗》，是从"神事中多迷惑不解之误说，消除偏信神道、佛教和儒学的意念，进行公正的思考，乃史学的责任"这种立场出发，试作合理的解释，但招致以神道家为中心的抨击，认为是对皇室不敬和有损国体，1892年3月，久米辞职，登载此论文的《史学会杂志》和《史海》则以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被禁止发行。大久保利谦《神道祭天古俗论》(向坂逸郎编纂《暴风雨中的百年》所收)。久米的论文载于《明治文化全集·思想篇》。

⑰ 1891年1月，第一高等中学校举行恭迎教育敕语仪式时，内村根据基督教信仰对天皇的署名没有进行"礼拜"。他的真实想法并不是反对教育敕语，而是认为这是应当执行的，而不应去礼拜的。可是这一行为被谴责为不敬，被骂为国贼，他不得不辞职。植村正久在《福音周报》中写了《不敬罪与基督教》的文章，为内村辩解说："吾人不得不认为今日之小学、中学中所实行的对影像敬礼和对敕语拜礼，实类乎儿戏"，主张扫清此习俗乃国民的义务。(《植村正久著作集》(1)，289页)。登载押川、植村、岩本等人的抗议文的《福音周报》被禁止发行。柏木义圆的《教育敕语和基督教》(1892年12月)反驳了井上哲次郎抨击基督教是无国家主义的说法，说"陛下的诏敕绝不是踏入宗教学术领域，断定伦理原则的是非曲直，制止其物议等之非立宪的行为。"(《柏木义圆全集》第1卷27页)。

⑱ 参照村上重良著《近代民众宗教史研究》、《日本思想大系、民众宗教的思想》的解说。

⑲ 《家制及国体》(1892 年,《穗积八束论文集》258 页)。

⑳ 《敕语衍义》中说:"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即一国乃一家之扩大者,一国君主之指挥命令臣民,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嘱咐子孙无异"。近代以前的家族主义和近代的社会有机体论结合起来的家族国家观,具有以家族主义和共同体的秩序思想从下而上地支持绝对主义统治的机能。这种思想正式形成一种体制意识形态,是在日俄战争之后,但可以说在教育敕语中已有其萌芽。参照石田雄著《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和藤田省三著《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原理》。

㉑ 参照川岛武宜著《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福岛正夫著《资本主义和"家"的制度》,平野义太郎著《日本资本主义的机构和法律》,星野通著《民法典论争史》,宫川澄《论日本民法典论争的社会、经济的基础》(《立教经济学研究》第 5 卷 1、2 号,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明治政权的法的结构》再录),远山茂树《民法典论争的政治考察》(《法学志林》49 卷 1 号,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从民权论到国家主义》再录),熊谷开作著《日本近代法的成立》。民法施行延期派主张的一例,1892 年 4 月东京法学院讲师(江木衷、高桥健三、穗积八束、土方宁等)说:"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序、朋友之谊等乃我国固有之美德(中略)。今将采取由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形成的法典,适用于此社会,此非社交上之大革命而何?此事尚可。对其社会之纲常惯习不加考察研究,又不顾与取范于国家主义之钦定宪法相抵触,以至偶然引起此大革命,何其愚昧若此!"(熊谷前引书 172 页)

㉒ 参照隅谷三喜男著《近代日本的形成和基督教》,《明治文化史·宗教编》。

* 纪元节是明治初年规定的神武天皇即位日,2 月 11 日在宫中举行大祭,战后改为建国纪念日。天长节是现天皇的生日,战后改称天皇诞生日。神武天皇祭,4 月 3 日,根据传说神武死去之日而定的。元始祭是 1 月 3 日天皇在宫中纪念皇位开始的仪式。以上称宫中四大祭。神尝祭,是每年 10 月 17 日以新谷祭祀伊势神宫的仪式。新尝祭,是 11 月 23 日,天皇以新谷供献天神,地祇,并亲自尝食的仪式。——译者

** 报本反始出于礼记。郊特牲"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意思是受恩思报,不忘所自。——译者

第二节 初期议会的官民对立

第一届议会的动向

统治者期待通过宪法和立宪制度来确立和稳定天皇制的统治机构。然而,如前节所述,因为绝对主义的本质和立宪制的原理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政治、教育、宗教和家族道德等各个领域内,引起了新的矛盾。尤其在政治上,藩阀官僚政府操持议会很快就发生

了破绽，政府的危机，到甲午战争为止，一直在加深，而没有打开出路的办法。归根到底，这是在政党的口号或必然是政党最高目标的“休养民力”上所表现的要求减轻国民租税负担的迫切性，和天皇制军国主义已站在帝国主义阶段门前，正要转化为帝国主义时必然出现的强行远远超出民力负担的过大的扩充军备，这两者间的冲突所带来的矛盾的加剧。

1890（明治23）年7月举行第一次大选，选出了三百名众议院议员。投票率全国平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后来逐年下降，1898年的第六次大选为百分之七十九）。当选者属于哪些政党，暧昧不明，无法计算，大致是立宪自由党系一百三十名，立宪改进党系四十名，号称中立派的政府系的大成会为七十九名，自由、改进两派的得票率共为百分之五十三，自由民权运动和大同团结运动在开辟选举地盘上取得了成功。这从具有府县会议员和市议会议员经历的人占将近百分之七十之多上可以得知。与此同时，过半数的众议院议员是地主，其中多数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贵族院议员中，占多额纳税者议员半数以上的是五十町步以上的大地主。这两者是反映地主利益的有力表现。①

第一届帝国议会是1890年11月召开的。伊藤博文和中岛信行分别担任贵族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议会争论的焦点是岁出总额（经常、临时、补充）达八千三百三十二万日元的预算案。山县首相在施政方针的报告中说，为了维持国家的独立，不仅要保卫“主权线”（国土），而且必须保卫“利益线”（邻接地区），其“利益线”的焦点认为在朝鲜，为此陆军增加七个师团（八万），加上预备役、后备役共增加到二十万人，这和充实海军都是紧要的。②

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民党方面，以“节约政费”和“休养民力”为口号。对这个预算案试图大加削减，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通过了削减岁出总额的百分之十点六（八百八十八万余日元），

并把由此产生的剩余充作减轻地税和偿还高利公债之用的议案。修改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减少官吏的名额和薪俸以及旅费的金额，目的在于对官僚制进行攻击。对此，政府表明不能同意，而且主张这样进行决议是和宪法第六十七条相抵触的③。政府表示了解散议会的强硬态度，但是民党的方针不变。不过，政府也希望首次议会要圆满结束，立宪自由党的领袖也向山县表示，在亚洲首次议会里要显示日本人运用宪政的能力的想法，两者都是把对外的考虑，优先于立宪制的宗旨。这就开辟了妥协的道路，由于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和邮政大臣后藤象二郎的幕后活动，以及山县指挥陆军次官桂太郎的奔走，终于靠立宪自由党内土佐派的大江卓(预算委员长)和竹内纲、林有造等四十多人退党的支持，才以从预算案中削减六百五十一万日元和约定实行行政整理为条件，通过了预算案。中江兆民在痛骂"哀求"政府同意，唯其命是从的"软派"统治下的议会为"冷血动物的展览会"，而辞掉了议员。

第一届议会的这个经验，分别冲击了藩阀势力和政党。宪法颁布时，黑田首相就内阁的立场宣称要持"超然于政党之外，居至公至正之道"的超然主义，而藩阀势力和官僚们从内阁只对天皇负责的明治宪法原则出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方针，而一直予以支持。可是，很快就明白了，仅靠此超然主义是不能应付议会的。山县在议会闭幕之后，丧失了担任政局的自信，对伊藤的不合作也感到不满，1891 年 4 月实行了内阁总辞职。他推举以立宪政治家自负的伊藤为后任首相，而伊藤尽管有天皇的再三敦促仍然固辞不就，结局组阁命令落到萨摩派的松方正义身上。在松方内阁内部，陆军大臣高岛鞆之助、海军大臣桦山资纪的萨摩派和接近山县的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对议会持强硬态度，与主张对政党妥协的后藤邮政大臣、陆奥农商务大臣相对抗。

对于企图以第一届议会当作打破藩阀序幕的民党方面的第一

个打击是，冠冕堂皇的主张，即废除保安条例、议论政事集会和结社法案（1890年7月颁布的集会结社法的修改案）和减轻地税案，虽然都在众议院通过了，却遭到贵族院的否决，或以审议未完而告终。第一届议会的闭幕会上，伊藤在演说中称赞贵族院议员为"宪法的柱石"，贵族院的确是藩阀官僚势力的"柱石"。第二个更大的打击是，特别在立宪自由党内部，以要求对政府持强硬论相逼的院外壮士团的压力，破坏了党内的控制力，招致了党的分裂。于是，在1891年3月的大会上，首先推举板垣为总理，改党名为自由党，同时，把党的执行部干事从过去由常务议员会（由各府县出一、二名代表组成的）选举，改为由总理任命，常务议员会改为参务会，政策决定机关改为谘询机关。随后在10月大会上，把党代表大会改为以议员为中心，废除了参务会，扩充了政务调查部，对各部配置议员，大会成了党的决策机关。总之，由于1884年的自由党的解散，淘汰了激烈派党员和困民党，在1887年的大同团结运动时，把旧党员型的"壮士"同地方名流结合起来，而在这次改革中，把"壮士"排除于党中央之外，改以议员和地方名流为骨干，以消灭"选民干涉议员的行动"。④于是，片冈健吉和林有造等退党者，12月又复党了。

对选举大加干涉

变成议员占优势和由总理控制的党组织，并不意味削弱了对藩阀的攻击。因为这是为了加强党干部的控制，使国民的政治要求的反映间接化而修改了党规，所以不能轻易地摘下反藩阀的招牌，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意图。党的团结和议员特权地位的保持，使议会内斗争的策略更加活跃，得以把选民的注意力吸引于此。1891年11月召开第二届议会时，民党联合阵线在预算委员会上削减了将近岁出总额一成的七百九十四万日元，其中包括军舰建造费和钢铁

厂建设费。军舰建造费是作为第二期海军扩充计划，继承第一届议会批准的建造三只军舰方案之后，提出再建两只的建造方案；钢铁厂建设费是为了在建造武器和舰船时，防止必要资材仰赖进口造成的军备上的危险和经济上的损失而提出的。政府既企图收买民党议员，又以解散议会相威胁。桦山海军大臣攻击削减海军预算，作所谓“蛮勇演说”说：“说什么萨长政府呀，什么政府呀，象今天这样保卫国家安宁，不影响四千万生灵，保持了安全，这是谁的功劳！”这就惹起民党极大愤怒，因而毫无妥协余地，12 月断然实行解散。

本来政党和政府基本上已经不是对立性质的了。自由党的实力人物星亨主张“专靠破坏主义”是不行的。应当实行“维护国权，增进国富”的政策。⑤此外，杉田定一在第二届议会上，代表自由党反复强调“我们作为日本国民……是主张大力扩充海军论者”，并解释说，期望海军改革内部积弊，反对新建事业费。⑥而对于“休养民力”的具体内容—减轻地税的要求，地主议员的意见并没有取得一致。在第一届议会中，主张首先减轻地税的一派，和主张在这之前应纠正地价的“不公平”的一派，超越了党派关系而分裂对抗，各自分别进行运动。前者以东北地方的议员为主，后者是近畿、东海地方议员居多，对于减轻地税的热情不高⑦。尽管如此，政党和政府之间仍然没有达成妥协。这是因为拘束党干部的议员和限制议员的选民还有力量，而干部中也存在着对政府再追击一下就可达到目的的天真看法的缘故。

藩阀势力和政府方面虽然知道固守超然主义很困难，但却不能对政党示弱。这是出于唯恐出现政党内阁的恐惧心理，和忧虑在东亚战争的危机中民心的动向。不过，即便解散议会，政府支持派也没有增加的希望。关于这一点，传下了天皇的“轸忧”。⑧伊藤在 1892 年 1 月上奏说，他想要组织一个标榜天皇主权之大义的政

府党，以压倒民党，但没有得到天皇和其他元勋的赞成，便中止了。剩下的途径是靠对选举进行干涉来压迫民党候选人了。松方内阁在2月的第二次大选时发布了预警令，取缔壮士的活动，指使府县知事、地方官吏和警察对选举进行了露骨的干涉。高岛陆军大臣和桦山海军大臣高喊即便反复解散多次，动用兵力也要维护政权。民党和官宪在各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流血的惨事。

大选的结果，和政府的预测相反，自由党、立宪改进党再加上准民党的独立俱乐部，占了过半数的一百六十三名。为此，伊藤和阁内的后藤、陆奥追究品川内相的责任，迫使其辞职。接着在5月的第三届议会上，贵族院的"关于干涉选举的建议案"通过了，在众议院"关于干涉选举的上奏案"，虽然仅以三票之差被否决了，但"关于干涉选举的建议案"既然通过，便要求内阁自行决定。但是，松方首相作出不因议会的决议而进退的发言，议会停会七天。对此民党摆出要求内阁总辞职的姿态。但在背后却试行避免冲突和解散的工作。自由党的干部河野广中和立宪改进党的领袖岛田三郎同藩阀政治家中"立宪派"的伊藤进行接触，要求伊藤组织内阁。伊东巳代治说"有此软弱政府，就有此软弱国会，双方都没有掀起极端大冲突的决心"。⑨在复会后的议会上，政府提出二百八十一万日元的补充预算(因前议会解散，为了执行上年度的预算)，众议院作出了包括整个钢铁厂建设费和军舰建造费在内的九十五万日元的削减案。贵族院收到转来的削减案后，又恢复了众议院削减的军舰建造费和震灾预防调查会设备费，送交众议院。于是围绕众议院拥有的预算先议权问题展开了贵众两院的宪法争论，贵族院上奏天皇，发下了两院对等的敕裁，在两院协议会上达成妥协，结果削减造舰费，恢复了调查会设备费。

松方内阁因为副岛种臣内务大臣和得到桦山海军大臣、品川弥二郎两人支持的白根专一次官的对立而动摇，第三届议会后，松

方表示要辞职。可是，由于伊藤、山县、黑田、松方等元老会议对于后任内阁的意见不一致，松方仍然留任了，但在改组内阁时，新任内务大臣河野敏谦，对干涉选举负有责任的白根次官和福冈县知事安场保和等几名知事进行调转和免职时，受到这些知事诉苦的高岛陆军大臣和桦山海军大臣，反对河野的处置，提出了辞呈，在要求军部推荐后任人选时，代表军部的陆军大将大山岩（萨摩）、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参谋次长、长州）、海军中将仁礼景范（萨摩）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劝松方辞职。松方内阁因而于1892年7月总辞职了。⑩军部仰仗天皇的统帅大权干涉政治，便由此开了先例。这件事加上前此天皇对谋求压制民党的政府给以支持和鞭策，以及扮演调停众议院与贵族院对立的角色这一事实，表明了天皇制下立宪制的特点，而在下一届的伊藤内阁时，天皇又增加了扮演调停政府与议会对立的另一个角色。

寄生地主制的形成

创办民友社，发行《国民之友》杂志，著作《将来之日本》、《新日本的青年》，以近代的思想吸引了青年心理的德富苏峰，在颁布宪法的前夕，认为我国社会成为产业中心的生产社会，表现出和平主义得势的征兆，以此给平民主义的欧化主义前途，指出了光明。他认为士族以“抽象的政论”推动天下，充当政治社会主人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在出现农工商的“中等民族”的平民成为主人公的“实际政论”的时代。于是他向“经营企业之民”的“乡绅”即农村的名门地主、豪农阶层寻求平民主义的旗手。与此相反，批判欧化主义，和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一起高唱国粹主义和国民主义的陆羯南，也认为自由民权运动已经落后于时代，而把发展立宪制的希望寄托于“国家栋梁、社会精华的实业家”参与政治，和兴起非“理论演绎”的、以实际利害为基础的政论上。可是，对“乡绅”的这种期

待，很快就破产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地主、豪农转化为产业资本家的可能性被扼杀了。苏峰在1892年慨叹“中等阶级的堕落”，说明有的人破了产，否则就变成一攫千金的投机商，成为一种小御用商人，或者经营以佃农为对象的高利贷，或者投身于政治生意，中等阶级的特质刚健、勤俭、纯粹、简素之美德扫地。而在两年之后却以日本的人口增加和国土狭小为由，讲起开国进取即扩张殖民的必要，说“吾人指点将来，将成为日本的扩张时代，确有理由”。⑪ 说对“乡绅”的期待确是靠不住的。

早在开设议会当时，地主的土地急遽扩大，地主的寄生化倾向占了统治地位。1883到1887年的四年间，全国的佃耕地比率，从百分之三十六骤增到百分之四十。在1883和1884年时，在地主所有土地控制下的农户，自耕兼佃耕农和佃耕农一共占全农户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和土地所有者农民的急遽没落相反，成为主要动向的，不是具有富农和产业资本家性质的小地主的上升，而是大片土地向高利贷商人性质很强的大地主集中。这些大地主们的主要关心，并不在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而在于如何得到多额地租，并把这些地租有利地运用于放款业，或者用之于这时开始的兴办企业热所引起的有价证券投资。通过1889和1890年的皇室财产调整而成了天皇所有的庞大的土地和山林，以及由此而来的华族、政商、高级官僚所有土地的骤增，说明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高涨，取得和贩卖佃租米逐渐成为有利可图，同时也发挥了证实国家政权保证稳固寄生地主所有制的效果，促进了地主制的发展。然而作为寄生地主经营得到稳定的，当时还只是拥有五十町步以上的大地主。民党议员不能无视占选民多数的小地主（自耕虽然在缩小，但尚未完全放弃）关心地税的动向，形成实现扩军的障碍。正象历代内阁大伤脑筋那样，包括小地主阶层在内的整个寄生地主体制，成为天皇制国家的统治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固定下

来，还必须等到悬而未决的增收地税得以实现的甲午战争之后⑫。

使中小地主的乡绅可以成为“经营企业之民”的缫丝业，这时作为出口工业，迅速发展起来。1867年以后的入超贸易，在1882年以后转为出超，这主要是靠生丝的大量出口。与此同时，机器缫丝得到发展，甲午战争开始的1894年，在产量上超过了手工缫丝(主要销于国内)。小规模的个人企业是中小地主或生丝商人经营的，由于丝价变动剧烈，经营极不稳定，很难发展成大规模经营。其中的少数例外，例如长野县诹访的片仓组、尾泽组、冈谷制丝等，由于得到横滨生丝批发货栈或地方银行贷款的特别照顾，才得以摆脱了通货紧缩时的银根奇紧，在其通融资金的背后，有日本银行即国家政权的支持。

在民间机制工业的中心棉纺纱业中，二千绽纺机(水力，使用国产棉)的纺纱厂在松方财政之下没落了，代之而起的是从1883年开工的大阪纺纱厂，随后逐次创办的东京纺纱、钟渊纺纱、平野纺纱、摄津纺纱、尼崎纺纱等，都是多达一万到三万锭(使用蒸气动力和进口棉)的大资本企业，只有这样大规模的公司，才能在离开政府的直接保护之下，以自力维持经营的收支。然而这已经不是士族、地主的企业，而是官僚出身的财界人(例如涩泽荣一)或得到政府特权保护的政治商人，筹到华族或东京、大阪的大商人的资金，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而创办的。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商人，由于经理官款、承买和贩卖贡米、承购官产、受政府委托经办政府直接出口业务(如出口米谷)、以及赖政府保护垄断内外航路而积累起巨额资本，主导了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

1886—1889年，以私营铁路事业和矿工业为中心，掀起了企业热和股票投机热，城市商人和农村地主的关心，集中于资本主义企业。然而，从1889年下半年起到1890年上半年，很快就发生了经济危机，暴露了正在建立过程中的日本资本主义的脆弱体质，

也使人们认识到，在189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已经达到直接蒙受世界资本主义影响的程度。[13]此时股票价格暴跌，许多滥设的公司倒闭了，生丝出口减少，蚕价急遽跌落，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经济上受到打击。于是，在1891年，"作为维持中产以下人民（小地主和自耕农——引用者）的资产的办法"，政府在第二届议会提出了信用组合法案（因为议会解散而未成立）。[14]由于农民分化的进展而越来越多的自耕兼佃耕和佃耕的贫农阶层的生活，在还没有开辟向工商业就业机会的这一时期，仍然和在松方通货紧缩时期一样，没有变化。由于1890年的米价高涨，穷民袭击富豪和大米商的"米骚动"在各地爆发起来，在佐渡为了镇压骚动而出动了军队。连口粮都卖了而不得不买米吃的农村贫农和城市贫民增多了，造成了社会不安。由政府和执政党的大成会、国民协会口中说出有救济"细民"生活的必要，也是第二届议会当时的特点。[15]其意图在于以强调地主和"细民"的利害对立，来牵制地主的政治活动，因而地主也无法只强调自己的利益了。民党对政府的扩军财政似要妥协，而又轻易下不了决心，就是因为背后有这样的情况。

政界和实业界的指导者开始努力把国民的注意引向国外。1890年的经济危机也是一个转折点。萧条使棉织品的需求减少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机制工业纺纱业，立刻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1890年6月，纺纱联合会首次缩减开工，11月的临时大会决定对中国和朝鲜出口，不计损益，并废除了棉纱的出口税和棉花的进口税。这件事说明资本家下定决心要开辟国外市场，既使牺牲棉农也在所不惜。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幕末以来主要的农业商品生产的棉花种植，因受进口棉的压迫而迅速走向衰退的时期，1894年废除棉纱出口税，紧接着1896年又废除了棉花进口税，连续打击了种植棉花。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自由贸易论者出名的田口卯吉，也在

1890年以东京府士族授产金为资金创办了南岛商会，其意图在于"我四千万同胞已苦于国内无遗利，驱我过剩之人民，注于此丰穰之土，以为南洋经略之地，不亦可乎"。[16] 殖民热潮的高涨，是此时期的特殊趋势。[17] 1892年6月脱离自由党的大井宪太郎，和樽井藤吉、新井章吾等人结成了东洋自由党，这个党主张"保护劳动社会，救济贫民人等"。期望"形成真正舆论"，为此成立了普选期成同盟会、日本劳动协会和租佃条例调查会，但同时又强调向海外伸展，说："把对内不满的人心引向于外，乃国际竞争的大目标"。[18] 他指出国民看透了民党的休养民力论是对地主、资本家有利而对之心怀不满，他利用这种人民的不满，抢在统治阶级对外扩张政策之前，策划恢复自己的政治生命。

① 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156页附表。安良城盛昭《地主制的开展》(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所收)。

② 1890年3月，山县起草，经阁僚传阅的意见书《外交政略论》。这里说：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朝鲜多事之时，亦东洋产生一大变动之机，"夫西欧无事之日，即其诸国进而远略东洋之时，东洋之余利财源正如肉在群虎之间。事如不在阿富汗(阿富汗尼斯坦——引用者)，必将在朝鲜海"。这是把朝鲜作为帝国主义对立的焦点来看的(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197页)。

③ 关于宪法第六十七条"基于宪法大权的既定岁出和由于法律的结果或法律上属于政府义务的岁出，无政府之同意，帝国议会不得废除或削减"的条文，政府的解释是，在预算确定之前，各院应分别征求政府之同意，而民党方面的见解是，贵众两院通过后，在两院合议之下进行即可。如按民党方面的解释，政府就更难以表示不同意了，就成为议会权限大于官制大权了。但是追究六十七条本身是否有当的意见，却只有中江兆民等少数人。兆民关于议决之后政府不同意时，说："议员唯有深入穷诘其所以然之理，抉髓搜脾，必彻明其事情之根底，而后可诉之于天下舆论，以为后图"(松永昌三著《中江兆民》266页)。

④ 1891年10月之修改党规理由书(《河野磐州传》下卷160页。"舆论也有时搞错方向。违反道义，不合正义者，不得妄自行之。国家有主权，按此道理行之，不合正义者，有弃却之权(中略)。人民按法律规定选举议员，应信任之。或立于议员与选民之间，从旁妨碍，或以选民而干涉议员之举动，皆违背代议政体之本旨"。所谓立于议员与选民之间，是指院外团壮士的作用。上述引证国家主权的理论，大概是说议员得以国家的立场为盾牌，拒绝舆论的意思。关于第一届议会的院外团壮士的活动情况

和修改党规，参照升味前引书第2卷，鸟海靖《初期议会时期自由党的结构和机能》（《历史学研究》255号）。小山博也著《明治政党组织论》。

⑤ 当时以院外团进行活动的利光鹤松回忆录《利光鹤松翁手记》（升味前引书第2卷201页）。

⑥ 大津淳一郎著《大日本宪政史》第3卷644页。第四届议会时预算委员长河野广中也表明了与此完全相同的意思（同上书788页）。

⑦ 安良城盛昭《第一届议会中地主议员的动向》《社会科学研究》第16卷1号。

⑧ 1891年12月，当解散时，伊藤想发出“徒逞激变纷争，而误国家百年之大计，实非朕之所望”的诏敕（《伊藤博文传》中卷801页）。然而井上毅与伊东巳代治商议结果，认为有“以王室为政略家所利用”之嫌而中止。接着天皇向伊藤征求意见时，对侍从长德大寺实则陈述了解散属不得已的意见。书中说，若政府仍如去年仅以成立预算为满足，则政党骑虎之势，热度更加激烈，地方民心受此势力之迷惑而离去，立宪政治将徒委之于政党竞争之胜败。于是，“幼稚朴实之人民，如素绢易染各种色彩，民心变移之速，有不胜惊异者（中略）。万一东方之大局问题，发生于迅雷不及掩耳之时机，难保我国家之命运不陷于危殆。岂可不为之寒心哉”（同上书中卷810页）。议会解散的次日，德大寺奉天皇之命，致书于伊藤，说“至于议员之再选，如同一议员得以再选，岂不将一再产生解散的不祥结果，皇上深为忧虑。对松方大臣已再三指示，令其知会地方官加以注意，希将来成为良民之议员”（《明治天皇纪》第七，969页）。对松方的命令，促成了对选举的干涉。

⑨ 5月21日致伊藤博文书。“自由党之辈也谋求前途无事，先前之决议等（指关于干涉选举的建议——引用者）决无厉行之意”（升味前引书第2卷205页）。

⑩ 林茂《第三届议会和第一届松方内阁之瓦解》（《国家学会杂志》第62卷，第3、4合并号，第5、10、11号，第63卷1、2、3合并号），当时陆军省和海军省官制还没有实行大臣武官专任制。如1888年6月的陆军省职员定额表，规定为“大臣将官”“次官将官”，但1891年7月的改订陆军省官制的职员表中，删除了“大臣将官”“次官将官”的字样。1890年3月的改订海军省官制的职员表中也没有附记大臣和次官的充任资格，可以说法律上陆海军都没有实行大臣武官专任制，但是，正象1891年9月伊藤枢密院议长奉答天皇时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军人以外的军部大臣是不可想象的（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卷396页）。

⑪ 德富苏峰《隐密的政治上的变迁，第5，中等民族势将生长》（1888年2月，《苏峰文选》60页）。《中等阶级的堕落》（1892年11月，同上书174页）。《日本国民的扩张性》（1894年6月，同上书293页）。陆羯南《实业者的政治思想及改题的主意》（1888年4月）。《欲行大同团结须知大同团结之所以》（1888年10月。《陆羯南全集》第1卷321、550页）。此外，参照鹿野政直《“乡村绅士”们的论理》（《历史学研究》249号），色川大吉《明治二十年代的文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4》所收），同著《明治的文化》。

⑫ 关于寄生地主制确立的时期，安良城盛昭认为1890年开设议会，为适应地主制扩大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确立之年，乃以此为标志（《地主制之展开》岩波讲座《日本

历史·近代3》所收)。对此,中村政则提出产业资本确立期的1900年的说法(《日本地主制史研究序说》载于《经济学研究》12号)。

⑬ 关于1890年的危机的性质,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把纺绩联合会的活动视为通过卡特尔政策的帝国主义扩张的开始(小林良正著《日本产业的构成》,名合统一著《日本纺绩业的史的分析》。对此,反对意见很强烈(大岛清著《日本恐慌史论》上,长冈新吉著《明治恐慌史序说》),此外,关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可参照《日本经济史大系·近代》上、下集所载之有关论文。

⑭ 《品川子爵传》406页。

⑮ 坂野润治著《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66页。

⑯ 田口卯吉《南洋经略论》(1890年3月,《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4卷371页)。可与1883年3月的《殖民制》中所说的强行海外殖民不一定有利(同上书第4卷95页)相对比。

⑰ 三宅雪岭著《同时代史》第2卷457页。

⑱ 平野义太郎著《马城·大井宪太郎传》296页。

第三节　明治政府末路之一战

扩充军备的诏敕

1892(明治25)年7月,松方内阁总辞职后,元老会议开会,推举伊藤博文为后任总理,伊藤在元勋总出马的条件下接受了。他在扩张军备和修改条约的重大课题面前,深刻地认识到藩阀势力的危机是"明治政府垂死的一战",由于"东方大局"的变动会立使"我国命运陷于危殆",而对此种紧迫形势认识落后所产生的焦虑,更加剧了上述的危机感。①1891年海军大臣向内阁会议提出的九年(1892—1900年度)海军扩充计划(铁甲战舰四只,巡洋舰六只,通讯舰一只),连其中的巡洋舰和通讯舰各一只的预算,在第二届和第三届议会都没得到通过。8月成立的第二次伊藤内阁,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大山岩等一齐入阁,世人称之为"元勋内阁"。

在11月召开的第四届议会中,出现了政党转变方向的征兆。星亨掌握实权的自由党,在议会召开前夕的党大会上,虽然以节

减政费、休养民力为主要宗旨，但却确定了在所谓国是问题上，即国民生活、教育、外交、国防的四点上则采取“积极的手段”的方针。这意味着承认扩军，并对资本家和地主利益攸关的铺设铁路、扩张航线、扶植产业以及土木、治水事业由国库给予补助的要求，则抱积极的态度。自由党和伊藤内阁的妥协有了可能，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尽管政府提出了进行修改地价和增加治水事业费的提案，但另一方面却要求增加酒税、烟税和所得税，不同意民党一贯主张的节俭政费。民党的选举地盘一地主、资本家的意志也没有得到统一。虽然主张积极政策，又不能撤掉“休养民力”的招牌来赞成增税，更不能仅仅满足于地价的修改而放弃减轻地税的要求。加之，还有认为难为“元勋内阁”是打垮藩阀势力的良机的想法。于是民党在预算委员会中通过了削减官吏薪俸、官厅经费和造舰费等约合预算岁出总额百分之十一的修改案。众议院对于拒绝此修改案的政府进行抨击，为了要求政府进行反省，还主动休会五天，休会完后，提出了弹劾内阁的上奏案。政府陷于“在众议院没有一个支持者，而无所措手足”的困境。② 万不得已，命令休会十五天，民党在复会时通过了弹劾案。

1893 年 2 月，伊藤总理以下各大臣联名请求天皇在敕令众议院与政府妥协、或解散众议院的二者之中进行裁决。早在上一年，伊藤和井上毅之间就商讨了为打开议会和内阁的对立局面，实现扩军而利用诏敕的方案。这正是为了军国主义至上的课题，而使出了传家宝刀。③ 天皇召集了大臣、枢密顾问官、贵众两院议长，发出诏敕，希望政府与议会和衷共济，并于今后六年间每年由内廷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元，而文武官员在这期间献出十分之一的薪俸，以充部分造舰费用。于是政局为之一变，开辟了妥协途径。政府答应实行行政整理和改革海军内部，而众议院则重新审议预算案，减少了削减额，通过了包括铁甲战舰二只、巡洋舰和通讯舰各一只

的造舰费在内的预算案。

正是为了加强军国主义，天皇才直接干预了政治。而靠诏敕的力量，使政府和政党的接近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以海军部内积弊过深为理由，以造舰费被削减了的第四届议会的经验为动机，在这一年的5月，海军军令部独立了，其目的在于更明确地使军令权置于议会关系之外。同时为使战时的陆海军军令机关的关系成文化，又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明确记载大本营由陆海军军官组成，规定文官不能参与作战指导。这是明确预测到同中国作战而采取的措施。

防谷令事件

清政府在1884年甲申事变时，以武力镇压了开化派和日本公使馆策划的武装政变之后，以朝鲜为属国的政策更为露骨。日本和中国在对朝鲜贸易上，出口方面，1885年日本为百分之八十一，而中国为百分之十九，但是到了1892年被追赶到五十五对四十五。而进口方面，尤其黄金方面，1887年日本为百分之八十四点九，中国为百分之十五点一，而1892年则转为四十三对五十七。④日本所以这样倒退，多半是因为日本的贸易是非法的和掠夺性的，从而遭到朝鲜人的反感，此外也由于中国政治上的扩张形成的压力。在这种贸易情况的背景下，使日、朝关系更加恶化的是防谷令事件。1889年，朝鲜的咸镜道禁止对日本出口大豆，第二年黄海道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这一年日本和朝鲜农业都歉收。日本政府对这次防谷令要求对日本商人所受的损失，赔偿十四万七千日元，1898年5月，用最后通牒才以十一万日元的赔款使事件平息下来。和上述的黄金进口减退的同时，粮食供给的不稳定，使日本政府极为焦虑。1890年，贸易转为逆差和米骚动爆发的形势，使日本更加迫切地依赖朝鲜的黄金和粮食的进口了。

然而，日本企图加紧统治朝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转向世界帝国主义体制的适应。早在1885年发生的巨文岛事件(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就使朝野有识之士认识到朝鲜问题已经和英俄在世界上的对立联结在一起了。1891年西伯利亚铁路的施工，在国民中更加强了对俄国南下政策的恐怖感。煽动这种危机感也是政府把内争向外转移的惯用手法。其意想不到的陷阱是该年5月刺伤了访日中的俄国皇太子的大津事件。⑤而山县有朋在召开第五届国会前夕的1893年10月，建议扩充海军。其内容指出俄国、法国和英国侵略东亚的动向，说："必须考虑，东洋的危机不出十年就会爆发。到那时成为我国的敌人的，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各国"，休养民力和减轻地税，"只是外无患难，内有余裕时才可以说的"，主张扩充海军乃是当务之急。⑥虽说我国的敌手是英国、法国和俄国，却并未因此而改变侵略朝鲜、对抗中国的方针。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东亚的形势，对中国和对朝鲜政策具有新的世界意义，想以强调这个世界大势来攻击民党的休养民力的方针，说明进一步大规模扩军的必要。

对外强硬论的反政府联合

民党为与政府斗争而提出"休养民力"的口号，以第四届国会而告终。自由党更加强调"积极政策"，加强了接近伊藤内阁的活动。立宪改进党虽然没有说撤掉一直打着的"节减政费"的招牌，但却以自由党既然放弃了打倒藩阀的宿愿，削减预算已经没有实现的希望为理由，在第五届国会时没有派出预算委员，事实上放弃了削减预算的努力。这样，在国内问题上就和政府没有重要的对立焦点了，因此，攻击政府只能求之于强硬外交论了。一向站在政府党的立场，高唱充实军备扩张国权的国民协会，反对自由党接近政府，转而批判政府，这就以扩张国权的强硬外交主张助长了形成

反政府的联合活动。

伊藤内阁同英国之间进行的修改条约交涉成了它的对象。安井磐根和神鞭知常等组织大日本协会，认为以撤消治外法权为交换条件的外国人内地杂居为时尚早，而加以反对。国民协会和一直是民党的立宪改进党和同盟俱乐部都赞成这个主张，结成了占众议院过半数的对外强硬派的民党战线。对外强硬运动的性质是很复杂的。也有反对修改欧化主义条约的国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调，还有对外国资本进入日本会压迫日本的幼小的工业而忧心忡忡的拥护民族资本的立场，此外还有气愤政府对欧美的软弱外交态度而主张自主外交的人。

第五届议会一开始，安部井就提出对星亨众议院议长的不信任案，得到通过。不信任的理由是他和设立股票交易所的受贿事件有牵连。而刚愎的星亨又回到议长席，于是不信任的上奏文通过了，并提交惩罚委员会，给予开除的处分。对外强硬派不提预算问题，继续以股票交易所问题追究政府，并以收贿的理由通过了促使处分农商务大臣后藤象二郎和次官斋藤修一郎的决议案，随后提出了励行现行条约，严厉取缔外国人蛮横的励行条约建议案，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谴责政府对千岛舰沉没事件用天皇的名义，以英国的公司为对方，向英国的领事裁判提出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使"至尊之天皇与外国一商人为伍"，使"帝国举国屈从于英国主权之下"的"有失体面"的上奏案。当时英国对于日本所提出的相互对等原则的修改条约案表示谅解，但由于耽心日本国内的排外舆论的高涨，推迟了交涉的进展。政府考虑到对外的影响表示强硬态度，使议会休会十天，再次休会十四天，并命令大日本协会解散，随后在12月30日解散了众议院。政府抨击在野党的对外强硬论是攘夷主义，是阻碍维新以来的"开国进取"的"国是"的。对此，1894年3月，东京府内的十家报社 杂志社的记者开会批判政府的解散是反立宪的，

高唱“责任内阁、自主外交”的口号⑦。对欧美强硬外交的主张激起国民的民族主义，政府最害怕这种力量组成反对藩阀和要求确立立宪体制的势力。因为正象近卫笃麿等贵族院各派议员对解散措施进行批判时所出现的那样，政府的孤立更加深刻了。但是，另一方面，立宪制的要求既然包含在国粹主义和国权主义的主张之内，这就表现出当年的反政府运动的局限性。

1894年3月，举行第三次大选，自由党虽然增加了议席，但对外强硬派仍然占有多数。5月召开的第六届议会，自由党也参加了对外强硬派，通过了抨击政府解散议会的决议案，并通过了追究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失态的责任的上奏案，进行追击。于是政府在6月2日又解散了议会。国内政局这样混乱，使统治者痛感，为了“挽救此骚动之人心，”有必要在外交上取得“足以惊人耳目的事业”的成功。虽然反复实行了不断解散议会的强硬政策，但却不见得能够压住反政府的舆论。正在这时偶然出现了“无缘无故引起战争”的机会。⑧

开战外交

1894年6月2日，当阁议决定解散第六届议会的那天，收到了杉村濬代理公使关于朝鲜政府为镇压甲午农民战争（在日本称之为东学党之乱），请求中国派遣救兵的电报。于是陆奥外务大臣主张“日清两国必须在朝鲜维持势力均衡”，在取得阁僚的同意并与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商议之后，决定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一个混成旅团。“此时已非议论如何可以使事态和平解决，而是商议如何发动战争，如何可以制胜了。”⑨于是5日那天，预期同中国开战设置了大本营，并对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下了动员令。

甲午农民战争是因李朝的慢性财政破产而残酷地掠夺人民所激起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反对基督教的东学（由佛教、儒教、道教

合成的)的教义，为农民灌输团结和思想，提出“逐灭倭夷”的反日反侵略和“扫灭权贵”的反封建的要求。[10] 1894年2月，在全罗道古阜发生的反对官吏虐政的农民暴动，在东学的传教师全琫准的指导下立即扩大起来，打败了政府军，5月31日占领了全罗道中心的全州。闵氏政权于6月1日取得中国代表袁世凯出兵的同意，3日正式向中国请求出兵。清军于同月9日在牙山登陆。

此时，正在回国的大鸟圭介公使接到含有和平和开战的“表里两个主义”的训令，[11] 率领四百名海军陆战队于6月10日进入汉城，陆军的先遣部队也于12日到达汉城。可是，农民军已经同政府军达成以实行改革弊政为条件的协议，撤出了全州，清军也在牙山按兵不动。大鸟对于出乎预料的平稳形势，感到困惑，生怕列国怀疑，便致电陆奥外务大臣请求停止派遣大部队。然而政府由于“回顾我国国内情况，已成骑虎之势，不能中途变更既定的兵员数目”，而且采取了“在外交上虽然居被动地位，但在军事上却要先发制人”的一贯方针，[12] 便按原定计划令混成旅团的四千人全部集中于汉城了。于是为了使驻扎这样的大军合理化，施展“外交策略”，阁议于15日决定日清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第二天向中国提出此项建议。正如政府所预料，21日得到中国拒绝的回答，日本便按照预先的决定，以在朝鲜的兵力为后盾独力进行改革。纵使同中国发生冲突也要把朝鲜置于统治之下的方针是已经确定了的[13]。

这时政府所顾虑的，唯有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动向。朝鲜和中国也各把希望寄托于此。6月25日，驻汉城的英、美、法、俄各国公使，受朝鲜政府的委托，向中日两国公使提出两国同时撤兵的劝告。而当天驻日俄国公使，根据本国政府应李鸿章的提议，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政府所依靠的是英国的动向。英国为了保全中国市场也好，为了牵制俄国向朝鲜扩张也好，都希望维持中国对朝鲜的统治。然而，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后俄国大举向

东方扩张，又想要利用日本，便答应同日本进行修改条约的交涉。日英间修约的正式会议是从4月开始的，陆奥鉴于朝鲜风云紧急，急于达成协议。7月16日，才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据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总算收回了法权，至于税权，还留下了对重要输入品的片面的协定关税问题没有解决。不管怎样，这次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相信，只要日本的对朝鲜政策是防止俄国扩张的，就可以得到英国的支持。⑭早在7月12日，日本抓住根据英国出面调停而进行的日清会谈失败的机会，迈出了开战的一步。这一天，陆奥向大鸟发出了"选择不至引起社会非难的某种借口，开始实际行动"的训令。20日，大鸟向朝鲜提出在汉城釜山间架设军用电线、要求中国撤军和废除中国朝鲜间的条约，并限于22日答复。23日拂晓，大鸟率日本军拥大院君闯进王宫，赶走了闵氏政权，25日，海军在丰岛海面攻击中国军舰，29日，陆军在成欢击败了清军。⑮在这之后，8月1日，对中国宣战。宣战诏书所举的开战理由是从中国非分的希望中保持朝鲜的独立。⑯中国于7月31日通告断绝国交，8月1日发出宣战敕谕。

① 1892年7月3日，山县有朋致井上馨书中，关于伊藤在讨论松方辞职问题的元老会议上的发言记载如下："如缺所论之一，此政策（组织元勋总出动的内阁——引用者）唯有取消。因为目前国步唯艰，这是明治政府为贯彻我目的的垂死一战，如不互相合作，就不能有所作为，这是极其明了的。"对此山县说："当将来国步愈益困难，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同僚已倒，明治政府之末路已到无可如何时，自当有所决心亦未可知"（《伊藤博文传》中卷856页）。由此可以看出元老对藩阀势力的危机感的痛切。参照第二节⑧。

② 1893年1月18日井上馨致伊藤书（同上书中卷878页）。

③ 井上毅提出发布敕谕，拨皇室经费的十分之一补充国库，充国防费之用的方案，期待得到"依此敕旨，使国民翕然知国家之急务，打破地税论等因循之说，注意东方问题为何事，国家党之基础始可孕育"的效果（1892年3月17日井上毅致伊藤书，《井上毅传·史料篇》第4，第202页）。应注意其所期待的是使人心认识"东方问题"。又在同年6月主张急应扩充海军，建议颁发同样趣旨的诏敕。（《国家宏运意见》同上书第2、第522页）。

④ 彭泽周著《明治初期日韩清关系研究》第305页。中塚明著《日清战争研究》第91页。两书的贸易指数有若干出入。此外，关于甲午战争日本方面原因的朝鲜市场评价，信夫清三郎认为日本对朝鲜出口的主要物品正在由本国制品代替外国货，"这表示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质的转化"。他说："开辟朝鲜市场是作为日本产业资本的新课题而提出的，在一方面产业资本的渗入和另方面政府的后退这一矛盾中，甲午战争成为必然的了"（《近代日本外交史》第63页）。然而，南德子在《日清战争和朝鲜贸易》（《历史学研究》第149号）中批判了这种见解，后来许多研究对于产业资本要求市场的想法是否定的。作为日本机制纺织品的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是在甲午战争以后。

⑤ 担任警卫的警察津田三藏在大津拔剑砍伤了来访的沙俄皇太子尼古拉。当时正是连小学儿童都被迫唱"西有英吉利，北有俄罗斯，切莫粗心哟！我国的人民。表面结条约，内心不可测，虽有国际法，有事靠腕力，强食弱者肉，事前须觉悟"这种流行歌的时代（尾佐竹猛著《湖南事件》、岩波新书第4页）。犯人津田在事后受审时，供述犯罪动机说"因为俄国皇太子有企图吞并我日本国的野心"（同上书第108页）。当时的松方内阁耽心会引起同俄国的战争，指示要按对皇室的犯罪，处以极刑，对最高法院法官施加政治压力。但最高法院长儿岛惟谦表示反对，结果最高法院法庭按一般的谋杀未遂罪处理，判处无期徒刑，这段经过表明司法权独立的脆弱。关于儿岛和政府之间宪法观上的分歧以及它的局限性，可参照《儿岛惟谦》座谈会（吉野源三郎、林茂、远山茂树编《为日本的自由而斗争》所收）。

⑥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第220页。

⑦ 报纸《日本》的主笔陆羯南连日登载大力支持对外强硬派的社论。其主张包括下列论点。（1）对外强硬派主张的对欧美列强要求平等的修改条约问题，被转移目标，这和侵略弱小国家的东洋雄飞政策有关，而东洋雄飞论隐蔽和压制内政的重要问题。（2）对外强硬的主张是攻击政府"对外软即对内硬"的施政精神，是反对藩阀政府的武断专制倾向的（《对外策阶梯》、《无为的政府》、《对外硬精神》、《对外软即对内硬》载于《陆羯南全集》第3、4卷）。这可以看作是代表对外强硬论中所包括的民党性质的主张。参照远山茂树《陆羯南的外政论》（载于《横滨市立大学论丛》24卷2、3号）。

⑧ 1894年3月，天皇的近臣派佐佐木高行主张实行孤注一掷的高压政策说："修改条约如能顺利进行，固属上上，然如今日之因循，令人甚为悬念。索性或以井伊直弼的强硬主义打倒之，或因此而失败。如无一番风波，恐不能推进任何事"。对此，据说伊藤博文表示同意（津田茂磨著《明治圣上和臣高行》821页）。再者，对内强硬政策也受到英国外交官的指使。上一年9月归国休假的英国驻日公使弗莱彻在条约交涉时，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这是我个人意见，"日本政府是个太软弱的政府，软弱的政府就难以凭充分的信用缔结条约。"对此，青木辩解说：我国政府有镇压内乱的实力，但为熟习立宪政治和养成良好习惯，暗自对议会采取和协手段（《青木周藏自传》（东洋文库）第221页）。关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关系，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于1894年3月27日致青木公使信中写道："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如不表明不拘成败如何定要做出某种惊人耳目的事业，则无法挽回此骚扰之人心。而所谓惊人耳目之事业，又不能无故掀起战争，故唯一目的为修改条约一事（中略）。因内政关系而强促外交之成功，虽不无本

末倒置之嫌，然时势如此，实不得已也”（山本茂著《条约修改史》第 541 页）。

⑨ 外务次官林董的回忆录（《怀旧后记》（东洋文库第 75 页）。据同书载，陆奥和川上“为了挽回十五年、十七年（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引用者）的失败，此次务须取得胜利”，因而同意出兵，并且乐观地认为派遣一个混成旅团，既便事态闹大，以后再派一个师团，中国将会“请和”。

⑩ 姜在彦著《近代朝鲜的变革思想》、《甲午农民战争》（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近代 9》所收），朴庆植《开国和甲午农民战争》（《历史学研究》1953 年朝鲜史特集所载）。

⑪ 陆奥宗光著《蹇蹇录》（岩波文库）第 30 页。陆奥的训令是“切记除非极不得已之外，以和平手段了结事局，为第一要义的内容。然而鉴于当时形势已经迫切，因此在训令中加进如时局紧迫，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时，该公使得斟酌情况采取适当的临机措施的一项”（同上书。6 月 4 日训令的原文收于《日本外交文书》第 27 卷 2，第 507 号）。然而据林董的回忆录载，陆奥另以口头嘱咐说，“纵令由于事与愿违，或因公使之果断而开战端，其责任由本大臣承担，是以不可稍有踌躇，诸事可自决行”。“仿佛是个只差没有说应采取开战方针的训示”（前引书第 76 页）。此外，关于《蹇蹇录》（岩波文库）的史料性质，参照中塚明著《日清战争研究》第 119 页。

⑫ 《蹇蹇录》第 33、34 页。

⑬ 同上书（第 43 页）中关于在第二天交给中国的反驳其拒绝回答的照会说“这也可以算是日本政府对清政府的第一次断交书”。

⑭ 1894 年 6 月 12 日，青木驻英公使致陆奥外相电报。关于英国的态度，推测说，“此次日本的措施（对朝鲜措施——引用者），如出之于直接或间接预防俄国的入侵，却似乎认为是可以的。”（《日本外交文书》第 27 卷 2、612号）。同年 7 月 19 日，青木致陆奥书说：“我首先离间英国和清国，务期奏功，并论及由我国独自或与清国共同占领朝鲜的权利，和从我国防上看有维护生存的义务（即鉴于我国的生存的意思）时，该氏（指英国外务大臣——引用者）欣然赞同我所主张的主义”，接着又说把英国舆论引向支持日本，并且鼓励开战说：“好容易千方百计地等待将斗大的鱼一网打尽，而枪声尚未发，深为叹息，深为叹息”（同上书第 27 卷，（1），56 号）。

⑮ 到日清开战为止的外交研究，有信夫清三郎著，藤村道生校订《增补日清战争》、田保桥洁著《日清战役外交史》、中塚前引书、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岩波新书）。关于外交史料，除前引《蹇蹇录》、林董的回忆录之外，还有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濬的回忆录《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日本外交文书》第 27、28 卷。

⑯ 宣战诏书说：“朝鲜是帝国最初加以启发诱导，使之成为列国队伍之一的独立国”，并说：“中国的企图显然在于使朝鲜国治安之责无所归属，使帝国率先将其列于独立国行列的朝鲜地位，与表示此独立地位的条约（按指日韩修交条约——引用者）一起付诸隐晦，以损害帝国之权利利益，以使东洋和平永无保证，乃毫无疑问者也”（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上 154 页）。请注意其炫耀使朝鲜成为独立国，和使其开国的日本的指导。

第四节　甲午战争的结局

战斗与媾和

开战时，日本陆军共七个师团，动员兵力十二万，是用新式的村田式步枪装备起来的。中国的总兵力据说为三十五万，但训练不足，编制、指挥系统和武器都不统一，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海军方面，日本是军舰二十八只，五万七千六百吨；中国在只数和吨数上都稍占优势，但在编制舰队的均衡上则不如日本。加之，清政府在政治上分为光绪帝系的主战派（李鸿藻、翁同龢、刘坤一）和他的母亲西太后系的避战派（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掌握军事实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是避战派的首领，拼命想保存实战兵力的核心北洋陆海军，因而一意策划靠欧美列强尤其俄国的介入来回避战争，拖延了战争准备。因此，日本的军事行动顺利进展，9 月，陆军在平壤战役取胜，海军在黄海海战得胜，决定了战斗的大势。11 月又拿下了旅顺。① 攻击旅顺是为了准备要求割让土地进行媾和谈判的行动。随后于第二年 2 月，又占领北洋舰队的根据地威海卫，迫使北洋舰队投降。

在这期间，朝鲜根据日本的要求和策划，设置了集中金弘集等开化派的军国机务处，通过了内政改革案，1895 年 1 月，国王祭祀宗庙，提出誓愿书，颁发了洪范十四条。② 这是凭接替大鸟的驻朝鲜公使井上馨的高压所推动的。不过，日本政府一方面在表面上要求改革，其实正象陆奥所说的那样，"朝鲜改革内政，首先限于以我国利益为主的程度（中略），我从一开始就对朝鲜改革内政并不特别重视"。③ 内阁会议表面上标榜"不侵害朝鲜独立权"，和"无侵略掠夺形迹"的方针，但实际上尽管是间接的，已经决定了"使之屈服于帝国势力之下"和"如同保护国的待遇"这样的对朝鲜政策

本方向。④早在开战之后的8月，就使之签订暂定合同条款，京釜(汉城、釜山间)、京仁(汉城、仁川间)的铁路由日本修建，改全罗道的一个港口和为巩固朝鲜的“独立自主”召开两国委员议，紧接着使其答应对中国实行攻守同盟，“把他牢固地掌握在手中，使之不敢他顾。”⑤对于这些情况，11月再度蜂起的农民要求日本撤退军队，以此为背景，大院君派继续采取了反日亲清政策，因而洪范几乎完全无从实行。

媾和谈判，早在黄海海战后的1894年10月，由驻日英国公使的试探而开始了。英国害怕日本的深入使其对清贸易遭受打击。唯恐军事力量毁灭的李鸿章希望早期媾和，一面暗中希望俄国干涉，同时又通过美国摸索日本意图之后，1895年1月向日本派出了媾和使节。然而日本政府以全权证书不完备为理由，拒绝谈判。接着在3月，李鸿章亲自以全权大臣资格来日，与日本全权伊藤、陆奥在下关进行媾和谈判。交涉陷于僵局，但由于李遭到反对媾和的自由党系壮士枪击而负伤，日本考虑这个反映和列国干涉的动向，在割地范围和赔款金额上作出让步，4月17日签订了中日媾和条约。其内容如下：(1)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即否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2)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3)中国赔款银二亿两(约合三亿日元)。(4)以中国与欧洲各国间的条约为基础缔结日清通商航海条约。(5)新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港。(6)日本人得在中国的开放市和开港处自由经营各种制造业，并出口各种机器。⑥

这次战争，日本出动到外地的总兵力为十七万人。其损失是，包括后来占领台湾的，死者一万七千零四十一人，其中战死和病死者一万一千八百九十四人。战斗规模并不太大。但是，由于这是明治维新后首次的真正对外战争，所以朝野上下心情非常振奋。

第六届议会解散后的大选是在战时下的1894年9月举行的，

10 月在大本营所在地广岛召开了第七届临时议会，12 月在东京召开的第八届议会，都和半年前的激烈斗争完全不同，全体一致通过了庞大的军事预算。政党想通过主张获得过大领土的媾和条件，以“举国一致”的名义支持和煽动军国主义，来表示自己的存在价值。知识界的多数人也高唱甲午战争是文明针对野蛮的义战，积极给以协助。⑦完成了文明开化的自负，和对朝鲜的独立与开化进行援助的领袖意识，轻易地为政府表面标榜的“帮助”朝鲜“独立”和内政改革的战争目的所吸引。⑧一般国民也在平壤、黄海的胜利后，象陆奥所评论的那样，“一般气象因雄心快意而狂喜，流于骄傲自慢，国民到处沉醉于欢呼的凯歌声里，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象‘克里米亚战争’以前英国人号称‘军国主义’团体那样，除催促前进战斗的呼声之外，其他都听不进去了”。⑨明治维新以来受欧美列强压迫和官僚政府抑压的郁愤之情，立即倒转过来，陶醉于对朝鲜和中国民族成了优越者和胜利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反对战争的人，只有根据基督教的四海皆兄弟的思想，主张绝对不要战争的日本和平会只在开战前活动而已。⑩不过，这只限于基督教内的一派的运动，影响甚微，基督教徒毋宁说大都协助了战争。

三国干涉与台湾、朝鲜

日本在媾和谈判中所表示的对朝鲜和中国的权益要求，立即起到引起欧美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冲动的作用。媾和条约签订后的 4 月 23 日，俄国、法国、德国以日本领有辽东半岛“不仅恐将威胁中国首府，并将使朝鲜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为理由，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正在从西伯利亚南下的俄国和以印支半岛为据点窥伺中国南部的法国，从 1891 年以来结成俄法同盟，夹在两国中间的德国，为了把俄国的侵略矛头引向远东以谋求本国的安全，同时也视为这是参加瓜分中国的机会，便同两国采取了共同行动。政

府深知没有同三国交战的能力，而企图利用列强的对立来排除干涉的策略，也看到所依靠的英国没有动静，便在5月4日接受了三国的劝告，10日颁发接受劝告的诏书，作为交还辽东半岛的代价，由中国获得银三千万两。

取得辽东半岛主要是根据陆军的要求，而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则出于海军的主张。台湾已有1874年出兵台湾的先例，再加上1884年中法战争时，法国舰队曾占领基隆和澎湖岛，它的军事价值受到重视。早在同中国进行媾和谈判中，日本军就占领了澎湖岛，随后媾和条约刚一换文，就立即把陆军派到了台湾，当时中国反对媾和运动正在高涨，康有为等一千五百名举人实行公车上书。他们耽心如果把领土、赔款和特权给予日本，欧美列强就会一齐逞其野心，中国势将四分五裂，因而主张抗战和改革政治。⑪在这种民族主义高涨中，台湾人士绅（官吏、读书人、资产家）拥戴清朝巡抚唐景崧，宣布独立，建立了共和制的台湾民主国。领导者的意图在于取得帝国主义各国的支持和干涉，以反对日本的领有。日本军6月攻占台北，在唐总统等民主国首脑逃跑之后，居民还进行激烈的游击抵抗。对此，日本投入两个师团的兵力，10月占据了台南城，总算控制了全岛。但是后来仍然不断反抗，从1898年到1900年，遭到杀害的"叛徒"达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⑫政府在领有之初，计划在武官总督之下实行民政，但因抵抗激烈而改行军政，1896年3月在修改了军政以后，制定的台湾总督府条例中，还是以武官为总督，拥有动用兵力权。其统治是苛刻的军事政权的统治。法制上采取内地法律延长主义，采取了完全无视原住民的习惯、语言、宗教的特殊性的行政划一主义，而原住民的人权保障和参与政治却完全与本国不同，宪法上的天皇大权是行使了，但臣民的权利义务并不适用。这实质上是赤裸裸的殖民地统治，但表面上却避讳使用殖民地这一名词，而以慈惠的同化政策为标榜，成了后来统治朝

鲜的原型。⑬

日本虽然在战争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没能象预期那样在朝鲜扩张势力。因为朝鲜已经落入帝国主义列强对立的网络里了。媾和后的第三个月7月，受井上馨公使大力支持的内务大臣朴泳孝（开化派），以计划暗杀王妃的罪名，受政府的通缉而逃亡到日本。于是得到俄国公使和美国公使支持的闵氏一族统治了宫廷和政府。对此，井上的后任公使预备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于同年10月，指使日本守备队、日本人官吏、警察、壮士拥护闵妃的政敌大院君，闯进王宫，杀害了闵妃，建立起亲日的金弘集政权（乙未政变）。⑭然而，这次行动遭到朝鲜官民的反对和列国外交官的抗议，日本政府也无法置之不理，便解除三浦公使职务，并逮捕了以三浦为首的有关者（但是第二年1月广岛地方法院的预审和广岛的军法会议以证据不充分为理由，宣判全员无罪）。这个事件的结果暴露了日本蛮干的朝鲜政策破产，也就促进了朝鲜宫廷接近俄国，1896年2月，国王逃出软禁状态的王宫，逃入俄国公使馆，金弘集遭到暗杀，政权瓦解了。而儒生和农民的反日“义兵”斗争扩展到了各地。朝鲜越发变成帝国主义体制的矛盾焦点，日本为了实现对朝鲜的统治，需要比甲午战争时更甚的武力和镇压了。

甲午战争的性质

围绕对朝鲜的统治而和中国之间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以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藩阀势力和川上操六等的军部为主导，积极而且有意地发动的侵略战争。当时日本的经济处于刚发展到开始进入确立产业资本的阶段。如前所述，由朝鲜进口的大米和黄金虽然很重要，但对朝鲜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率，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同中国贸易的比率要比朝鲜高，占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四，但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也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

不能认为产业资本积极要求了甲午开战。[15]陆奥在开战的外交交涉上最担心的是国内政局的危机，这是在《蹇蹇录》中反复阐述的。而且这只是藩阀政府和超然内阁主义的危机，而不是明治宪法体制的结构的危机，这一点从战后的政治动向上可以找到证据。因而可以说是出于藩阀和军部的首脑的操作。为了把内部之争转向对外侵略政策，可以说是出于天皇制官僚本性的惯用手法。

不过，不能把甲午战争单纯地看成是天皇制绝对主义政权，和正在绝对主义化中的清朝政权围绕统治朝鲜的争霸。从开战之初到媾和完了，列强的干涉执拗地纠缠不放。如前所述，政府最后所以决心开战，是在已经断定英国不会强烈反对之时。开战之后，伊藤所以主张速战速决，是因为预料到列强会联合起来进行武力干涉，[16]应该说已经估计到后来的三国干涉了。日本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最后完成的场所东亚，结果会惹起列强的瓜分，但是，尽管这样，不能把甲午战争规定为以帝国主义的对立为基础的战争。日本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而战争的性质，比起日俄战争来是少的，而绝对主义者主体性的选择余地是比较大的。川上、陆奥所进行的开战外交，是无论如何也要挑起战争的蛮干冒险。据说连明治天皇也对开战怀着不安和不满，[17]就是它的反映。而这种赌博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列强正忙于对中国边境的侵略，还没有在中国内地或朝鲜做好行使军事力量的准备，致使日本钻了空子。[18]

这次冒险主义侵略战争的结果，日本因受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制约，虽然军事上取得胜利，却没能得到太大的收获。夺取中国领土的野心遭到挫折，而且最主要的目的统治朝鲜也没能实现。这固然是由于朝鲜人民反侵略斗争力量的缘故，但也是因为朝鲜被纳入帝国主义对立的圈子里的缘故。日本的侵略使朝鲜和中国供帝国主义来蚕食，因此也使自己投入帝国主义体制之内了。

以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早熟的步伐加速了。凭

战争得到的巨额赔款（收到的是英镑），成为1897年3月确立金本位制的准备金，此外，第一抵补了甲午战费的百分之三十（七千九百万日元），第二用作准备下次更大规模战争（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充军备费用（约二亿日元），第三用来设立钢铁厂和扩充铁路、电报电话事业（三百八十万日元），第四用来充作经营台湾殖民地的费用（一千二百万日元），第五用来充作皇室费（二千万日元）和水雷、教育、灾害准备的三种基金（五千万日元）。就是说，以赔款为杠杆，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了。资产阶级也积极地热衷于对外侵略政策，叫嚷所谓“国旗飘扬的地方，贸易随之。”[19] 甲午战争并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矛盾而爆发的战争，但在完成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的开端上，却是划时代的。[20]

① 占领旅顺时，日本军惨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六万人，免于被杀的中国人只有三十六个人，这件事由美国报纸《纽约与世界》报导出来了。深怕当时正在审议日美修改条约的美国参议院受其影响，美国公使提出必须采取善后措施的警告，对此，陆奥对调查真相置之不理，辩解说被杀者多数是脱下军衣的清兵，稀里糊涂敷衍了事（藤村道生著《中日战争》岩波新书，132页，《蹇蹇录》102页）。

② 洪范十四条的内容为：断其依附中国之思虑，王室事务与国政事务分离，确定议政府和各衙门的职务权限，一律按法律征税，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制定征兵法，制定民法和刑法，不拘门第登用人材等各项（金教铉《日清战争和甲午内政改革》，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韩关系之开展》所收）。关于甲午改革的评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认为，由于农民军的压力和日本干涉内政，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实行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日译本119页）。关于对这个见解的疑问，可参照中塚明著《日清战争研究》166页。

③ 《蹇蹇录》47页。（中文译本29页）。

④ 1894年8月23日，陆奥对大鸟的训令，同年8月17日，陆奥上呈伊藤的阁议案（《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1,441、438号）。

⑤ 《蹇蹇录》123页。（中文译本77页）。

⑥ 关于此（6）项（条约第六条第四项）所规定的资本输出，从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看，很难设想是出于自主要求的。中塚是持有如下的看法，即，出于防止俄国干涉，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尤其取得英国对整个条约的赞同（根据最惠国条款，列国当然可以均沾此条规定）的外交策略（前引书282页）。此外可参照林董的回忆录《怀

羽后记》(东洋文库)264页。

⑦ 福泽谕吉《日清战争文野之战也》(1894年7月,《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491页)。内村鉴三《日清战争的意义》(1894年9月,《内村鉴三著作集》第2卷23页)。

⑧ 陆奥宗光指出"不外乎素称的庸俗的舆论,即所谓抑强扶弱的义侠论而已"。把这种外交问题(朝鲜内政改革问题——引用者)看作是出于道义的必要,而不是出于政治的必要。并且批判说:"我当然认为朝鲜的改革内政,除了政治上的必要外,没有别的用意,也绝不认为有必要以义侠精神兴十字军。"(《蹇蹇录》47页)。

⑨ 《蹇蹇录》145页。(中文译本90页)。

⑩ 日本和平会是乘英国和平会前书记约翰斯来日讲演的机会,以基督教公谊会派教友会的加藤万治为中心,在1889年11月创立的。1892年3月发行机关杂志《和平》、北村透谷任主笔。而该杂志于第二年的5月停刊,日本和平会也在战争爆发后不久解散了。教友会围绕对战争是支持还是反对之争分裂了,反对战争的外国人牧师和信徒建立大日本和平会,1895年1月发行机关杂志《和平的使徒》,少数人继续进行活动《透谷全集》第3卷,高桥正幸《日本和平会觉书》(《桐朋学报》18号),同《透谷与"和平"》(同上杂志20号)。

⑪ 市古宙三《日清战争时中国的主战论》(《中国近代政治与社会》所收)。

⑫ 黄昭堂著《台湾民主国之研究》。许世凯著《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细川嘉六著《日本殖民史》。

⑬ 矢内原忠雄著《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中村哲《殖民地法》(《日本近代法发达史5》所收)。

⑭ 这次事件的史料,在《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1,第29卷,《秘书类纂·朝鲜交涉资料》中卷等书中皆有,研究成果可参看山边健太郎《论乙未之变》(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韩关系的开展》所收),朴宗根《围绕处理惨杀闵妃事件的诸问题》(大塚史学会编《东亚近代史研究》所收)。此次非法的武装政变计划是以日本对朝鲜的传统政策为基础的,杉村濬书记官说:"相信其目的是和大鸟、井上两公使之所为一样,其手段比去年七月事件(1894年7月的大鸟公使的举动——引用者)要缓和",表示反对处罚三浦(《秘书类纂·朝鲜交涉资料》中卷553页),其先例为1884年的甲申事变的武装政变。

⑮ 陆奥关于甲午战争中取得的朝鲜铁路权益,所以没有实现的原因,谴责资本家的消极态度说:"我曾招请那些豪商巨族的代表、从前主张修建朝鲜铁路的人们,力劝他们经营此项企业。然而,他们已不象当初那样热心,迟疑逡巡,有的说希望得到日本政府赔偿损害的保证,有的说希望能对其投资给以特别补助金,政府既不直接或间接承担国库的负担,于是自抱奋勇承办这项事业的人已经没有了,以致外交上取得的权益(日韩暂定合同条款——引用者)也成了画饼"。(《蹇蹇录》132页,中译本83页)。

⑯ 伊藤在上奏章里说:如果英、俄进行干涉,"认为是世界的强国诸如法、德、意、美等,以至实际在东洋局势上没有太大关系的国家,也难保不为了和英俄两国保持平衡,出来插嘴"。"必须在未受此联合的强有力的干涉之前,速向中国博一大捷,以便不论何时都能占住对敌国提出我方要求的地步"(《伊藤博文传》下卷84页)。

⑰ "宣战诏书刚一公布,宫内大臣土方久元子爵便来到御前,等候关于派遣奉告

神宫和先帝陵墓的敕使人选的圣旨。天皇说，"不要这样作了。这次战争并非朕之本意，因阁臣奏称战争出于不得已，才答应了，以此奉告神宫和先帝之陵，朕深感苦恼"(《明治天皇纪》第8，481页)。天皇的不满是针对违反天皇亲政素志的军部和外交当局专行独断而发的，是对于没有名义的开战——强行开战外交——感到不安。在佐佐木高行的日记中有"6月24日，土方久元、岩仓具定(侍从职干事——引用者)进宫时，谈到朝鲜事件，土方和岩仓都认为，此次事件干涉得过于急迫．对否？岩仓说，仅从保护人民来说，最初的出兵觉得过多。这样下去，战争的名义会怎样？但愿战争不至成为由日本强行逼迫的战争。不过，两人都认为事到如今，也只好无论如何干下去。土方说，皇上曾说，根据情况发展，想到西京行幸去，我回答说极对。"(津田茂麿著《明治圣上与臣高行》896页)。天皇侧近的人虽然也怀危惧，但不仅没有反对战争，而且督促开战(同上书897页)。天皇开战后也极其积极地指导战争，鼓励士气。此外参照藤村前引书96页。

⑱ 藤村道生关于发生甲午战争的时间上的特点说："因为发生战争是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体制正在开幕的特殊时期，世界政治基本上是由帝国主义对立所规定的。但是由于运输、通信手段还不发达，帝国主义还没有完全控制全世界"(前引书序文3页)。

⑲ 《东洋经济新报》第6号的社论《第九届议会》中说，"应该知道，如不确立外交政略，便没有发展贸易之道(中略)。确立对清政策之急，在于对朝鲜政策一步不让。夫列强对中国的现状，如同投一块肉群犬争食。国旗所到之处，贸易从之，这不是说由于有军舰，而是说有一定的外交政策"。《东洋经济新报》是1895年11月由町田忠治(后来以天野为之、植松考昭为主干)创办的，是以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根本理想的。(《东洋经济新报言论六十年》)。

⑳ 关于甲午战争的性质，矢内原忠雄论证说："可以说具有早熟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前期、通过政治、军事行动展开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所谓非帝国主义国的帝国主义的实践。首先踏出实践的第一步，实际则追随之。这是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阶段给加入其圈内的后进国日本规定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13页)。信夫清三郎认为开发朝鲜市场是产业资本的课题。关于开战外交的性质，则是从军部和具有资产阶级目的的伊藤、陆奥政府两者的"双重外交"来看的(《日清战争》、《陆奥外交》)。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在于对上述矢内原见解的批判，战后对此进行说明："如果从甲午战争是为了垄断朝鲜市场和台湾市场，是日本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点来看的话，甲午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单从外部因素来说明是不够的，必须承认这里有内部的因素存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软弱性要由政治、军事的占领和民族压迫来代替、来补充，才具有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本质。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建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最初的实践。"(《近代日本产业史序说》第3版、序文3页)。对此，井上清提出见解说，计划、准备、实行甲午战争的主体是绝对主义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II 169页)。他进而认为"是半封建的专制的天皇制固有的侵略主义的发动"，"没有具备任何近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并说明，甲午战争后，随着世界史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的同时，日本成为近代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员，通过实行近代帝国主义的政策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26、34页)。此外，中塚明说："甲午战争并不是日本资

产阶级的经济侵略冲动率先战斗的战争，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力的软弱，为了在帝国主义各国侵略远东的竞争中不至落后，才在绝对主义天皇制的主导下，专靠军事力量进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日清战争研究》291 页)。藤村道生说，应当作为三个方面的重层结构来理解，即“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要瓜分远东，为了想在事前压制朝鲜来排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的第一方面；“围绕同瓜分中国和朝鲜的列强进行竞争”的第二方面；以及“对出兵和占领地区的民众（亚洲民族）进行压制”的第三方面。(藤村前引书序文 2 页)。

第四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第一节 扩军政策的矛盾

超然主义的修改

甲午战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迫使统治者把明治宪法体制原封不动地转化为帝国主义政权机构的条件而迅速加以整备，并使其在极端的矛盾重重之下实现了。

甲午战争之后，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立即向第九届议会提出了包括大规模扩张军备以及与之密切结合的扶植产业(扩充交通、通信和金融)的岁出总额达一亿九千万日元的预算(比上年增加一倍)。关于扩军，陆军方面制定了从1896(明治29)年度起新建步兵六个师团、骑兵两个旅团、炮兵两个旅团，现役兵力比甲午战争当时增加到两倍以上的计划，海军则作为第一期扩充计划（从1896年起的七年计划)提出了建造以战舰为主的五十四只舰艇(跨年度费总额九千四百九十七万日元）的方案。假想敌国明确规定为俄国。这项经费仅以清国的赔款和事业公债是不够的，而是从新设的登录税、营业税、增收酒税和实行烟叶专卖来寻求财源。

为了实行增税，同政党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伊藤明确了同自由党合作的方针，取得阁议的谅解。于是在第九届议会上，虽然立宪改进党等在野党主张削减行政费和扩军费，但由于得到自由党和国民协会的支持，大致按原案通过了预算。议会闭幕后的1896年4月，作为自由党支持政府的报酬，总理板垣退助入阁任内务大臣。虽然采取了脱离党籍的形式，但政党首领任大臣尤其就任掌握地方政治和警察实权的内相，这意味着藩阀内阁据以自立的

超然主义原则大加修改。正因为这样，同政党合作的政策引起了藩阀势力、官僚、贵族院内的不满和反对，而完成扩军和增税这个至上任务；后来也更加发展了这个方向。伊藤想乘这个趋势让立宪改进党的总理大隈重信入阁，以便采取举国一致体制，但因板垣反对，8月，内阁总辞职了。

下一届的第二届松方正义内阁与进步党合作，以其实际的党首大隈为外相（世称松隈内阁）。进步党是由反对伊藤内阁的立宪改进党等对外强硬派在3月建成的。虽然标榜立足于进步主义，但却提出"刷新外政，扩张国权"的政纲，基本方向和藩阀势力、自由党是相同的。① 而从中撮合松方和大隈的居间人是三菱的社长岩崎弥之助。这是象征着富豪发言权已经很显著的战后政界情况的事件。②

松方内阁向第十届议会提出的预算案的岁出总额，大为增加，共二亿四千万日元，其中包括海军扩充十年计划③ 在内的陆海军费接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由于进步党等政府友党的支持和自由党的消极态度，几乎全额得到通过。关于战后经营大纲，在野党的自由党也没有反对的理由。议会闭幕之后，内阁为了酬劳友党的支持，起用政党人任各部的干部和县的知事，并增设了敕任参事官的制度，为政党党员开辟了任官的途径。政党势力在政府内的增长引起世人的注目。政党人认为政党接近藩阀势力是向政党内阁的前进，从而集中力量进行这项交易。这一方面意味着政党的保守化，另方面也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政界里产生了自由主义的风气，藩阀也不能悍然拒绝的情况。政治已经不是官僚、政党党员和地主的私物了，对于以日益增加的读者意见为背景的新闻记者，和拥有经济实力的工商业者，也开辟了活动的舞台。

进步党作为支持松方内阁的一个条件，取得了松方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的保证。但是阻止实现这种诺言的障壁仍然存在，首

先表现在"二十六世纪"事件上，④随后又表现在第十届议会提出的集会及政社法修改案（废除警察的解散集会权和禁止政社间联络的条款）被贵族院以审议未完而葬送了上面。可是新闻纸条例的修改案（从来属于内务大臣权限的发行报纸的禁止或停止，改属法官权限），却在贵族院排除山县系议员的反对，得到通过。在此期间，全国的报纸杂志记者结成联盟进行活跃的活动产生了影响。此外，1896年11月，各地的商业会议所联合起来，向大藏大臣和帝国议会提出降低营业税法税率的建议，在下一年12月的联合会上，由东京商业会议所提出了包括缩小"非生产性的军备"在内的整理财政意见案。⑤商业会议所是包括大企业家直到零售业者在内的组织。在1896年末开始，1897到1898年发展成真正的战后经济危机，打击了纺纱业、织物业和其它小企业，实业家和工商团体提出救济方案进行活动，此外还有1896、1897年的灾年的影响，米价高涨，大阪的天满纺纱厂和横滨船坞等不断发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另一方面，支持扩军的政党，也不能无视国民要求减税的呼声。

在这样情况下，谷干城、曾我祐准等四十八名贵族院议员，在第十届议会上提出对"军备尚未充实，而民力先告枯竭"深以为忧，应急速改变扩军计划，首先谋求发展民业的上奏案。这虽然被否决了，但言论界的陆羯南、福本日南等对外强硬派却发表了批判军国主义和扩军的言论。⑥他们并不反对充实军备本身，而是耽心扩军、强兵和国家主义的基础即国民的产业、生活之间发生的摩擦，将更加扩大，因而主张加以防止。于是，在这样舆论动向的推动下，进步党以不履行整理行政和反对增税计划为理由，1897年10月，拒绝同松方内阁合作，进步党的居官者和大隈都辞职了。这是因为正值编制1898年度预算时，岁入不足要由增收地税来弥补⑦，进步党的不满因此爆发。12月第十一届议会刚一开始，自由党、进

步党等各党联合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对此，松方解散议会之后，提出辞呈。

政党内阁的诞生

当下一届的第三届伊藤内阁组阁时，伊藤想要组成“举国一致”内阁。首先要求大限入阁，不成之后，又和板垣交涉，又不成。和政党的合作失败，都是因为有关分配大臣椅子的交易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1898年5月的第十二届议会上，政府提出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改草案和增税法案。前者是撤销被选举人的纳税限制，此外选举人的纳税限制降低到缴纳地税五日元以上，或者纳所得税或营业税三日元以上，以及采用以各府县为一选举区的大选举区制，以市为独立选举区，以利于选出议员，议员总数增加到四百七十二人。这是符合国民多年来的希望的，特别是要扩大工商业者参加政治的途径，也就是对增税的补偿。众议院加上了把选举人年龄从二十五岁降为二十岁，被选举人则由三十岁降到二十五岁的修改而通过了，但是，如后所述，因为众议院的解散，却成了审议未完的悬案。后者是作为扩军的财政来源，想增收地税、所得税和酒税。尤其一向是悬案的增收地税案，是以水旱田百分之三点七(原为百分之二点五)，市街宅地百分之五，郡村宅地百分之三，池沼和山林百分之二点五为内容的。在政党内部，虽然也有如果修改地价，则赞成增收的人，但大多数是反对的。政党的首脑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以参加政权这样高的代价来交换，所以没有轻易订出赞成的方针。结局是自由和进步两党都反对。众议院在6月一旦以压倒多数否认了增税案，政府便立即解散了议会。

这时在两党之间，民党合并的计划急遽抬头了。因为看到这是实现政党内阁的良机。于是准备工作迅速进展，6月自由党、进步党等解散，成立了宪政党。其纲领是，奉戴皇室，拥护宪法，建立

政党内阁，发展地方自治制，保持国权完整和发展通商贸易，维特财政岁计的平衡，振兴产业，适应国力的陆海军设备，加速完善交通运输机关，普及教育和奖励科学。于是出现了在众议院占绝对多数的一大民党。对此，也由于财界的涩泽荣一和大仓喜八郎的劝告，伊藤决心组织政府党，向政界、财界进行了活动，但由于山县系官僚的反对、再加上实业界也因为对三菱反对伊藤企图有所顾虑而静观不动，所以没有实现。⑧在接受伊藤辞职的元老会议上，无法决定后任者，伊藤奏请天皇对宪政党首领大隈和板垣发下组阁大命。而藩阀势力方面则是怀着如下的赌博式的意图的，即不仅因为完全没有自信承担以宪政党为敌的政局，而且也想让政党自己亲手实现不可避免的增收地税，如果它办不到，那么就使天下皆知政党内阁之无能。⑨

宪政党方面没有预料到这么早就登上了政权宝座，可见体制还没完备。1898年6月，作为日本最初的政党内阁而成立的第一届大隈内阁（隈板内阁）是，大隈首相兼外相，板垣任内相，而旧进步党系有三名，旧自由党系有二人入了阁。除了陆海军外，各省次官和警视总监，以及各省的局长和府县知事，也都起用了宪政党员。不过，受天皇命令留任的海相西乡从道、陆相桂太郎，作为交换条件，得到了大隈的凡军备必要者一律筹办的诺言。以扩军为中心的政策没有改变的余地，于是军部大臣的存在就使政党内阁陷入“半身不遂”了。⑩

8月的第六次大选，宪政党虽然获得二百六十名的压倒多数，但是十天以后，尾崎行雄文相在帝国教育会的演说被抓住话把，枢密院、贵族院的保守势力以不敬事件进行抨击⑪，党内的自由党系也起而呼应。桂陆相与山县有朋、伊东巳代治联系，和自由派接近，也和离间进步派的策略纠缠在一起了。最后在10月，尾崎以不符合圣旨的理由被迫引咎辞职。⑫但围绕其后任人选，两

派的对立表面化了。大限一旦独断地让进步派的犬养毅入阁，板垣等自由派的三大臣、次官、局长等一齐提出辞呈，自由派单独召开党大会，决定解散之后，重新组织宪政党，选出了星亨等党干部。对此，进步派召开宪政党大会，但由于板垣内相的指示，被警察命令解散。不得已而改称宪政本党。宪政党内阁就这样成立仅仅四个月就因内部纠纷而瓦解，11月，元老会议推荐山县为后任首相，成立了第二届山县内阁。最初的政党内阁也完全被天皇制给扼杀了。内有军部大臣和官僚，外有贵族院和枢密院的反政党势力牢固地包围着。他们对于政党势力改变官僚制度，并向这方面扩张势力，抱着强烈的反感，但是，另一方面，也看透了政党不会采取和藩阀官僚势力不同的政治路线。因此，天皇制官僚掌握领导权，同政党紧密勾结的过程，后来也毫无变化地持续了下去。

增收地税和政友会

1898（明治31）年是有三次内阁更迭的政局混乱的一年。山县首相希望同宪政党合作，围绕政党方面提出的大臣、知事职位的要求，经过一番曲折之后，在桂陆相斡旋之下得以解决。即，内阁采用宪政党的纲领，实行修改选举法、改革地方制度，实现铁路国有和对商船航路的补助等，宪政党则以实现增收地税和抑制猎官为交换条件，实现了合作。宪政党对政府要求的政策主要是为工商业者谋利益的，而以此为扩张党势的目标。1898年11月召开了第十三届议会，内阁提出包括一亿日元扩充军备费在内的岁出共二亿二千六百万日元的预算案，为填补其中三千七百万日元的岁入不足，拟将水旱田的地税从地价的百分之二点五增加到百分之四和增加酒税、所得税、登录税、印花税、酱油税、邮政税，并新设吨税。

对此，宪政本党和农民团体组织反对增收地税的同盟会，掀

起反对运动，而且有谷干城、曾我祐准、三浦梧楼、富田铁之助等贵族院议员参加，谷任同盟会的干事长。这些贵族院议员是上述第十届议会提出缩小扩军上奏案的集团。⑬另方面，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商工会议所为中心，结成以涩泽荣一为会长的增收地税期成同盟，对贵众两院议员进行活动。他们主张实现扩军的国家财政负担，应当由因米价上涨使地税负担实际上减轻了的农民，比工商业者承担更多些。政党的反对增收地税的声浪并不那么强。因战后米价上涨得到利益最多的是地主。此外，由于已经实行的河川法（1896年）、耕地整理法（1899年），获得由国库支出的土地改良条件，由于日本劝业银行（1897年）和农工银行（1897年以后在各地）的设立，地主得到低利贷款，开辟了取得田地和进行股票投资的途径。也就是由于政府农业政策的力量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能够稳定地得到地租的增长，而且从出售地租米取得的货币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利地运用的条件正在日趋完备。加之，宪政党与山县内阁合作的条件中，无论在企业投资方面也好，农产物出售价格方面也好，保证地主利益的铁路国有和商船航路的补助都得到政府承诺。此外，在增收地税法案中还包括水旱田地价修改案，这就把重视修改地价更甚于不增加地税的地主阶层这部分人吸引过来。尽管这样，为了通过增收地税案，还必须施展不正当的手段。宪政党领袖星亨以山县提供的大量资金（其中包括宫内省机密费和天皇手头的钱）⑭和利权收买议员，还把议员的年俸由年八百日元提高到两千日元为诱饵，⑮实行增收期为五年间，增收率改为水旱田是地价的百分之三点三、市街宅地是百分之五，这样才通过了地税增收案。地税的增收是二十多年来的课题，历代内阁为了实现增收而一直反复同政党发生激烈冲突，这个政治课题到此才告解决，这是决定地主的性质及其在国家政权内地位的变化反映在政党变质上的决定性事件。

第十三届议会闭幕之后的1899年3月，内阁以敕令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公布了文官分限令和文官惩戒令，巩固了官僚制度。以此废除了从来的敕任官自由任用，改为和奏任以下的文官一样实行按资格任用，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政党党员就任官职。[30]而且根据第二年4月的圣谕，关于文官任用以外的官僚培养和官僚机构的敕令，改为必须经过官僚势力的大本营枢密院的咨询，这就更加巩固了壁垒。又于1900年5月，修改了陆海军省官制。军部大臣限由现役的大将和中将担任。这虽然是把从来的惯例加以成文化，但因此明确了将来建立政党内阁时，也保证了军部大臣的独立性。在实现悬案的地税增收之后，藩阀官僚势力开始反攻了。尽管如此，政党终于没有同官僚断绝关系，还希望山县内阁来实现修改选举法。

在从1899年11月开始的第十四届议会上，实现了从前每次议会都成为问题的修改选举法。即实行一府县为一选区的大选举区制，人口三万以上的城市为独立选举区，选举权改为缴纳直接国税十日元以上的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被选举权改为三十岁以上的男子，议员人数增加到三百六十九人。其目的在于增加城市选出的议员，以符合工商业者的愿望，想通过选举权的扩大来回答政党和国民的要求。由此全国有选举权的人增加了将近二倍，在农村中连自耕农都包含在内了。这个目标早在上次议会修改府县制和郡制中做好了准备，把从来的府县会、郡会的复选制（间接选举）改为由纳直接国税三日元以上的有权者的直接选举，废除了大地主在郡会中的特权。已经很难把地方从中央政界隔开了，也很少有这种必要了。官僚和政党的勾结关系已经进展到这样程度。寄生地主制一确立，大地主的特权就无需特别的政治保证了，而自耕农阶层参加政治也不会使村落秩序和政党的选举地盘发生质的变化了。根据农会法（1899年）和农会令（1900年）的农

会所以没有在会员资格上设置财产的限制，是因为有产业组合法（同年）的保证，“将地主比作军官，自耕农比作下士官，佃农比作兵卒的金字塔型农村阶级关系”[17]正在形成。政党的势力尽管在扩大，而国民对政党、议会的期待却反而在减弱。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也不关心。在第十四届议会中，治安警察法是在省略讨论、没有异议的声中通过的。这项法律是为代替集会及政社法而制定的，但在第17条中却禁止工人和佃农的团结和争议，是在预测工人运动和佃农运动的兴起下所采取的周密的取缔措施。

第十四届议会刚一闭幕，宪政党作为支持政府的代价，要求党员入阁或阁僚入党。这个交涉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宣布断绝和山县内阁合作，把路线转换到正在开始的伊藤博文组织政党的活动方面来了。1900 年 6 月，由伊藤系官僚、宪政党领袖和无所属议员组成了创立委员会。9 月宪政党实行解散，创建了立宪政友会，自由民权运动以来的板垣退助退出，伊藤当上了总裁。议员人数为一百五十六名，成为占众议院过半数的大政党。于是 10 月组成的第四届伊藤内阁，外相和陆海相以外，阁僚全是政友会的党员。

星亨等对于政友会的建成和伊藤内阁，讴歌为政党内阁的实际出现。但是，伊藤却想使之成为和过去的政党性质不同的、网罗了官僚、华族、实业家的有力者的国家政党，并强调任免阁僚的天皇大权，明确规定它是天皇大权下的政党和政党内阁的地位。[18]因此，幸德秋水为《万朝报》写了《自由党祭文》的社论，慨叹地说，有谁在当时会想到自由民权志士的热泪鲜血，他日会成为供其仇敌专制主义者用的唯一装饰品呢！[19]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伊藤所以出头建立政党，是根据第三届内阁辞职后在中国旅行的见闻，为了能够对付列强瓜分中国的激烈竞争，要调整国内的体制。而所谓对付帝国主义的国内体制，不外是以天皇大权

为枢纽，使官僚、地主、资产者团结起来用以巩固国家政权。立宪政友会的建立，是确立这条路线的开始，是战后经营的政治落脚点。[29]

① 1896年11月，进步党大会的政纲说明书中说："总之，松方首相对地方官宣布的几条施政方针，全都是当务之急，与我党的方针无大差别。即我党以帝国大政党的本分唯期其完美实行（林田龟太郎著《日本政党史》上卷445页）。所谓松方首相在地方官会议上讲的施政方针，是发展贸易，完成修改条约、扩充军备、整顿行政和财政、尊重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

② 山路爱山著《现代金权史》(1908年)认为松方背后有富豪，而评论说："推翻了在甲午战争中有赫赫功勋的伊藤内阁的，不是自由党，也不是进步党，其实可以说是多年来养成势力的大富豪"（《明治文学全集·山路爱山集》56页）。当时也流传这样情报，由《近卫笃麿日记》明治29年9月12日项下的如下记录可知。"鸟谷部（铁太郎、杂志《太阳》的编辑——引用者）的时事侦察报告中说，这次内阁变动的大动力，想不到是实业家。即三井、三菱两派之人认为，渡边藏相固不待言，旧阁僚的柔软政略，使实业家的手腕终究难以发挥。因此有必要使松、隈两伯爵组织内阁，充分实行政治的根本改良，这是三菱以大石正已为运动者，三井使福泽谕吉一派为之尽力的结果，山县、井上之干涉，高岛拓相等之意见等等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事实大概是这样"（第一卷52页）。此外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动向，参照前岛省三《资产阶级走上政界》（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4》所收）。

③ 鉴于中国形势紧迫，追加第一、二期扩充计划，决定从1896年度起到1905年的十个年度的跨年度费为二亿一千三百一十万日元，建造九十二只舰艇。可是，后来同俄国的关系紧张起来，提前了预定计划，到1902年大致完成了。

④ 在内阁书记官长高桥健三实际主宰的杂志《二十六世纪》上，刊登了《宫内大臣论》文章。其内容是攻击土方久元宫相与伊藤勾结，恣意营私舞弊。对此，宫相要求政府处以不敬罪，而清浦法相表示反对，主张给以停止发行处分，大隈连法相的提议也加以反对。最后在宫内省方面的强大压力下，1896年11月《二十六世纪》被禁止发行，而转载此论文的报纸《日本》停止发行。参照祢津正志著《日本现代史》1，139页。甲午战争后藩阀势力的诏敕政策和天皇的权力、权威的增强，腐蚀了宫廷和宫内省。近卫笃麿关于这个事件也说："宫内省的腐败实在是这样"（《近卫笃麿日记》第一卷116页）。

⑤ 东京商业会议所的《财政整理意见案》中说："战后经营首先着手的应该是谋求充实为战争所消耗的国力，扩充军备等事，应列为第二位，然而不幸我政府之措施，有完全与此颠倒之处（中略）。如将赔款全部投于非生产的扩充军备经费之上，充实国力，何日可期？"。涩泽荣一对此加以说明，他说"（军事费之膨胀）与国富、民力相比，有过急之嫌，此乃当前必须议论者"。这项提案，因横滨商业会议所会长高桥是清等反对而未得通过（《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22卷309、306页）。关于这时期政党以外

的民力休养论，可参照坂野润治《日清战后的政治过程》(《讲座日本史》6所收)。

⑥ 主张现行条约励行论的对外强硬派之一的陆羯南，甲午战后，力主民力休养的必要，反对扩军第一主义。"盖天下有无军队之国民，尚未有无国民之军队。天下有无军备之财政，尚未有无财政之军备。天下有无军人之政府，尚未有无政府之军人。若有人说有之，愿举国民，举财政、举政府，一切委之于陆海军。所谓战后经营如此之谓也"(《时务偶感》1897年6月，《陆羯南全集》第五卷587页)。

⑦ 为筹措扩军费用，增收地税乃不得已的意见，在政、财界很强。《东京经济杂志》(810号、1896年2月)的社论《奈此大势何》，关于以战争为界限的"舆论"的变化说："当此减轻地税论风靡社会之际，任何正论亦不得与之相抗。自从前年甲午战端开始起，其势骤然一变，扩充军备和积极主义等二论，所在响应，以至出现不唱此说者非人也之风说。舆论之变迁不亦大哉"。所谓"积极主义"是对休养民力的"消极主义"而言，关键在于扶植工商业的政策。商业会议所的减轻营业税和缩小军备的意见，反过来说，包藏着扩军由增加地税来搞的见解。

⑧ 1898年6月19日，井上馨致伊藤书。"实业家的社会，也似乎唯以岩崎的意见是从(中略)。(岩崎和——引用者)大限几年来交情密切，且进步党徒中特别活动者以福泽塾出身者居多，而福泽与岩崎的交情，又是几年来大约补助了十万日元(中略)。在实业家以及各银行公司中，以岩崎的财力和日本银行的势力合起来对付上述各公司时，尽管他们内心充分理解当前政党的弊端，但想到当前的金融、企业受到妨碍，从而感到迷惑，乃人情之常，实业家的团结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期待，这是必然的"(《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一。278页)。岩崎弥之助当时是日本银行总裁。

⑨ 伊藤内阁的藏相井上馨的意见是，把内阁让给政党，让它们来干干看，但是对于他的真意，山县系官僚大浦兼武(熊本县知事)给井上的信中说："我推测阁下(井上——引用者)之明智，必然是等待现政府(隈板内阁——引用者)自然瓦解，使天下人心认识所谓政党内阁实在无能的意见"(1898年8月书。坂野润治著《明治宪法体制之确立》166页)。

⑩ 《桂太郎自传》(卷三)叙述桂和西乡接到"陆海军是陛下特别组织的，因而极应留任"的敕命，由大限得到扩军的诺言，确定了"在军备上不得有一点染指"，才就任陆海军大臣的经过情况，并评论说，"这样成立的内阁可以说是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彼政党者流虽自称政党内阁，但据我看来，说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才极洽当。因为陆海军两大臣是由政党以外的人充任，所以以政党为基础，缺乏整体活动，可谓半身不遂的内阁。"(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明治史料》7，20页)。

⑪ 尾崎的演说是批判"拜金主义"时潮的，其中一节是"在日本无需担心实行共和政治。即使经过千万年也不会实行共和政治。但为了便于说明，假定在梦中看到日本实行了共和政治，那末恐怕三井、三菱将成为大总统的候选人"(大津淳一郎著《大日本宪政史》第四卷825页)，这话受到轻视国体、不敬天皇的责难。

⑫ 尾崎辞职的直接动机是侍从岩仓具定向大限传达了不信任尾崎的圣旨(大津前引书第4卷828页)。对于这一点，近卫笃麿评论如下："今早看到报纸号外，尾崎文相未副陛下圣意而递上辞呈云云。一渺小尾崎的进退何足轻重，惟以不副圣意而

开免黜国务大臣之例，或恐卒至怨恨皇室。现今虽无归怨于皇室者，但如屡次援用此例，实属严重大事，泄党争私愤之极以至于此，实堪慨叹之至”（《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177页）。

⑬ 三浦梧楼述说其反对增收地税的理由如下：“当然扩充军备也是必要的。但其国费的财源必榨取于多数农民的腰包。枯竭国家财源而断然扩充军备，实属不当。无论编制出多少军队，钱串一断也白搭。现在国家的道义，都从上边败坏了，只有地方淳朴的农民身上还存在着。然而，如因增收地税而枯竭了财源，就会破坏了德义尚存的农民界。我因此两个理由而愤然反对”。并且说和大隈“从政略上反对的意义是有不同的”(《观树将军回忆录》352页)。

⑭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311页。

⑮ 从第二届议会以来在足尾铜矿矿毒问题上进行活动，并参加反对增收地税同盟会的田中正造，代表宪政本党作了反对增加议员年俸的演讲，指出农村的不景气，说“提出这样原案的人，说来也许过刻，这是贿赂，无礼太甚”。在增加年俸案通过时，为对主张负责辞退了年俸（木下尚江编《田中正造之生涯》229页)。他对于政党有关矿毒的态度很失望。并且对于增收地税问题的动向甚为气愤，1901年3月辞去议员职。

⑯ 修改文官任用令，当然遭到宪政党的激烈反对，作为妥协方案，以警视总监、警保局长、各大臣秘书官为例外仍实行自由任用，而各省次官改称为总务长官，新设敕任的官房长，这些也都是自由任用。

⑰ 《日本农业发达史》第3卷384页，第4卷105页。

⑱ 1901年，伊藤在长野县作竞选演说时说：“将来建立政党将属必要，同时君主既掌握着用何人和不得用何人的大权，虽属党派之人，以党员组织政府亦无何妨碍。只是其党派总须牢记的是，在委托党派以大权的作用时，因为天皇是不偏不党的，心中必须牢记既受托以不偏不党的天皇大权，从而必须有责任为日本国民实行普沾甘露的政治。对此有了误解，就不得了”。(大津前引书第5卷119页)。同样的意思，在以伊藤名义发表的立宪政友会创立宣言中也有阐述。

⑲ 《幸德秋水全集》第2卷423页。幸德还认为立宪政友会的宣言、纲领的本意在于非政党内阁主义，指责这是毁灭代议政治，启蹂躏民党二十年来主张的开端（《希望于进步党者》同上书第2卷422页。

⑳ 关于立宪政友会的组织和意义，可参照小山博也著《明治政党组织论》，中村政则《日本资本主义确立期的国家政权》(历史学研究会编《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和人民斗争》所收)。

第二节　外交政策的混乱

战后的朝鲜政策

1898(明治31)年1月，伊藤博文组织第三届内阁时，特意要

求召开由各元老出席的御前会议，以便决定外交方针。他在会上提出如下的外交政策方针，得到元老的同意和天皇的裁决，即"俄国由北满地方进逼中国，领有辽东、大连、旅顺，法国从南方领有云南地方，英国领有扬子江口，德国想占领胶州湾和山东地方。在仁川港现有英国军舰停泊。如果英俄间一旦发生嫌隙，我国应参加英国方面呢？还是参加俄国方面呢？若与英国联合，就不得不与俄法德三国为敌，如与俄国联合，则必须疏远英国。然而，试观我国现状，兵备尚未充实，财政亦未整理，何以得当此强敌？莫如局外中立，以自图安全"。①所谓"局外中立"，不过是国际上的孤立，从瓜分中国的竞争中掉队而已。而且不能独力控制朝鲜，下述事实足以明证。可以说外交政策极为混乱。

甲午战争后，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扩大了。在朝鲜的对外贸易中，日本占其进口的百分之七十和出口的百分之八十，日本商人以租界为据点向内地展开活动，并以朝鲜人名义取得土地所有权。很快进入朝鲜的第一银行，对朝鲜政府的贷款在1895到1903年间竟达二百万日元。尽管如此，政治上却一直是在后退。杀害闵妃事件之后，竟然使朝鲜政府要求俄国保护，民众的反日运动高涨，从国王到庶民都把反感集中于日本。1896年5月，小村寿太郎公使和俄国公使韦伯在汉城签订了备忘录。其内容是，对闵妃事件后在俄国公使馆避难的朝鲜国王采取善后措施和限制日本驻兵，以及承认俄国有同等数量的驻兵权。6月在莫斯科由特命全权大使山县有朋和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之间签订了关于朝鲜的议定书，其秘密条款为确认小村与韦伯的协定，以及规定了当朝鲜秩序混乱两国派遣军队时，为了防止冲突，在中间设立缓冲地带。这是对朝鲜进行分割统治的开端。日本对俄国这样让步，力求维持朝鲜的统治，但是这两个协定"不久就成为一张废纸了"。②这是因为俄国在和山县签订议定书的同时，就同朝鲜缔结了密约。其内容

是一种防卫同盟条约，日本政府得到这个情报是在第二年的11月。而且俄国在三国干涉之后，在对朝鲜的同时，也在中国不断扶植势力。1895年7月，乘中国苦于筹措对日赔款之机，俄国联合法国对中国签订四亿法郎借款，五个月以后开设华俄银行，猎取铁路和其他利权的活动活跃起来。俄国在同朝鲜缔结密约的同时，也同中国缔结了以日本为假想敌国的防御同盟密约，并取得铺设中东铁路的权利，由此以一直线横贯中国东北北部联接了赤塔和海参崴。这是缩短西伯利亚铁路而军事价值很高的密约（日本获悉这个密约是1903年12月）。在俄国侵略东亚政策积极化的背后，有俄法同盟和法国金融资本的援助。

对此，日本由于在1897年建立了金本位制，开辟了引进外资的道路，1899年募集到一千万英镑的外债，三年后开设引进外资机构的日本兴业银行，但引进的外资额并不大（真正引进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在资本输出上还没有同俄国竞争的金融力量。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要紧的朝鲜也是这样。号称统治朝鲜的动脉的汉城仁川铁路，已经凭暂定合同条款取得了敷设权，但政府和财界都因为资金困难而一直没有着手。1896年3月，朝鲜政府竟把敷设权利给了美国人莫尔斯。于是政府和参谋本部赶紧建立以涩泽荣一、益田孝等为代表的承办京仁铁路的组合，给予巨额补助金，好不容易才在1899年1月从莫尔斯手里买得了权利，这说明资本积累如何贫弱。③

到了1898年，俄国的侵略矛头和其他列强一起集中于中国。1898年3月，俄国获得旅顺、大连地区的二十五年租借权，以旅顺口为专用军港，并且得到把中东铁路延长到大连、营口和鸭绿江间的权利。德国也于同月取得了胶州湾地区的九十九年间租借权和铁路敷设权以及矿山开采权，法国也在4月租借广州湾，为期九十九年。英国也与此相对抗，6月租借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为期九

十九年，7月又得到了在俄国占领旅顺口期间，租借威海卫进行军事设施的权利。

在这样瓜分中国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唯恐落后于列强而焦虑。尽管有上述御前会议的决定，但也不能甘心袖手旁观。三个月之后，使中国答应不把在台湾对岸而与台湾经济有不可分割关系的福建省割让给别的国家，企图在此建立日本的势力圈。④最后在1899年4月，使中国答应日本优先买进大冶的铁矿石。为期十五年，每年五万吨，新设立的国营八幡制铁所（1896年公布官制）的生产因此才有可能。这是因为劣质的国产铁矿石，得不到预期产品的缘故。这些虽然与列强相比是微末的利权，但却表明日本参加了瓜分中国的意志。

列强侵略的加紧，使中国和朝鲜的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在中国，康有为等的变法自强运动扩大了，光绪皇帝的"新政"实现了。在朝鲜，标榜民权和独立而由官吏、文人团体、独立协会领导的运动兴起了，反对俄国获得利权。⑤使尽全副精力侵略中国的俄国，在朝鲜采取让步政策，按照朝鲜政府的要求，撤退了军事教官和财政顾问。1898年4月，西德二郎外相利用这种情况，与俄国驻日公使罗森之间签订了协定。其内容是日俄两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和不干涉内政；任命军事教官和财政顾问必须经两国协商；俄国政府不妨碍日朝两国间工商业关系的发展，俄国后退了一步。在这次交涉时，西外相提议分割朝鲜为日本的、"满洲"为俄国的势力范围的所谓满韩交换论，遭到拒绝。这表明这时日本还没有单独统治朝鲜的自信。

义和团事件

为停止不前的日本外交带来新气势的是1900年5月爆发的义和团事变。在山东省，对列强攫取利权的蛮横暴虐和外国人传教

士的布教活动的反感，引起了信奉义和拳符咒之术的农民、工人的暴动。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性质，从山东全省向河北省发展，排斥洋货，攻击了铁路、洋商、租界和公使馆。⑥ 5月，驻北京的十一国公使团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俄、英、法、美、意、日等六国的海军陆战队开进北京。对此，戊戌政变后由西太后和守旧派领导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因列强侵略而陷于危殆的自己的统治，公开承认义和团的斗争，发出了对列强宣战的布告。6月，救援北京的各国陆战队同中国的正规军和义和团作战，占领了大沽炮台，但不可能再向天津、北京进击了。需要派遣大量的强有力的陆军，这只有要求日本来搞。当时的山县内阁和军部估计到列国会要求救援，内心盘算答应这个要求是“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端”。⑦ 7月，等来了英国再三向日本要求出兵，日本便派出了二万二千名军队，占八国联军的三分之二。8月，联军进击北京，挽救了被包围的公使团。

10月，召开了关于战后处理的各国公使会议，第二年的9月，签订了最后议定书（辛丑条约）。据此，中国承认惩罚元凶，赔款四亿五千万两，撤销大沽炮台，允许各国在公使馆区以及北京、中国海海港间的交通要地有驻兵权。日本在这次媾和会议上首次以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员列席，和它们一起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在地理上便于同中国接近这一点上，日本的武力受到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高度评价。日本政府也极力兜售其充当“远东宪兵”的作用。⑧ 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怀有野心，想乘此机会策划冒险政策，一举挽回在瓜分中国竞争中的落后状态。

一旦看到响应义和团的运动达到江南，1900年8月，山本权兵卫海相便派出三只军舰到厦门，并命令它们在发生混乱情况时占据当地的炮台。参谋总长大山岩还把奉敕命令传达给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要他准备把台湾军派到厦门港去。于是乘厦门东本愿

寺传教所的烧毁事件（据说是传道僧奉儿玉密令放的火），以保护日侨为理由，陆战队上了陆，陆军部队也从台湾出发了。对此，英国、德国、美国的领事要求撤兵，中国也提出抗议，惊慌失措的海陆军便停止了派兵。[9] 日本在中国也和在朝鲜一样，没有单独实行侵略政策的力量。然而，如果和列强联合起来，则能挤进瓜分中国的行列，这就是日本统治者从义和团事件中得到的教训。

早在这一年的 3 月，山县首相的"北清事变善后对策"就主张有必要把华南的福建、浙江纳入日本势力范围和占领朝鲜，他说，"当现在各国猎取中国之际，首先追南方之一兔，获得之后，再追北方之一兔也未为晚。"[10] 现在在厦门事件中追南方之一兔失败了。那么在北方之一兔——朝鲜，能够实行强硬政策吗？同俄国进行的满韩交换的交涉，已经在西·罗森交涉中失败了。以同德国、英国等列强的协调来牵制俄国、确保朝鲜的方策显然也失败了。于是日本接受了美国要求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提案，1900 年 10 月，又参加了英国和德国缔结的同样内容的协定（所谓扬子江协定）。英国和日本都期望关于第三国在中国获得领土利益时，缔约国预先协商对抗办法的条款，能够在牵制俄国统治"满洲"的企图上发生作用。俄国利用义和团事件占领了"满洲"，事变后也没有撤兵。可是第二年 3 月，德国声明这个协定不适用于"满洲"，日本的设想便落空了。对日本来说，剩下的途径只有"满洲"问题即排除俄国对"满洲"的独占统治，和朝鲜问题即日本实现对朝鲜的独占统治，作为一体不可分的问题来加以解决。加藤高明外相把"其本身并不会和我利益有大的直接冲突"的俄国占领"满洲"，硬说是"对我帝国之自卫有产生危险之虑"的提案交付阁议，也是 3 月的事。这件事使通过外交交涉来解决越发困难了，这就意味甘冒"对俄国公然提出抗议，如达不到目的，就动干戈直接决定胜败"的危险。[11]

扩军财政的危机

在这种外交政策转变的背后，建立起由组成立宪政友会所代表的实行帝国主义的国内政治体制。尽管这样，由于内政困难，尤其因推行扩军造成的财政困难深刻化了。第四届伊藤内阁在1900年12月召开的第十五届议会上，又提出了酒税、砂糖税、海关税等一千八百二十万日元的增税案。这是为了弥补义和团事件出兵军费开支所挪用的由甲午战争赔款构成的基金的。这个法案得到政府友党政友会和宪政本党的支持，在众议院通过了，但是，贵族院预算委员会却否决了。为此伊藤决定议会停会十天，随后又停了五天。因为贵族院的关系而停会这是第一次。束手无策的伊藤请求山县和松方两元老出面调停，没有成功，结果由天皇对贵族院发出军费的支出和财政的巩固乃国家之急务的诏书，才使增税得以实现。贵族院内有反对政党内阁的保守气氛。在中心会派的研究会里，山县势力很强，对伊藤持批判态度。但不仅如此，正象在政友会领袖星亨的渎职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同金权的赤裸裸的勾结形成了攻击政友会的舆论。正象在以此为背景的谷干城、曾我祐准等增税特别委员会所指出的"众议院的决议不是代表真正国民意志"的那样，站在批判政党和众议院的"利党"立场，而标榜"国家立场"的贵族院，正是由于这种立场，才不能不拾起政党所抛弃的"休养民力"的旗帜。[12]如下节所述，这是因为在扩军财政下国民生活困窘深刻化了的缘故。

尽管接连不断的增税，财政危机却越来越深刻化。于是1901年4月渡边国武藏相，作为下年度预算编制方针，向阁议提出不举办任何新事业，也不募集公债，而把既定的继续事业推迟到1904年的紧缩方案。按照桂太郎的说法，"这是向天下公布国家财政几乎破产"。[13]这就违反了所标榜的膨胀政策，其他政友会出身的阁僚表示反对。5月，伊藤内阁以阁内意见不统一决定总辞职。而由

山县系官僚组织的后任的桂太郎内阁也未能解决财政困难。尤其受到冲击的是，在美国征募五千八百万日元的募债计划，由于国际信用低落和国内政局不稳而告失败。⑭在义和团事件媾和会议上，日本虽然在帝国主义阵营占据一席，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却没有摆脱孤立的地位。为此，1902年的财政计划是停止募集公债，事业延期，节减经费，并想以义和团事件的赔款，用来抵偿该事件的军事费，这是无理的，政友会表示反对。

这样的财政危机的根源，当然在于扩军费的过大开支。陆海军省费在岁出总额中所占的比率，1897年为百分之四十九，1898年为百分之五十一，1899年为百分之四十五，1900年为百分之四十五。而且在这次财政危机的根基里，整个经济的矛盾在增大。在从1897年后半到下一年前半的第一次战后经济危机之后，又有从1899年末起的生丝出口不旺，和因义和团事变棉纱对中国出口大减以及金融紧迫，从1900年末起到下一年半发生银行危机，停止付款的银行已有三十四家。内债募集困难也是这个缘故。加之，一直是以发展出口获得外汇，来进口武器和机器，以此来谋求扩军和培植军事工业的，但是出口的中心——生丝和棉纱的出口，是最容易受国际影响的，是不稳定的。这时的出口不旺，成了战争准备上分秒必争的进口船舰和钢铁的障碍。

出兵一个师团的义和团事件的军费善后，已经苦得够受了。何况对俄国进行作战，在元老、政府和财界首脑都是没有自信的。尽管外交正在步步滑近战争。

① 《明治天皇纪》第9、374页。此外，1898年2月，西外相致加藤高明驻英公使书中叹息说："退而考察国内情况，政治上、经济上都不如意，眼下情况，实际上几乎完全没有把力量用于海外的余裕。"（《加藤高明》上卷332页）。

② 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明治百年史丛书》版）91页。

③ 参照《小村外交史》100页，《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16卷，《日本外交文书》第

29、30 卷。此外，陆羯南说，不顾国力的扩军，使国民的资财为非生产的扩张所荡尽，资财实力贫弱，就不可能用到对外利益线上去，并指出甲午战争胜利所获得的在中国的专管租界地，很少有人居住，荒草弥漫的现状就是其明证（《外政和国力》1899 年 9 月，《陆羯南全集》第 6 卷 349 页）。至于他所说的“今天我日本的情况是，一方面想靠扩充军备把势力圈向外扩张，而另方面则如同以引进外资、而想把自己放进他国势力圈里，这岂不是一大奇观吗！（《一种势力圈》1899 年 10 月，同上书第 6 卷 355 页）这话是尖锐地预言不能引进外资就不能输出资本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

④ 在这之前，1896年 7 月，台湾总督桂太郎在意见书中主张，乘列强瓜分中国的机会，占领福建一带地区（德富猪一郎著《公爵桂太郎传》乾卷 708 页）。

⑤ 独立协会的运动，是 1898 年末，守旧派接受日俄两国公使的建议实行镇压而挫折了。这件事成了使后来日本的侵略容易实现的条件。参照姜在彦著《近代朝鲜的变革思想》。

⑥ 关于义和团起义，见里井彦七郎著《近代中国的民众运动及其思想》，中村义·仓桥正直《帝国主义世界的成立和东亚》（《讲座日本史》6 所收），此外，关于此次事变中的日本行动，参看井上清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铃木良《日清、日俄战争》（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近代 9 》所收）。

⑦ 《桂太郎自传》卷 3（《明治史料》7，32 页）。

⑧ 列宁对于日本和俄国帝国主义的特点作了如下的论述。“日俄两国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中译本，第 23 卷，第 114 页。）此外《桂太郎自传》关于对请求派出援兵是否应许说：“列国以陆军镇压中国北部之扰乱，不借用我兵力则作不到。我国此时在外交政略上应尽可能不点头，让他来乞求援助，才是点头之时”（前引杂志 7，33 页）。

⑨ 关于厦门事件，参见井上前引书 80 页，伊藤三郎《关于明治 33 年厦门事件的考察》（《山形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 5 卷 2 号）。

⑩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262 页。

⑪ 1901 年3月12日，加藤高明外相致伊藤首相书（《日本外交文书》第 34 卷 174 号），《加藤高明》上卷 438 页）。关于对朝鲜问题的看法的变化，信夫清三郎、中三志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指出，“1900 年 10月以前，日本外交当局主张朝鲜问题和‘满洲’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是有意识地把两个问题分开，以求解决这个问题，而与此相反，到了 1901 年的 3 月，则有意识地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以便强调‘满洲’问题对于日本的严重性”（105 页）。

⑫ 《大日本宪政史》第 5 卷 152 页。星亨在众议院演说赞成扩充兵工厂费，他说，“军械的独立如果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心悦诚服地加以赞成，不论金钱多寡”。对此，在贵族院，站在和谷、曾我同样立场的正亲町实正反对增税案说：“不管民力民度发展如何，只有国库的岁入走在前面，这是无法取得平衡的（中略）。民力的休养也就是所谓财源的培养也是必要的吧。因此，只说因为当前有必要，就这样增税，不是有点过于轻

率吗?”(《帝国议会志》第5卷997、873页)。

⑬ 《桂太郎自传》卷3(前引杂志7第45页)。

⑭ 同上书卷5中说:“关于财政的补填,从伊藤侯爵时代就有在美国发行外债的计划,因此首先在这方面继续实行发行外债计划,但是,当内阁信用薄弱和帝国战后财政尚未充分整理之际,尤其象明治三十一年这一年中内阁更迭四次那样,外国债权者不肯信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有几度好转,但始终没有结果。直到11月,从美国收到发行外债不可能的报告,这时进又进不得,退又很困难,所谓进退维谷,实此之谓也”(前引杂志,11,22页)。

第三节　民众和知识界的动向

佃农和工人

战争准备体制——同时作为这种体制而确立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的矛盾开始明显化的1900(明治33)年前后的时期,也是工人和佃农的新阶级登上舞台,构成推动历史动力的出发点。

在农村,农家的各种赋税和各种负担的增加,如果以1890(明治23)年为一百,1899年为一百六十,1908年达到二百七十一之多。尤其骤增的间接消费税的负担,也落到没有耕地的农民身上。农民经济贫困的深刻化是这时期的特色。结果造成中坚阶层的自耕农和自耕兼佃耕农的没落和佃耕农的激增。① 于是与村落共同体的规约相结合,在父权制家长的情谊关系掩盖下的以前的地主与佃农关系的对立性质必然表面化了。明治维新时期高涨起来的,以1884年秩父事件为最后而退缩的农民斗争,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又开始抬头了,其特点是租佃纠纷的增加。从1897年到1911年的九百六十二件农民斗争中,二百四十四件是对地主的斗争,三百三十八件是对官方赋课和村政的斗争。②

小农民的穷困化使城市的贫民问题增加了。由农村流入城市的贫民的增加,从九十年代以来就为有识之士所注目。③ 大城市中急遽扩大的“贫民窟”内,人力车夫、工匠、工人、力工、卖零工的、拾

破烂的、街头卖艺的等各种各样挣得当天生活之资的人们，住在大杂院的一间房里，每天只用十日分钱的收入来糊口。而佃农的增加和穷困，产生了为弥补生活使其子女出去赚钱的劳动者。1897年前后，大约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是在棉纺、生丝、织物等出口工业中劳动的女工。她们是从农村以封建式的定期佣工合同招募来的，整天被拘禁在宿舍里，包括强制的深夜劳动在内，每天做长达十一至十八小时的残酷劳动，一人的每天工钱只有14日分(1897年)。④ 日本纺织业在中国市场同印度棉纱、中国棉纱竞争的武器，是拥有从欧美引进的最新技术的机械和低工资，以及时间漫长的劳动力。以农村贫农的日工工资成为基准，规定了城市女工的劳动条件，而它又制约了男工的劳动条件。⑤

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工人从1888(明治21)年的十三万六千人增到1899年的一百四十二万六千人，增加到十点五倍，1909(明治42)年达到二百四十四万人。甲午战争后的物价高涨，引起了工人自发的罢工。就连农商务省的调查，1897年(仅七月以后)的罢工达七十九件，参加人员为三千五百一十人，第二年为四十一件，六千二百九十三人。⑥ 1896年的三重纺织、1898年的富冈缫丝和白河缫丝的女工也掀起了罢工，但大多数斗争是发自男工要求增加工资。占工人过半数的女工没有举行罢工的条件，而且被置于工人运动对象之外。

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

作为佃耕运动的组织，有了1899年的大井宪太郎的租佃条例期成同盟会和1902年宫崎民藏的土地复权同志会等。两者都站在自由民权派的立场，针对佃农与地主对立的扩大情况，标榜保护佃耕和自耕的。⑦ 工人运动的先驱有1897年城常太郎、泽田半之助等组成的职工义友会，在这种活动中，这一年又成立了以片山

潜和高野房太郎为干部的工会期成会。他们都在美国参加过工人运动，而且在那里受过社会主义思想洗礼的。但职工义友会是为修改条约所规定的二年后开放内地作准备的，正象在号召为对抗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的剥削，而提高工人觉悟和成立“同业工会”(按职业划分的工会)那样，⑧是以这些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和劳资调和以及尊重独立经营者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是和上述的大井、宫崎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工会期成会取得迅速发展，工人会员在成立的第二年末为三千人，再下一年末为五千七百人。以此为母体，铁工工会(1897年)、日本铁路矫正会(1898年)、活版工工会(1899年)等代表性的工会诞生了。而且各工会都在迅速扩大。由机械工组织的铁工工会在1900年有四十二个支部，入会者达五千四百人。日本铁路公司的司机和乘务员组织的日铁矫正会，是以司机和司炉等四百人的罢工胜利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因此是以战斗的团结和坚实的工会财政而自负的。活版工工会是以斗争的失败和排除经营者的妨碍而得以结成的，拥有二千多会员。这些工会会员是陆海军直辖工厂或为数不多的民营大工厂的骨干职工，是有军事作用的运输部门的中心工人，是具有近代产业技术的熟练工人，在这些点上，他们的工会运动受到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积极的注目。⑨这和当时的政府正在企图制定以劳资调和为目的的工场法案有关，但也反映甲午战争后官僚和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心的急遽高涨。

关于这时期报纸杂志报导的动向，石川旭山(三四郎)在《日本社会主义史》(1907年)中写道：“劳动问题逐渐形成舆论，在著述中、报纸杂志中论述这样问题的颇多起来。例如象《六合杂志》、《国民之友》这些从前就提倡社会问题的，也有象《劳动世界》、《社会杂志》、《社会》这样新成立的以提倡社会问题为目的的。再如《国民新闻》、《万朝报》的态度几乎完全和社会主义机关相似”。⑩所谓

“社会问题”是和以前知识界所关心的国家秩序不同范畴的社会变动中产生的问题。战争准备体制的磨擦使它更加激化了。知识分子中也有的人从国家的见地，即从富国强兵的基础的重建和寻求国民团结新方针政策的立场出发，来研究社会问题。上述提倡保护小农论的谷干城、三蒲梧楼等贵族院议员也是这样一个集团。又如以帝国大学教授为中心1896年创立的社会政策学会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国家主义为基调来研究自上而下实现劳资调和和社会改良（近代化）。⑪而另一方面，站在批判政府立场的知识分子，作为不同于国家的另外领域，关心社会基层，从行动上表示向这方面靠近。这和专注视天下国家问题的八十年代向上型思考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很多人对于一直被无条件地肯定、并视为国民努力目标的文明开化，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认为是文明战胜野蛮的甲午战争的现实结果，使他们打开了批判的眼界。田冈岭云说，“十九世纪的所谓文明开化，是对富者优厚的文明，在自由的名义下打破了贵贱的阶级区别，但贫富的差别却因而更甚了。随着物质文明进步而出现的精巧机器，夺去了工人的职业，随着文化发达而来的奢侈之风，使得穷人更陷于涂炭之苦”。⑫对文明即资本主义公然进行彻底批判的，是和因足尾铜矿矿毒而使生活陷于毁灭的农民同甘苦、共同进行奋斗的田中正造。1900年2月，渡良濑川沿岸的几千受铜矿毒害的农民，为了要求救济而要进京请愿，遭到宪兵和警察队的镇压，一百多人被捕，六十八人以啸集凶徒等罪名被起诉。田中在众议院抗议这次镇压提出质问书，他弹劾说：“我们日本到了亡国地步。说有政府吧！不对；说有国家吧！不对。”⑬曾经为自由民权运动而斗争的田中，现在对于议会和政党都失望了，以至于说出了否定当今还有国家和政府的言辞。从他辞去议员职务的1901年起到第二年所进行的精力充沛的活动，全倾注在既非官员又非议员而是“一切社会成员”即民间的知识分子、宗教家、学

生、妇女组成支援受害者的组织上，他的呼吁得到多方面的响应。这件事说明很多知识分子超越了思想、政治的不同立场和职业的差别，从人道主义的见地出发，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联合起来了。

社会主义的诞生

从对社会问题关心的普及和深入中，产生了社会主义运动。1897 年 4 月，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问题研究会开始活动，这里边有自由民权家、社会主义者、基督教徒、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甚至包括国粹主义者，是所谓吴越同舟的。经过一年多，这个会就自消自灭了，1898 年 10 月，对社会主义有理解的人，组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一年三个月后，单由主张社会主义的人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在第二年即 1901 年 5 月，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等六人创办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⑭ 由于从人道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早的飞跃，同时，它的净化就是分裂，这样的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不仅没有以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而且也没有和开始对社会主义有理解的多数知识分子结合起来。这种情况是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思想运动的性质造成的，因为它是尽管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而竟不和工人结合，仅在思想上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

工会运动在创办之初取得显著发展，但只有几年就解体了。其直接原因是以 1900 年制定的治安警察法为后盾的官方的压迫，而工会的性质也包藏着衰退的主要原因。工会是以熟练工的师傅率领做零活的手艺人和徒工、见习工等一揽子参加方式为中心，所以师傅的领导力量一旦随着新技术、机器的引进和师徒关系的解体而丧失，或者师傅对政权或雇主的抵抗意识一旦减弱时，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脱离组织。他们那种旧手艺人的“豪爽”气质同效法美国

劳联的组织方针的领导者知识分子意识之间的差距，以及按照师傅们的要求把重点专门放在工会会员的共济活动上的弱点，使他们丧失了抵抗政府镇压的力量。⑮

在工会运动衰退之后，社会主义运动有代之而起的样子。现实运动的停顿，反而带来了政治上的急进。而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没有能力把批判统治体制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日俄开战前一年的1903年，片山潜的《我社会主义》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问世，作为社会主义真正的入门书、启蒙书，发挥了影响。这些都是阐述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的，但是正象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是人类的理想，曾经是十九世纪理想的自由民权也确实是社会主义理想之一"（《我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同时，另方面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社会主义神髓》）那样⑯，具有批判官僚专制主义和批判军国主义的思想特点，使世人感到魅力。这种主张和宗教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有可共鸣之处。正因为如此，很多社会主义者才同这些人一起积极参加了救济足尾矿毒受害者的运动。

帝国主义思想的流行

关心民众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动向，也没有形成把民众的不满和要求集中起来的力量。城市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距离，在一方面增大了，没有象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结合起来搞自由民权运动那样。

民众的意识也好，知识分子的意识也好，都是复杂的，分歧的，活泼的，流动的，这和甲午战争前的情况不同。民众的生活也有了同外国接触的经验，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海外移民进入了最盛期。1908年在美国的日侨达到十万人，大部分是在农场、果园、铁路、矿山劳动的出外作工的移民，到夏威夷去的移民，仅1894

到1898年之间就达到四万一千人。他们是被国内的贫困生活逼得走投无路，也没有国家的保护，由私营的移民公司送去的“弃民”。但另一方面，渴望雄飞海外新天地的所谓“走吧！我们的家是五大洲”这种气氛在民间有所发生，也是事实。⑰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留学生、变法派和革命派亡命日本的人数骤增，日俄战争当时竟达一万人。东京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容易学习欧洲文化的地点，而反对俄国侵略“满洲”，使他们怀有亲日的心情。此外，尽管日本方面设有种种限制，但还是有自由的空气，虽然民众中产生了蔑视中国人的思想，但还没有日俄战后那么强烈，这个地方大有亚洲民族运动据点之感。⑱

但在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民众思想的是统一化的国家主义教育的普及。既强调以前的忠孝道德，同时又加上了适应资本主义和对外扩张的因而“近代化”的教育内容，加强了国家主义的基调，这就是这一时期义务教育的内容。小学校的实际就学率，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达百分之五十二，从1899年起急遽上升，1905年达到百分之八十六点九。资本主义的建立提高了国民的教育要求。由于强调小学教育对甲午战争胜利的贡献，在1900年制定了为补助教师部分薪俸的市町村立小学校教育费国库补助法，确立了义务教育费由国库负担的制度，又在同年修改小学校令，严格规定了就学规定，并确定了免交学费的原则，国民皆学的学制目标这才得到实现。可是这件事同时又意味国家对教育统制的加强。政府以围绕自由选用教科书而发生的贪污事件为良好机会，在1903年修改了小学校令，实行了国定教科书制度。这是排除在野的强烈反对国定教科书论和废除文部省论而强制实行的。

欧洲文学的认真吸取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花朵灿烂开放，也是在这个时期。这是唯我独尊和自我解放的主张，具有“成为自由的野民，吾尚有何踌躇！”（国木田独步）的向往自由，和浪漫的外国情

调(森鸥外《即兴诗人》)的东西。可是，这样的意识并不一定发展成为反国家主义。从浪漫主义走向日本主义，再走向个人主义(本能主义)剧烈转变的高山樗牛的思想，象征着知识分子志向的多样性和活动范围。帝国主义这个新思想的"流行"也不是和浪漫主义趋势没有关系的。德富苏峰规定帝国主义不是反对"文明公义"的排他主义和独占主义，帝国主义不是武力独尊主义，而是非垄断的和平的扩张主义，并且宣言自己就是帝国主义者。因此，他把从和平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进化"的理由，归之于由于甲午战争，日本地位发生了变化，以及世界大势正在走向帝国主义。⑲在言论界展开进步论战的浮田和民，提倡在内则批判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主张自由主义的道德，强调普及立宪思想，而对外则采取"伦理的帝国主义"。所以叫作"伦理的"是说不是以独占中国为目标的侵略，而是一面同欧美竞争、一面与之协调来瓜分，也就是合乎国际法的帝国主义。⑳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是把旧天皇制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披上近代资本主义外衣后使之再生，通过极力主张同世界大势、欧洲诸国进行协调，来发挥把不能独力进行侵略的、幸德秋水所说的"军人的帝国主义"、"虚张声势的吹糖人的帝国主义"㉑的弱点和矛盾的认识，转移到国外的作用。对于生活困难的国民给予雄飞海外的幻想。

① 参照《日本农业发达史》第3、第4卷。关于当时的佃农经营，横山源之助著《日本的下层社会》(岩波文库)说，佃农的耕作几乎没有纯益，而他们所以仍然耕作，只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所得没有仔细计算，以及在田地上投下的劳动力完全置于计算之外，仅仅把肥料、种子费用的一部分和地租米作为开支来计算，其余的都算作利益而放心了的缘故"(251页)。此外，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社会主义者赤羽一(岩穴)著《农民的福音》(《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5卷所收)。又关于贫农的具体生活，参见长塚节的小说《土》(1912年)。

② 大桥隆宪编著《日本的阶级构成》(岩波新书)43页。

③ 例如在报纸上连载并引起好评的《东京府下贫民的实况》(1886年)，《大阪名护町贫民社会的实况纪略》(1888年)，《贫苦天地饥寒窟探检记》(1890年)，《最黑暗的

东京)(1893年)(均收于西田长寿编《都市下层社会》)。参见前引《日本的下层社会》。此外参照隅谷三喜男著《日本工资劳动史论》。

④ 关于当时的劳动条件，可参照农商务省商工局《职工情况》(五册，1903年)，隅谷前引书，隅谷三喜男、小林谦一、兵藤钊著《日本资本主义和劳动问题》。

⑤ 原农商务省农务局长、大日本制糖公司社长酒匂常明在社会政策学会的演说，指出"今天日本工商业之所以发达……在于生产费低廉"，其低廉的理由，第一是农家老幼妇女所经营的家庭工业制品(纺织品)价格低廉，第二是从农村来的廉价劳动力。并且说"可知在我国发展中的工商业关系上，农业实在是非常必要的原动力"(社会政策学会编《关税问题和社会政策》，《日本农业发达史》第4卷83页所引用)。

⑥ 青木虹二著《日本工人运动史年表》第1卷840页。

⑦ 大井宪太郎的租佃条例期成同盟会是在东洋自由党之下，和日本劳动协会一起建立的租佃条例调查会的后身，是为了调整地主和佃农关系以实现租佃条例为目的的，大井的抱负在《土地国有论》(1909年)中有说明，其主要内容为：担心农民丧失土地，会破坏家族制度和失掉质朴诚直、义勇奉公的道德，为了维持农本主义和尚武的立国，主张恢复我国古时的土地国有制(平野义太郎著《马城·大井宪太郎传》326页)。宫崎民藏的土地复权同志会针对兼并土地的弊端，主张"恢复人类对土地的正当权利，以使得以保全个人独立自营的良民的本性"(《土地复权同志会意见书》，《熊本评论》《明治社会主义史料集别册》55页)。宫崎民藏是初期民权家宫崎八郎的兄弟。"中国浪人"宫崎寅藏(滔天)的哥哥，在欧美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但其思想本质是自由民权的国权论。

⑧ 职工义友会散发的传单《告诸位职工》。在文章的开头警告说，"即将到来的明治三十二年，实为开放日本内地的时期，也是外国资本家企图利用我低廉的工资和灵巧的劳动力，为攫取巨额利润，而来到我内地之时。"并说"因此，吾辈毫不踌躇地忠告各位，要坚决拒绝革命的意志，严格排斥急进的行动(中略)，而吾辈所劝告诸位的，是兴办以同业相聚同气相投的、以人类至上之情为基础的同业工会，全国联合起来，共同一致行事"(片山潜著)《日本的工人运动》(岩波文库)18、21页。

⑨ 铁工工会成立会时，有来宾农商务省工务局长，同文书课长、邮政省技师、炮兵工厂技师等列席，活版工会成立会时，有松村介石(基督教徒)、石黑忠悳(原陆军军医总监、男爵)、桑田熊藏(帝国大学教授)、加藤弘之(帝国大学总长)等演讲，岛田三郎(进步党议员)就任工会会长(前引《日本的劳动运动》76、107页)。此外，关于当时政府的劳动政策的本质，风早八十二确定为：国防、内治的见地和产业的见地的互相融合互相补充(《日本社会政策史》122页)。

⑩ 《资料日本社会运动思想史·明治社会主义史论》56页。

⑪ 关于社会政策学会，参照住谷悦治著《日本经济学史之一幕》，河合荣治郎著《明治思想的一个断面》，住谷悦治等共著《明治社会思想的形成》(《讲座日本社会思想史》1)。

⑫ 《下流的细民和文士》(《田冈岭云全集》第1卷403页)。关于岭云的民主主义思想，可参照家永三郎著《不幸的思想家的一生》(岩波新书)，《明治叛臣传》《田冈

岭云选集》(均为青木文库)中西田胜的解说。

⑬ 木下尚江编《田中正造的一生》248页。1900年7月，谷干城、岛田三郎、岩本善治、安部矶雄、小崎弘道、三宅雪岭等组成矿毒调查有志会。第二年11月，以矢岛楫子、潮田千势子等妇人矫风会为中心，组成矿毒地救济妇女会。12月，有专门学校到中学的东京一千名学生进行被害救济视查。1902年1月，以大内青峦、岛地默雷等佛教徒为中心的演说会等，举行了各种演讲会。帝大、学习院、庆应义塾、早稻田专门学校的学生举办的学生矿毒救济会到处进行了街头演说、募集捐款，但文部大臣以有政治运动之嫌为理由，禁止了他们的活动和第二次学生视察。关于田中正造的思想参照岛田宗三著《田中正造翁余录》。

⑭ 社会民主党的《基础纲领的理想》和《实际运动》的纲领，在安部矶雄《明治三十四年的社会民主党》(改造社《社会科学·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所收)中有所介绍，此外，前引《日本的劳动运动》(岩波文库)的注中也有记载。两天后被命令解散，其理由是它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删去纲领中的缩小军备(行动纲领)乃至全部废除(最高纲领)、关于重大问题的一般人民直接投票制(公民投票)和废除贵族院等三项目的要求。政府方面所以把这种民主化要求视为最危险的，是因为这说明了天皇制政权的本质，同时也是因为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民主主义彻底的主张有得到广泛支持的可能性的缘故。

⑮ 关于明治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参照大河内一男著《黎明期的日本工人运动》(岩波新书)，隅谷三喜男《社会运动的发生和社会思想》(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现代1》)，大原慧《工人运动和初期社会主义》(《讲座日本史》6)，松泽弘阳著《日本社会主义思想》。

⑯ 《我社会主义》(《资料日本社会运动思想史·片山潜·添田铁二集》126页)。《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全集》第4卷509页)。

⑰ 参照《日美文化交涉史·移住篇》。三年的劳动合同到期时，攒下钱归国这种临时出去赚钱的意识很浓厚，但事实上也不仅是这种思想。1885年到美国去的长野县人田中孝平申请加入美国籍，珍田桑港领事回答说“日本人断绝对天皇陛下的君臣之义，归化外国，是我法律上所绝对不能认可的”(同上书65页)。从反面看，有想摆脱“君臣之义”的民心。限板内阁当时，同谢花升一起搞冲绳自由民权运动斗争的当山久三指导夏威夷移民，片山潜在美国搞过移民事业的情况，也值得研究。

⑱ 参照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变法派有梁启超，革命派有孙文、章炳麟、陈天华、邹容、黄兴等逃亡日本或来日留学。变法派的机关报《清议报》在横滨出版，革命派的《民报》在东京出版。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记录很多，参看其中有名的一例、1902—1909年在日本的鲁迅的《藤野先生》《呐喊自序》(《鲁迅选集》第2,第1卷所收)。另参照小岛晋治等共著《中国人的日本人观一百年史》。

⑲ 《帝国主义的真意》、《致山路爱山书》(《苏峰文选》480、514页)。

⑳ 鹿野政直《国家主义的抬头》(《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1所收)，荣泽幸二《帝国主义成立期浮田和民思想的特质》(《历史学研究》332号)。

㉑ 《排帝国主义论》(《幸德秋水全集》第2卷466页)。

第五章　日俄战争的意义

第一节　向开战突进

日英同盟的缔结

到了1901(明治34)年，政府在国际上的孤立感日益加深，因而痛感无论外交上或财政上，如果不和欧美列强的任何一国联合，就毫无办法。① 换言之，在帝国主义的对立中不去火中取栗，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就任桂内阁外相的小村寿太郎，为了在朝鲜和满洲对抗俄国的势力，主张同在世界各地同它对抗的英国结成同盟，他列举在中国扩张利权取得通商的利益，以及在财政、经济上的援助等等，断定比同俄国缔结协定有利。② 支持日英同盟论的有元老山县有朋、桂首相、加藤高明前外相。与此相反，元老伊藤博文、井上馨始终主张在同俄国的交涉上谋求达到妥协的日俄协商方案。他们认为具有日本无法比拟的国际地位的英国，不会如此简单地同意同盟的提议，而且耽心同英国合作反而会使俄国的态度强硬起来。这一年的9月，伊藤去美国游览，归途绕道俄国，以个人的资格进行交涉。这件事的报道使英国对日英同盟采取了积极态度。一向以“光荣的孤立”自豪的英国，为了镇压南非的布尔人的抵抗而发动的布尔战争，牵制了陆军的兵力。因此，在对抗俄国保持亚洲的利权时，需要一个有陆军力量的同盟国。于是在伊藤的对俄交涉迟迟不进时，日英谈判以出乎日本预料之外的速度取得进展。1902年1月在伦敦缔结了日英同盟。其内容是，以互相维护日本在中国和朝鲜所拥有的特殊利益，和英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为目的；缔约国之一方与其他国战争时，同盟国保持中立；同两国以上

交战时，同盟国则参加战争。[3]

缔结日英同盟受到朝野的欢迎，对于小村外相的报告，议会上发出罕有的鼓掌，报纸几乎全都表示了好意和期待的评论。[4]政府首脑和财界承认日英同盟孕育着对俄战争的危险，但另方面也有抑制俄国侵略的效果，因而希望是否会因此避免了战争。的确，在处理朝鲜问题时，能够阻止象当年三国干涉那样第三国介入的事态，在这一点上对于对俄交涉是有利的。好象为了回答日本方面的期待似的，俄国在4月同中国缔结了以一年半为期从“满洲”撤兵的协定。主张对俄强硬论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等的国民同盟会，以此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宣布解散了。于是俄国按照这项规定，到10月完成了第一期撤兵。

虽然外交上得到这样的小康状态，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政府和政党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改善的希望。政府想对下个年度满期的增收地税，实行无期延期，以便用来充当为期十一年的第三期海军扩充计划的九千九百万日元的财源。政友会和宪政本党虽然赞成扩充海军，但以首先应整理行政来筹措财源为理由，反对增收地税的延长。12月，众议院的委员会否决了这个法案，因此第十七届议会被解散了。扩充海军是在日英同盟条约的秘密换文中对英国许下的诺言。[5]在1903年3月第八次大选中，政友会仍然占了过半数。在5月召开的第十八届议会中，政友会总裁伊藤打算同桂首相妥协，但是党内产生了埋怨总裁专断的意见，退党者不断出现，因而陷于混乱。如果要保持党内的团结，只有对政府采取强硬方针。政友会支持宪政本党提出的围绕教科书和交易所的赠贿受贿事件谴责有关阁僚的决议案，并使之通过，打击了政府。7月伊藤得到敕书，辞去总裁，躲起来当上枢密院议长，于是藩阀势力和政党的关系更加恶化。打开政治局面的办法，和甲午战争的前例一样，只有求之于对外紧张了。

对俄交涉的紧迫

俄国没有履行以这一年4月为期的第二次撤兵。日本方面的行动对此也有影响。从上一年10月开始的同中国的修改通商航海条约的交涉中，要求外洋航行船舶的内河航行权和增设开市开港场所，而这也包括"满洲"。美国也向中国提出在"满洲"开市开港的要求。因此，从俄国方面来看，对撤兵之后日本和英美将进入"满洲"感到危险。而俄国政府内部在对日政策上意见分歧，这也使解决"满洲"问题有了困难。财政大臣维特、陆军大臣克鲁鲍特金唯恐结果会削弱其在西欧和近东的势力，主张避免对日战争。可是俄皇侧近的国务顾问官，用皇帝的资金经营木材公司的别佐布拉佐夫，盯上鸭绿江的森林权益，想在军队的支持下拿到手里。这个策划极其刺激了日本军部。

从4月到5月，俄国在"满洲"增强了兵力，占领鸭绿江的朝鲜一方的河口龙岩浦，正在修建军事工事的情报，主要是通过陆军情报机关接到的。军部的形势判断，主要是以这样的情报为基础的。⑥5月，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井口省吾，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等陆军、海军、外务的中坚官员在新桥的湖月饭馆聚会，作出宁可发动战争也应阻止俄国统治"满洲"的决议，成了政府内部主战论的推动力量。当时正是上述第十八届议会的政局混乱之际。于是6月，根据参谋本部部长会议的决定，大山岩参谋总长向内阁提出"它的兵力未集中的现在，是解决朝鲜问题的良机"的意见书。⑦

6月23日，召开御前会议，元老之外有首相、陆相、海相、外相等参加，决定开始对俄交涉。其内容是，对于在朝鲜的日本优越权，和俄国在"满洲"的正当利益的相互承认，即所谓满韩交换论。在这个范围内，帝国主义的交易是有可能性的。然而，使交涉陷于僵局的原因，在日本和俄国双方都有。虽说是满韩交换论，而日本

的目的是主张日本在朝鲜的独占的优越权，同时又想限制俄国的"满洲"利权。在内阁会议上也说："如果以上述主张同俄国达成协议，帝国的权利和利益固可得到保障，但使俄国答应这件事却是极困难的"。⑧ 而且在御前会议的第二天，丧失了渡过议会信心的桂太郎表明辞意。7月1日，内阁向天皇提出了总辞职，但被挽留下来。于是对内阁作了局部改组之后，继续维持政局。因此，用来延续内阁寿命的，只有对俄国坚持强硬方针。如后所述，其背后有使政府感到为难的主战论的舆论高涨。另方面，俄国也因为军事费、铁路建设费的膨胀所造成的财政危机，和对人民群众掠夺的加紧，酿成了革命的危机。为了向外转移这个国内矛盾，对沙皇专制来说，对外战争是必要的。8月，一手控制远东的军事、行政、外交的远东总督府，直属于沙皇，设在旅顺，为别佐布拉佐夫的主战派所控制。于是在9月到10月，"满洲"的兵力陆续增强了。

10月，小村外相和驻日俄国公使罗森之间开始了会谈。日本主张对朝鲜的建议和"援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对此，俄国则主张仅限于改革民政上的援助，而且提出应以北纬三十九度以北的朝鲜领土为中立地带，另外要承认"满洲"是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的强硬主张。在后来的会谈中，日本方面提出在朝鲜国境的两侧设中立地带，在承认"满洲"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的同时，俄国也承认朝鲜为俄国势力范围之外的修改案。这又有了妥协的可能，甚至报纸也报导了达成协议的消息。可是俄国方面在这以后约四十天的12月11日才送来了再修改案，罗森公使关于谈判事项，除向本国外相请示外，还必须接受远东总督亚列克谢也夫大将的指挥。此外，皇帝出外旅行，还要送到行宫请求裁决，为此交涉的进展极其缓慢，在这期间，日本外交以外的形势有很大变化，妥协也就困难了。

开战论和反战论

乘俄国不履行第二期撤兵的机会，旧国民同盟会的近卫笃麿、神鞭知常、佐佐友房、头山满等召开对外强硬同志大会，煽动声势，随后改名为对俄同志会，掀起了唤起主战舆论的运动。此外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富井政章、户水宽人、金井延等七博士向桂首相提出反对满韩交换论，和不能使"满洲"归于俄国手中的强硬意见。帝国大学教授的权威，大大刺激了舆论。⑨ 这些运动严厉攻击政府软弱无能，据说暗中和外务省取得了联系。⑩ 于是从夏到秋，各报纸也一齐表明了支持开战的论调。在这个背景下，12 月召开了第十九届议会，政友会和宪政本党的领袖之间建立了以打倒"藩阀和非政党" 为目的的秘密合作。当时就任众议院议长的宪政本党的河野广中，在议会开幕的对天皇"奉答文" 中，未经各派协议，就独断地采取异例措施，表示"内政以弥缝为能事，外交则丧失机宜"的弹劾内阁之意。因此政府解散了众议院。河野这样作是要事先抓住两党干部企图以对外强硬论来追究政府的策谋，以便抢先立功。

最露骨的开战论者，被认为是最反政府的，当时是有这样潮流的。主战论是由政府、军部、新闻界煽动和制造的舆论，⑪ 但不仅如此，二叶亭四迷说，感到"有使空气一新的必要"，平民在战争中梦想自己当上日本主人公的机会。⑫ 田冈岭云则主张，正象为了打破贵族和平民间的不平等而发生了法国革命那样，弱国日本为了同欧美列强保持对等的势力，作为非常手段，有开战的必要。⑬ 还有在孤注一掷的开战上来寻求解决对政治、社会的不满的舆论动向。⑭ 政府为了压制政党和舆论转向反政府方面，也只有走向开战了。

一向登载非战论社论的《万朝报》社长黑岩泪香，10 月转向了主战论。因此，主张和平的理想团的中心人物幸德秋水、堺利彦、内村鉴三退出了《万朝报》。幸德和堺建立平民社，发行以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为旗帜的《平民新闻》周刊，并和社会主义

协会合作，在“好战的热情使朝野发狂了”的时候，勇敢地继续高喊绝对反对战争。[15]在基督教徒中也有《六合杂志》保持反对战争的立场，内村也在《圣经的研究》等上面，继续宣讲和平的福音，平民社的活动本来也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运动，没有组织群众的意图和力量，基督徒的言论也不出向教友宣讲的范围。[16]在其背后虽然没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但在“奇特的人物”和知识分子中，批判战争和怀疑战争的，到1904年还有相当惹人注目的言论。[17]“一部分有教养的明治青年，忘了他们祖先的遗教爱国主义，在战争方酣之际还比较冷淡，实足以令有识之士寒心”。[18]对于连军部都没有胜利信心的开战论[19]，政治家和资本家中有不少危惧的呼声，也是当然的[20]。正因为这样，有必要启开战端，造成既成事实。小村外相曾说过：“因为日本人只要枪声一响，就一定会跟上来的”。[21]

12月11日（第十九届议会解散之日），收到了俄国的再修改方案。它坚持拒绝把朝鲜领土用于战略，拒绝日本方面关于设置中立地带的修改案。参谋本部认为如果误了时机，军事上会招致不利，迫令政府早日下定开战的决心。政府是一方面继续交涉，另方面着手开战的准备，同月28日，修改战时大本营条例，制定军事参议院条例，发布为补充军费的临时支出和补助京釜铁路速成的紧急敕令。随后在30日的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首脑联席会议上，决定了陆海军开战的作战计划，1904（明治37）年1月12日决定对俄最后提案时，运输船队已经开始集结在佐世保了。于是在听到旅顺的俄国舰队出航的报道，并估计经英国介绍从阿根廷购买的正在航行途中的两只军舰进入日本势力圈的时间，2月4日在元老、阁僚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断绝国交和开始军事行动。随后在2月6日，使驻俄公使通告俄国停止交涉，同时转入军事行动，8日，海军在仁川海面攻击俄国舰队，10日，正式宣战。[22]

日本和俄国双方在进行外交谈判时，事先都没有开战的决心，但都在进行战争准备，显示不惜一战的决心，以便分别在朝鲜和"满洲"各自取得独占的权益，其结果势必走上战争。从1903年12月以后，日本极其主动而有计划地向战争大踏步前进了。

① "从明治27—28年战役，和随后华北义和团之乱以来，欧美列国势力在远东互相角逐的形势，与日俱烈。我帝国欲在远东加入文明的伙伴，单独并非容易，这是我早就考虑的"(《桂太郎自传》卷3《明治史料》7，第46页)。所谓"加入文明的伙伴"是指成为欧美帝国主义阵营之一员，参加瓜分中国而言。

② 1901年12月7日小村外相向元老会议提出的关于日英同盟的意见书(《小村外交史》278页)。

③ 英国希望把同盟的对象区域扩大到印度，并且载明维持"东亚的现状"，以便牵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政府关于前者，明确表示拒绝，而将"东亚"改为"远东"，关于后者以加入日本"在韩国拥有政治上以及商业和工业上的特殊利益"的字句，而妥协了。

④ 大部分报纸单纯地欢迎说，得到了对抗强敌俄国的同盟者。可是值得注目的是，也有的担心日本难保不会成为保卫英国利权而"荣任警察"的言论(《日英同盟与荣任警察》《东洋经济新报》第226号，曾村保信著《近代史研究——日本与中国》第70页所引)。

⑤ 驻英公使林董和英国外相兰斯顿之间的换文中约定说，平时两国海军协力，同时，"尽量在远东海面上努力维持能够集结超过任何第三国海军的优势海军，没有松弛之意"(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上第204页)。

⑥ 号称俄国通的驻牛庄的濑川领事5月5日致外相的机密信。关于俄国在"满洲"、朝鲜行动真意的报告说："卑职根据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做出判断时，想象俄国的行动毋宁说没有开战的准备，其重点在于保护"满洲"内的矿业和森林的利益"(《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1,827号)。可是"激烈而热衷的开战论者的中坚军官集中于参谋本部，他们欢迎刺激日本国内舆论的情报，而抹杀妥协的报告，甚至不惜故意强行修改判断形势的方案"(大山梓著《日俄战争的军政史录》29页)。

⑦ 谷寿夫著《机密日俄战史》82页。

⑧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上，211页。

⑨ 七博士中有社会政策学会的创办人金井延、户水宽人、寺尾亨、高桥作卫、中村进午、小野塚喜平次等人。据说强硬的开战论者户水执笔(但无确证)的《社会政策学会宗旨书》中所说标榜反放任主义、反社会主义，"通过个人活动和国家权力，防止阶级倾轧，期望社会调和"(住谷悦治著《日本经济学史的一幕》264页)。他们的学问是德国社会政策论的照搬，而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是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的。此外，对于开战后到处宣传割让贝加尔湖以东之地的户水的言行，文部省于1905年8月给予停职

的处分。山川健次郎总长以未经他呈请便实行处分，提出引责辞职的辞呈，法科大学教授认为这是侵犯大学的独立，表示反对，宣布全体辞职。结果户水得以复职，算是大学方面胜利了，但是，奠定大学自治的这一首次事件，发端于对俄强硬论这件事，表明了作为帝国大学特权的当年的大学自治的性质。

⑩ 《小村外交史》说，“或者说，对俄同志会的活动，是和策划时局进展的小村的幕僚山座（圆次郎，外务省政务局长——引用者）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343 页）。此外《原敬日记》10 月 17 日项下载“或许政府给对俄同志会以某些补助，教唆其如此”（福村书店版2，第 76 页）。

⑪ 幸德秋水在《开战论的流行》（1903 年 6 月）中说：“征伐俄国论仍然流行于我国民间，几乎被视为舆论，不过，其实并不是什么舆论。只不过是一些主战论者所煽动挑拨的一种流行而已。如果不与此流行合流，就有被认为是懦怯者，或被认为缺乏爱国心之虑。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公开地反对它”（《幸德秋水全集》第 4 卷，282 页）。

⑫ 《二叶亭四迷全集》第 12 卷，78，80 页。

⑬ 田冈岭云自传《数奇传》（1911 年，《田冈岭云全集》第 5 卷 660 页）。此外，如本文所述，随后，又记下下面这样反省的话，“其理论的内部包含着一种好事喜乱的煽动性的轻率，和梦想大帝国的虚荣心，这要加以忏悔”。

⑭ 关于“满洲”问题成了群众发泄不满的排泄口的情况，可参见杂志《日本人》（1903年 12 月）所载的稻垣慎太郎《恐俄病和妄想夸大病》的下述记载：“‘满洲’问题……由于和政客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缘故，与其声音之大相比，实行上缺乏热诚，因此，除在议会上利用它做为难为政府的孤注之外，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不过，在沉沦于社会下层、没有地位和财产的多数人中，却意外地受到认真的欢迎……难保不在原来的妄想夸大病上再加上火山的猛烈性，暗中寻找爆发的机会”。（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究》211 页）。

⑮ 平民社和社会主义协会合作，举行讲演会，搞出版活动、传道兼行商。1904年一年中的集会有一百二十五次，地方宣传在关东地方有四十多回。此外《平民新闻》的订阅者达到五千人之多。但是这些人是知识分子、学生、中富农、工匠，而不是工人（隅谷三喜男《社会运动的发生和社会思想》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现代 1》所收）。

⑯ 内村鉴三《送出征军人有感》（1904 年 3 月）中说：“只想宣讲福音。是，只想讲基督的和平福音。只想早一天使天国来到这个世界。这是我能够做的，又不是无效之事。方今之时，策划不可能之事，想立即废除战争，又有何益呢？直到人们心中宿下神灵为止，战争之声不会停息”（《内村鉴三著作集》第 5 卷 91 页）。

⑰ “平民社本身并不单是社会主义者的集合。”“日俄战争前后平民社的空气，很明显是《万朝报》所策划的理想团的延长（中略）。所谓理想团，不屑说，是对现社会抱有某些改革意见的男女混杂的集合体（中略）。是从所有的生活阶层中网罗了奇特人物的社交团体”（白柳秀湖《藤村的诗、小说和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明治文学全集・明治社会主义文学集》2，第 399 页）。职业的多样化、人的类型的多样化、和“奇特人物”的簇生，是这时期的特殊世态。此外，关于批判战争的发言，参见前引《日俄战争史研究》200 页，和荒烟寒村著《寒村自传》（筑摩丛书）上卷 55 页。

⑱ 山路爱山《现时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者》(1908 年,《明治文学全集·山路爱山集》380页)。

⑲ 主战论的推动者陆军首脑也是这样。如寺内陆相所说，战争中不让俄国兵进入朝鲜就要满意，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也没有开战的意思，不过是想利用"满洲"问题谋求充实军备而已(《机密日俄战争史》82 页)。

⑳ 政友会的尾崎行雄,直到开战前为止,主张满韩利益交换,批判开战论。指出日本和英国关于"满洲"问题的利益不一致,说让中国领有"满洲"，和让俄国领有它，对我国来说没有利益上的差别，并做出结论说"纵令有任何情况，勿向朝鲜以外进一步，也勿退一步"(《"满洲"问题》、《再论"满洲"问题》见《尾崎咢堂全集》第 5 卷 75、88 页)。尾崎是朝鲜殖民地化的强硬论者。此外，原敬在开战后的日记(1904 年 2 月 11 日) 中写道:"国民尤其实业者最厌恶战争,而没有公开主张的勇气。这么一来,国民出于无奈也就听任战争了"(2,91 页)。另外,参照曾村前引书 84 页以下。

㉑ 《小村外交史》343 页。

㉒ 俄国方面主张,日本海军在宣战前攻击俄国舰队,是违反国际法的，2 月20日，公布了断绝外交和战斗开始的经过。对此，外务省于 3 月 2 日，通过内外报纸发表了非官方见解，其要旨是，俄国很早以来就一直增强军备，"至于公布宣战并非敌对行动开始的必要条件，这是国际法学家一致承认的，近来的战争，在交战开始之后公布宣战乃是常事"(《小村外交史》383 页)。甲午、日俄两次战争都是在公布宣战之前进行了攻击，后来在陆军大学的战史讲义中，认为这是"通常"的，而同时公布国交断绝和宣战，则被说成是异例(谷前引书 54 页)。

第二节　战斗的经过

日韩议定书的签署

1904 (明治 37)年从 2 月到 3 月，第一军在朝鲜登陆，几乎未经战斗便向北挺进，集结于鸭绿江岸。5月渡过鸭绿江，击败俄军后占领凤凰城，并准备进攻辽阳。另方面，在封锁旅顺口——封锁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取得一定成功的海军支援下， 5 月，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的盐大澳登陆，攻占南山，占领了不设防的大连。南山一战虽只一天就结束了，但我方死伤四千三百人。缺乏炮弹，战斗规模远远超过预想，使大本营大为吃惊。

日军控制了汉城之后，日本便迈出了化朝鲜为保护国的第一

步。开战的两周后的2月23日强迫签订的日韩议定书的内容是：（1）朝鲜接受日本政府关于改善施政的忠告，（2）朝鲜王室的安宁或领土的完整发生危险时，日本采取临机必要的措施，朝鲜对此给予充分的方便，日本为达到此目的，得临时征用军事上必要的地点，（3）日朝两国将来不同第三国缔结违反此议定书内容的协约。这就使朝鲜承认了日本对重要国务的干涉权和军事行动权。

随后在3月，派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为特派大使去朝鲜，递交天皇给国王的亲函，提出改善施政的意见，并且威吓说，朝鲜如果对此踌躇不定时，驻朝鲜日军就不得不增加几倍以防生变。于是朝鲜国王发布命令，废除同俄国签订的全部条约。可是，日本政府这样还不放心，因为在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对于铁路、电报、土地的强制征用，劳务和物资的征用和掠夺，以及用军法进行镇压等，激起了朝鲜上下的强烈反感。① 5月，元老会议和阁议决定的《帝国对韩方针》，比日韩议定书更前进了一步。其内容是，"帝国掌握对韩国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保护实权，以便在经济上更加发展我利权"，也就是把军事、外交、财政置于日本监督之下，以控制其交通、通信机关，进而在产业方面以扩大日本人的事业为目的。②

根据这个方针，8月22日签订了剥夺朝鲜政府财政、外交实权的第一次日韩协约。其内容是，朝鲜政府任用日本政府推荐的一名日本人为财政顾问，和日本政府推荐的一名外国人为外交顾问；朝鲜政府同外国缔结条约以及许给外国人特权和同外国人签订契约时，须事先和日本政府商议。所以用外国人为外交顾问，是考虑到国际反应的缘故，驻美日本公使馆顾问史蒂文斯担任了外交顾问。日韩协约是以预定的旅顺总攻击和与之相呼应的辽阳战役的胜利为压力的，是以"韩国事实上成为我主权范围"的目的为根据的。③

8月19日，第三军开始了对旅顺的总攻击。军首脑对于这个要塞的坚固程度没有任何情报，对于进攻做了乐观的推测。可是一旦开始攻击，俄军的抵抗很顽强，投入了五万以上的兵力，遭受一万五千人的大损失。24日停止了第一次总攻，四天之后，发动了辽阳战役。日军第一、第二、第四军共十三万余人，俄军为二十二万，这是两军主力的首次正面冲突。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之后，9月4日，日军占领了辽阳，但由于兵力和炮弹的不足，无法追击退却的俄国主力军。开战前夕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是到此为止的。

攻占旅顺和奉天会战

使用海岸要塞用二十八厘米榴弹炮的第二次旅顺总攻击，是从10月26日开始的，但这也以造成三千八百的死伤而失败了。当时罗哲斯特文斯基指挥下的太平洋第二舰队（波罗地海舰队），从波罗地海的里堡军港启航了。在这个舰队到达日本海域之前，必须攻下旅顺，歼灭港内的舰队。大本营和满洲军总司令部焦躁不安。④11月26日，开始的第三次总攻。投入了留在内地的最后一个师团（第七师团），以攻占以前作为副战场的二〇三高地为主要目标，在反复你争我夺浴血奋战的突击战后，12月5日，才确保了山顶，靠从山顶观测的二十八厘米炮的炮击，击溃了旅顺舰队，第二年的1月1日，接受要塞守备军司令官斯蒂瑟尔的投降要求，13日，日军入城。攻击旅顺时，包括后方部队在内的总兵力十三万人中，遭受了五万九千人死伤的巨大损失。

俄军的反攻，形成1904年10月的沙河会战，和第二年1月的黑沟台战斗，而将其击退的日本军，决定了在行军和运输上极其困难的解冰期以前给俄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发动占领“满洲”的俄军据点奉天的作战。从2月末开始的这次作战行动，在3月1日开始了全线总攻击。俄军从7日开始退却，日军于10日占领了奉天。

参加战斗的日军二十五万，俄军三十二万，日军死伤七万，俄军死伤九万人，俘虏二万人，是日俄战争中最大一次会战，但是捕捉俄军主力给以打击的目的，这次又没有达到。

开战时的日本陆军兵力是近卫师团以及第一到第十二的十三个师团，到旅顺总攻击为止，已把全部投入战场。于是在辽阳会战之后的9月修改征兵令，把后备役从五年延长到十年，补充兵役从七年四个月延长到十二年四个月，兵役年龄从三十二岁延到三十七岁，动员能力已达到极限，把可能召集的后备兵全部召集了，也达不到所希望的兵力。大本营决定新设四个野战师团和增加四个后备大队，结果在战争中没有来得及。与此相反，俄国对“满洲”的兵力运输能力，大得出乎预料，彼此的力量对比正在倒转。

比兵力不足更使我军苦恼的是弹药尤其炮弹不足。弹药的消耗量远远超过作战当局者的估计，从初期的南山战斗以后，就因此使作战受到限制。扩充炮兵工厂，动员民间工厂，从德国的克鲁伯公司和英国的阿姆斯特龙公司的大量进口，总是赶不上不断增加的炮弹需要。⑤ 甲午战争后，造船业、机械工业、其基础工业的钢铁业、煤矿业、电力事业虽然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实际上只意味着站在起跑线上。从明治初年以来受到政府的格外保护和培育的造船业（其中心为横须贺、吴、佐世保、舞鹤的海军工厂）来说，在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之间，国内制造的军舰共八只，一万八千吨，而向外国订造的是十九只，二十万四千吨。建造军舰达到自给的境地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武器生产的基础钢铁生产，能够制造子弹的炼钢在甲午战争开始那年才算取得成功，以钢铁自给为目的的国营八幡制铁所的开工极其困难，高炉在1901年2月虽然点了火，但因技术上不去而发生故障，第二年的7月停止了开工。由于日俄战争的军事急需而开始的第二次开工，也是在1904年4月点火之后，只有十七天，又不得不停了下来。开工的稳定也是在日俄战争之

后。1898到1900年的铣铁国内生产量是年平均二万三千吨，而输入量则为二十七万三千吨。连续扩充的陆军炮兵工厂（东京、大阪）虽然彻夜开工，但在奉天会战当时，所能供给的野炮和山炮的炮弹，还不到需要的一半。⑥

战时下的国民

1904年3月的大选后，各党派“顾全军国之急需”，提出避免战争的方针，在同月召开的第二十届议会，也全场一致通过了为筹措巨额战费而征收非常特别税和实行烟草专卖的各项法案。随后在这一年年末的第二十一届议会上，也由政府和政党领袖协商通过了补充临时军事费财源的各种增税和食盐专卖的法律案。众议院议长松田正久把这种军事议会的情况和俄国专制政治下民心动摇情况进行对比，而自吹自擂说，“帝国之所以连战连捷是立宪政治赐给的”，⑦从而造成了“举国一致”的态势，在诱导国民支持战争上产生了效果。可是在第二十一届议会上反映出国民对过重的增税的不满，政友会和宪政本党内部出现了顽强的不同意见，在北海道上川兵营建筑费和私立第百三十银行救济问题上，谴责政府和资本家非法勾结的声浪高涨，只是在战时名义的压制下，才好歹没有酿成政治问题。又如第二十届议会，东京选出的秋山定辅，在他主宰的报纸《二六新报》上登载了批判政府强制国民认购国库债券的措施的社论，以此为理由而被扣上“俄探”（俄国密探）的坏名声，通过了劝告辞职的决议，使之辞职了。象这样“徒流于感情而极其危险”的空气在统治着议会。⑧这种空气是扼杀一切不同意见而互相牵制的威压，但是，如果一旦局势有了转变，就会有吹垮外表上举国一致的危险，而包藏这种危险的不满和疑惑正在与日俱增。

开战以后，平民社的反战运动很活跃。3月，《平民新闻》登载了《致俄国社会党书》。7月，转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火花》

对此的公开答复，强调两国社会主义者为了反战而互相合作。随后，8 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各国社会党(第二国际)第六次大会，正在美国的片山潜代表日本出席，与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同时当选为副议长。两人紧紧握手，赢得全场的喝彩。而这件事立即在《平民新闻》上报导说，“它是世界社会党发展历史上值得永远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然而镇压也日益严酷。3 月以《呜呼增税！》的社论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发行人堺利彦被关进监狱，随后在11月又以《告小学教师》一文而被禁止发行，发行人西川光次郎，印刷人幸德秋水被判处入狱、罚款和没收印刷机器。在下一期的第 53 号是纪念创刊一周年的，登载了《共产党宣言》，又被禁止发行，于是翌年 1 月以 64 号宣布废刊。但是他们通过后继刊物《直言》继续活动。他们虽然被骂是“俄探”、“国贼”，受到官宪的压迫仍不屈服。但是，他们不得不认识到他们的反战启蒙运动遇到巨大的障壁。对他们来说，陶醉于战胜的民众和视天皇为绝对存在的国民，都是不可理解的。⑨具有从军经验的田山花袋，在他的小说《一个兵卒》(1908年)中写出了“说兵！兵！金钱少就瞧不起，金州也好，得利寺也好，是靠兵打赢了的呀！糊涂虫、魔鬼们！”这种士兵愤怒心情，这也是他们真情实话的一个侧面。但是，正象山路爱山所指摘的那样，说“开赴战场的兵士好象走向屠宰场的羊那样勉勉强强地出发”的平民社的士兵观，也并不中肯，⑩虽然说矛盾开始显露，但上升期的资本主义下的国民的国家主义，对于三国干涉是怒火冲天的，而且正因为是同世界最大的陆军国俄国作战，内心的不安越甚，对战胜的战利品的梦想也就越发无限度地膨胀起来。割取沿海州或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索取二十亿、四十亿的赔款！乘着这种军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的欢喜若狂的煽动，期待着痛苦牺牲的报偿。

① “这时（日韩议定书签署当时——引用者）国民舆论沸腾，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演说，进行反对；当政的高官提出奏折，弹劾李址镕、具完喜（朝鲜政府首脑——引用者）等人的卖国罪行，请求废除议定书。有的人募集敢死之士，企图暗杀李、具两人，日本公使获悉之后，派遣很多警察到李、具私宅，进行保护（中略）。日本宪兵代行我警察权，禁止我们集会，大肆占领铁路和军用地，强制征用军用工（中略）。对我拒绝征用劳动的人民，则妄加以俄国间谍的罪名，或拘捕或施加刑讯，甚至加以斩杀”（朴殷植著、姜德相译注《朝鲜独立运动血史》1，《东洋文库》28 页）。

②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上，224 页。

③ 关于日俄媾和条件的小村外相意见（1904 年 7 月提交首相的未定稿，同上书上229 页）。其中关于中国写道“试察清国内外形势，该国以自力长期维持其独立与领土完整之希望甚微，早晚终将遭受瓦解瓜分之悲运亦未可知。此事与帝国之利害休戚有重大关系，故帝国应由现在起预作准备。当他日发生处分中国之大问题时，必须打好以优越势力参加之基础”，主张准备参加正式瓜分中国。战争目的之一即在于此。

④ 旅顺攻击失败引起大本营、满洲军总司令部、第三军司令部之间的意见对立。大本营为促使攻击中心目标改为攻击二〇三高地的作战，11月 14 日召开特例的御前会议，要求总司令部督促攻陷旅顺。随后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为指挥第三军作战前往旅顺，这时总司令官大山岩给第三军的训令如下，露骨地表明了对第三军首脑的不信任。其主要内容是，“1、关于二〇三高地的战况所以不明，大部分应归于统一指挥不得其宜。2、高级司令部和预备队位置过远，因此，对敌人的反攻丧失了救援时机。3、明早攻击时，各高级司令部应亲自到达适当位置，必须亲自观察地形与时机，不放过成功机会，以期巩固占领。为了以总司令官的名义指挥第三军作战，特差遣儿玉参谋长”。儿玉在当地会见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使其暂时让出指挥权（谷寿夫著《机密日俄战史》234、235页）。

⑤ 沙河会战当时的1904 年 10 月，满洲军总司令部强烈要求补给炮弹，对此山县参谋总长回电说：“炮弹一事，百般设法，增加制造能力，或向国外订购等，确在全力以赴，唯今日不能充分供给。乃千载之恨事。日前在总理邸主张对于军需品的筹办不应吝惜金钱，虽阁僚中无反对者，但也无可奈何。当年消极计划之结果，今日急欲扩张而不可能，动则有遗误战机之虑，不胜遗憾”（谷前引书 435 页）。山县说是当年消极计划的缘故，然而不得不出此消极计划的原因，在于整个国力弱小，这从包括山县在内的历代内阁的施政看来很明显。

⑥ 1893到1903 年的十年间，陆军炮兵工厂的马力数增加到六点七倍，职工人数增加到六点二倍。海军工厂的马力数扩大到十一点四倍。职工人数增到四点六倍（这期间全部民间工厂的增加指数，马力数为三点四倍，职工数为一点七倍，可相对比）。即使这样也供应不了战争的庞大需要（小山弘健著《日本军事工业史的分析》110 页）。此外，可参照《明治工业史·火器、钢铁篇》，三枝博音、饭田贤一著《日本近代制铁技术发达史》。

⑦ 大津淳一郎著《大日本宪政史》第五卷 859 页。

⑧ 《原敬日记》1904 年 3 月29日条（2，第 97 页）。

⑨ 《平民新闻》44号(1904年9月11日)所载堺利彦《平民日记》,对银座的提灯游行的大欢闹说:"呜呼,呜呼!真正的实力在多数人民,多数人民动起来,什么事都能办得到。呜呼,呜呼!他们真正的阶级觉悟什么时候能有呢!他们现在想着什么这样无聊地喧闹呢?"(创元社版3,第270页)。又如《直言》(1905年3月5日)的不署名的社论《明治时代的政教史》说:"俄国的祸根在于神权主义,这是我国人所熟知的。然而日俄战争,在日本也不无使政治与宗教勾结起来的趋势"(《平民新闻社论集》,《岩波文库》54页)。此外,参照木下尚江《君主观》(同上书16页)。

⑩ 山路爱山《社会主义管见》(1906年)以《非非战论》为题,批判平民新闻社的国家观和非战论时说:"如果问起每一个人的心事,可能有的会感到不痛快,有的会感到难过吧,但是确信为公义和为国家而献身是国民的义务,从而抑制私情的这种心情,不久就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不这样看,就无法解释这次胜利"。与此同时,承认平民社的非战论的意义,又指出"平民新闻社不能因为主张了非战论,就把这次战争的结果说成只对富豪有利,因为这次战争是为了国家的。所以这次战争的结果也必须使之成为国民全体的利益,否则就会认为国民的战死是无益的了,为此,首先必须修改现在的选举法,实行普选,使全体国民都参加实际政权"(《明治文学全集·山路爱山集》97、98页)。日俄战争和政治民主化虽然直接结合不上,但可以说抓住了日俄战争遗留下来的部分意义。

第三节 缔结媾和条约

朴茨茅斯会议

一直在战斗中取得军事胜利的日本,也很难对俄国的战斗力给以决定性的打击,这无论在战争当事国或者第三国看来,都很清楚了。从旅顺陷落前后起,斡旋媾和的各国就开始活动了。俄国的同盟国法国,从和德国对立的关系出发,担心俄国丧失军事力量,首先活动起来。随后,德国请求美国调停。它的目的是想在战后势将激化的、攫取中国利权的竞争中,使本国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不喜欢俄日双方在中国扩张势力,期望它们互相牵制,而在等待调停的良机。

奉天会战后,大山满洲军总司令官主张政略必须和战略一致,向山县参谋总长提出应赶紧采取外交措施的意见,政府在1905

(明治38)年4月决定了媾和方针。其内容是从外交方面促进媾和的方针和条件。所提出的媾和的绝对必要条件是：(1)使其承认日本自由处分朝鲜，(2)日俄两军由“满洲”撤兵，(3)转让辽东租界权和从哈尔滨到旅顺间的中东铁路；其较为必要的条件列有：(1)赔偿军费；(2)引渡逃入中立港的俄国舰艇；(3)割让库页岛，(4)取得沿海省沿岸的渔业权，赔款要求所以没有作为绝对必要条件，是因为考虑到美国等列国希望无赔款媾和的动向。请求美国居中调停也是在这时决定的。

进一步促进媾和趋势的是日本海海战。包括运输船、病院船等五十只的俄国舰队，从法领越南的金兰湾开出，驶向海参崴。在从对马海峡通过日本海的路线，从太平洋通过津轻海峡的路线，和通过宗谷海峡的三条路线中，判断俄国舰队究竟通过哪条路线，在什么地方埋伏等待，这对于日本海军是一次押宝。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预测第一路线，使主力待机于南朝鲜的镇海湾。5月27日拂晓，发现波罗地海舰队驶入对马海峡，午后2时，揭开了战幕，一小时后决定了胜败。波罗地海舰队的主力溃灭了。六艘战舰以及十九艘被击沉，捕获战舰以下五艘，两艘沉没或坐礁，对此，日本方面的损害只有三只水雷艇。

日本海海战结束后的5月31日，小村外相对高平小五郎驻美公使发出训令，要他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斡旋媾和。罗斯福答应了请求，德国皇帝也表明了对此援助的意向。俄国皇帝在宫廷的军事会议上决定继续战争，但6月答应了斡旋。因为俄国虽在战力上还有余裕，但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一筹莫展。1905年1月，首都彼得堡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军队对工人及其家属的十多万向皇帝请愿的游行者一齐开枪射击，以这个“流血的星期日”事件为开端，各地的工人、农民不断蜂起，政治革命运动激烈化了。如果战争再扩大下去，会使革命运动高涨起来的呼声，在俄国政府

内部也响了起来。[①] 此外，各国的首脑害怕俄国革命运动波及欧洲各国，也希望实现媾和。

7月，日本任命小村外相和高平驻美公使为媾和全权代表，俄国任命了财政大臣维特和驻美大使罗森（前驻日公使）。8月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军港的海军工厂的一个房间里开了预备会。政府在媾和时较为必要的既定条件中，尤其无论如何希望取得赔款和割让领土。这是为了使国民相信是战胜国的证据。关于赔款，得知美国和法国持反对意见，为了割取领土，有必要制造占领的既成事实。陆军一向主张但由于海军和政府不同意而一直拖延下来的占领库页岛，在7月才占领了全岛。另方面，从5月起开始了日英同盟的改订谈判。其目的，在英国方面则是估计到战后俄国会向印度扩张，而期待日本陆军的援助；而在日本方面，为了对抗俄国的报复战争要求英国海军给予支援。8月，签订了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其内容是为了保持两国在东亚和印度的领土权和维护特殊利益，当一方在没有进行挑拨而遭受攻击时，他方与之协同战斗，英国承认日本对朝鲜有采取"指导、监理及保护的措施"的权利，日本则承认英国在印度国境内为维护印度领土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与此同时，7月乘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来日的机会，桂首相取得了关于菲律宾和朝鲜的如下谅解（桂·塔夫脱备忘录）。其内容是：（1）美国统治菲律宾对日本有利，日本没有侵略菲律宾的意图；（2）对于维持远东的全面和平，日本、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取得相互谅解，是最大的而且实际上是唯一的手段；（3）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不经过日本的同意，朝鲜不得和别国缔结任何协定那种程度的宗主权，这被认为是这次战争的理论的归结，对远东的持久和平有直接贡献。

于是，日本全权以英国和美国支持朝鲜殖民地化为武器，进行了媾和谈判。俄国全权主张俄国有继续作战的力量，而且军部反

对媾和，因而持强硬态度。焦点在于支付赔款和割让库页岛。8月26日，俄国方面认为会谈势必要决裂，我方也认为是这样。对于这个报告，政府召开了有元老参加的阁议，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继续作战的力量，28日，发出"充分考虑军事和经济上的情况"，指示虽放弃赔款和割地，也要达成媾和的方针，并训令说，先撤回赔款的要求，而继续要求割地。② 于是29日，以俄国割让南部库页岛，日本撤回赔款的要求，结束了谈判。据说走出会场的维特对另外房间的随员低声说："和平了，日本全面让步了"，受到大家的拥抱和亲吻。9月1日，在停战议定书上签字，5日签订了媾和条约和附属协定。媾和条约的主要条款如下：（1）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有优越的利益，并且不阻碍不干涉日本认为在朝鲜所必需的指导、保护、监理的措施，（2）俄国在清政府同意之下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的租借权让给日本，（3）俄国将长春、旅顺口间的铁路和其支线以及在该地方的各种权利，取得清政府同意之后，让给日本，（4）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让给日本，（5）俄国约定缔结将面向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国领土沿岸的渔业权许给日本国民的协定，等等。

日比谷骚动事件

一年七个月的日俄战争结束了。媾和条件并不是国民所能满意的，政府首脑早就预料到。彼此在媾和会议上的地位竟被评为"敌国俨然变成胜者的地位，而我国则陷于战战兢兢唯恐和谈破裂那样"的状态。③ 当媾和条约消息一传到东京，8月31月，媾和问题同志联合会给小村全权打了言辞激烈的电报说："认为阁下议定的媾和条件是遗误君国大事者，宜速行自决，以谢国人"。这个会是以对俄同志会的人为中心的，有各党议员和新闻记者参加。警察要解散9月5日他们在日比谷公园召开的反对媾和国民大会，激

怒了几万民众，袭击了首相官邸、内相官邸和政府系报社，东京市的将近百分之八十的警察派出所被焚烧和捣毁，有两千多人被捕。这次暴动还波及到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地。政府于6日夜间发出紧急敕令，在东京全市和东京府下五郡实行戒严，严厉控制了报纸言论。参加暴动的大多数人是零工、车夫、雇工、手艺人、职工、小商人等。对于战争的实况毫无所知，一直陶醉于连战连捷的这些人，代表了因出征军人家属的辛劳、重税的课赋和强制购买国债和献金等生活陷于贫困的全体民众的不平和愤懑。这次日比谷放火骚动事件尽管被歪曲和篡改成排外主义和军国主义，却是民众对于战争所引起的矛盾心怀不满的爆发，在这一点上，和同年俄国发生的工人、农民、士兵的蜂起有共通之处。因此，这次事件成了下个时代的民众斗争以城市下层民众或工人的反抗为中心而发展的新动向的先驱。④

在日俄战争中，陆军动员的总兵力大约一百万人，海军在开战之初以三十一万八千吨的舰艇进行了战斗。战死和病死以及残废者共约十二万人，损失舰艇九十一只，战费约十七亿一千六百万日元。这次战争是军部根据甲午战争的经验而准备和推动的，其规模和损失远远超过了它们的预料。⑤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资本主义发展而飞速进步的火器的破坏力为武器的真正的近代式战争。

日本的战争目的是从甲午战争继续下来的实现朝鲜殖民地化。甲午战争时，尽管是名义上的，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还是正当的名分，而这次却露骨地监理朝鲜的内政和外交，是以保护国化为其目标的。小村外相签完媾和条约回国后，首先处理的是在11月的强制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保护条约）⑥，这就明确说明了这次战争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演成对俄战争，是因为日本和沙皇主义即强行侵略东亚之间发生冲突的缘故，而其所以形成势在必然，则是因为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矛盾在东亚

愈演愈烈的缘故。朝鲜的殖民地化和瓜分中国形成密切相联的关系，是这个时期的特色。日本由于在帝国主义对立中参加了一个方面，从而在推动朝鲜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参加了推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活动。由于参加瓜分中国，承担了共同责任，因而在朝鲜的垄断权利才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承认。战争之后，日本基于同俄国战争的结果，强行要求中国政府把"'满洲'的一部分归于帝国的势力范围"。⑦于是，为了统治辽东租借地和守卫归于日本手中的"满洲"的铁路，1906年8月，设置了关东都督府。在朝鲜则从甲午战争以来，在中国则从义和团事件以来，日本就和民族运动处于敌对关系，但以这次战争为契机，这种敌对更加明显了。在朝鲜，用军队的力量残酷无情地镇压了反日义兵斗争。如前所述，东京大有形成中国革命运动根据地之慨，但是，媾和后的1905年11月，文部省为了压制革命运动，发布特为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对此进行抗议的留学生实行罢课斗争，有两千人因为气愤这种措施而一齐归国了。⑧和证实了民众力量的俄国革命一样，日本的胜利作为显示亚洲人有对抗欧洲的力量，对越南、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等民族运动产生了激励鼓舞的影响，这是事实。但是，与此同时，朝鲜的民族独立斗争，对于中国民族以及其他亚洲各民族给予了使这种幻想归于破灭的影响，由于他们有了识破日本帝国主义真相的眼力，使各国的民族运动加强了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性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促进了运动的发展。日俄战争成了划分这个新的时代的出发点，这才是更为本质的事实。⑨

日俄战争是以对朝鲜和中国进行帝国主义统治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日本经济本来还不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这方面开始转化是战后的事。日本还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这可以从战争的经过得到说明。陆军的大炮、炮弹，海军的舰艇以及主要武器，大都是从先进帝国主义国家进口的。战费的百分之

四十是由外债来筹措的。在英国和美国募集的外债，达到八亿日元之多，这是因为有日英同盟的支援和对各国以开放“满洲”市场为诱饵才办到的。⑩ 第一次和第二次利息六厘的英镑公债，是以关税收入为担保的，政府实际只能拿到票面额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八，条件极苛。日本所以忍受了这种条件，是因为没有外债就不能进行战争。从开战外交起到停战外交止，一直汲汲于取得英国和美国的同意，已如前述。天皇制军国主义，从实力来说，是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由于采取了代理其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才得以进行了帝国主义战争。虽然如此，但在这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已经完备，由于议会的机能和报纸杂志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在动员国民进行战争和在取得国民自发的协力上获得一定的成功，以及由于军国主义的迅速发展，军事机构得到完备，军备得到扩充，并成功地培养了能够运用这些机构的一定数量的军官和士兵等，导致了这次战胜的原因。而这个事实使日本资本主义和政权机构的军事优越性日趋巩固，使其矛盾格外扩大了。

和甲午战争相比，规模远为庞大的日俄战争，相应地动员了大量的人民群众，要求他们牺牲。但是，这个事实促进了国民的政治觉悟，势必使他们成了政治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战时中木下尚江说：“目前日俄战争的苦痛使国民觉悟到有实行普选的必要”，⑪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由此开始为民众所掌握了。这次战争因为是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所以尽管工人阶级尚未成长起来，却掀起了十年前无法看到的反战运动。尽管反战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呼声，而其活动所以能够顽强地持续下来，是因为在广泛的各阶层中存在着对战争的危惧、不安和对它的批判，以及与之间接结合起来的缘故。然而，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想较为广泛地渗透到民众中，也是从这次战争开始的。立宪文明国日本对专制野蛮国俄国的战争，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侵略，这种理解使知识分子趋向支持

战争。⑫这个幻影在国民思想中打下很大的烙印。这首先是堵塞住了他们对于本国的民族主义的不发达和军国主义的加强进行有意识的反省和抵抗的道路。对于同是亚洲人种内部的决定性的敌对关系，和作为亚洲内唯一帝国主义国家国民的痛苦也起了麻痹作用⑬。

推动近代化和排除欧美列强压迫而实现独立，曾是国民政治课题的中心——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史的第一个时代，经过甲午、日俄两次战争而完全过去了。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是在1911（明治44）年实现的，但是，这与其说是对外平等和完成独立，莫如说是确立帝国主义更为相宜。克服世界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矛盾成为日本国民中心课题的第二个时代，已经开始了。

① “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战争却远未结束。但战争每进一步都将大大加剧俄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都将促使新的伟大的战争、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战争、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时刻早日到来。难怪最沉着、最冷静的欧洲资产阶级这样惊慌失措。它全心全意赞助俄国专制制度能作些自由主义的让步，但害怕俄国革命甚于怕火，因为俄国革命将是欧洲革命的序幕。”（列宁“旅顺口的陷落”1905年1月，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5—36页）。财政大臣维特在奉天会战后的第三天向沙皇上奏说“继续作战危险万分，如再以国民为牺牲，则恐不免带来可怕的灾祸”。主张为“缓和民心之计”的媾和乃属急务（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431页）。

② 在8月28日桂首相的训令中，关于最后的让步，训令说可向美国总统说明，采取让他劝告日本撤回割地的要求，而由日本答应的形式（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上245页）。依靠美国的媾和谈判，不仅是对俄国的关系，也是作为对付预想到的国民不满的辩解手段而采取的办法。

③ 1905年9月，谷干城致田井修德书。其中指出，日俄战争本身是蛮干的。说“我同胞自从战胜衰弱的中国，得到三亿日元的赔款以来，以为只要打仗就会拿到钱和扩张国土，尤其对世界第一的俄国，轻启战端，实属大胆无敌的干法”（岛内登志卫编《谷干城遗稿》下675页）。这反映出甲午战争的赔款对于战后日本的发展该是多么重要的顶梁柱呀！

④ 《直言》（32号）所载《事之真因为何》一文中，评日比谷骚动事件说：“俄国革命有统一，有自觉。而这次事件没有统一，没有自觉。然而就其实质来看，这次事件也和俄国革命相同。可以说日本人民在不知不觉之间培养了革命的气概”（《明治社会主义史料集》1，第252页）。关于这次事件可参照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史研

究》418 页以下，和江村荣一、中村政则、宫地正人《日本帝国主义与人民——围绕九·五民众暴动——》(《历史学研究》327 号)。

⑤ 日俄战争的军事史研究，有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海军军令部编《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战史》，沼田多稼藏著《日俄陆战新史》(岩波新书)，藤原彰著《军事史》(《日本现代史大系》)、谷寿夫著《机密日俄战史》等书。此外，关于整个战争，可参照古屋哲夫著《日俄战争》(中公新书)，井上清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前引《日俄战争史研究》。

⑥ 协约的内容是，日本监理和指导朝鲜的对外关系和事务，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设统监。认为在保持朝鲜的安宁秩序上有必要时，统监拥有命令朝鲜守备军司令官使用兵力和监督朝鲜政府的日本官吏、顾问的权限。伊藤博文曾任第一任统监。

⑦ 1905 年 10 月 27 日阁议决定（前引《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上 251 页)。在 12 月的日清条约中确定了“满洲”的利权。

⑧ 1905 年 8 月，孙文等团结各革命派的结社，在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其中心成员留学生的指导者陈天华为抗议取缔规则和有关这方面的日本报纸报导，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他所以一方面指责日本的侵略，而同时又认为日本有值得学习之处，是因为日本既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先驱，又成了独立强国的缘故，和邹容的《革命军》一起被称为辛亥革命思想源流的他的《警世钟》的日译本为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辛亥革命的思想》(筑摩丛书)所收，其《绝命书》则收于岛田虔次编《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筑摩丛书)、

⑨ 孙文的亲日思想开始转变，是看到日本政府吞并朝鲜和对中国革命派的压迫，怀疑有吞并中国的“野心”，而将其公之于众的是 1911 年的初的事。参照野泽丰著《孙文和中国革命》(岩波新书)，藤井升三著《孙文研究》。此外，越南民族运动的领导者潘佩珠于 1904 年末来日，受住在日本的梁启超的帮助，发起日本留学运动。1908 年在日本的越南留学生达到二百人。可是日本政府接受法国政府的要求，禁止越南人搞政治活动，并驱逐出国。潘佩珠对日本的期待落了空，接着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所领导的民族运动的理想从王政复古的思想转变为共和制思想。关于日俄战争与越南、印度的民族运动的关系，参照中村平治《印度、东南亚的民族运动》，关于同西亚民族运动的关系，参照三木亘《西亚民族运动》(均为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近代 10》所收)。

⑩ 开战前的 1903 年 12 月 31 日，小村外相给驻英公使董如下的要求英国财政援助的训令。“关于战费事项和军事准备不相配合，是帝国政府不容否认者(中略)。日本政府看到战争在自卫上必要时将起而作战，但日本的行动没有任何利己之嫌，因为如果日本取得胜利，则日本努力的成果，将为同‘满洲’有商业关系的列强平均享受”。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408 页引用了上述史料，说：“日俄战争不仅是日本的战争，同当局者明白表示作为英美的先锋而战的发言应当受到重视”(40 页 9)。

⑪ 木下尚江《宣言书》(1905 年 5 月，《平民新闻论说集》(岩波文库) 80 页)。此外，和部二节注⑩的山路爱山的发言也是一致的。

⑫ 甲午战争后对于军国主义不断进行批判的陆羯南的支持日俄战争的理论，是最坦率的典型。《列国同情的标准(黄种人的立宪国和白种人的野蛮国)》(1904 年 4 月。

《陆羯南全集》第 8 卷 313 页)。

⑬ 日俄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战争性质，关于这点，学界的意见大致一致。但关于甲午战争的性质，因和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时期也有关系，学说上有分歧。藤井松一主张是冒险主义的天皇制军部、官僚，和以早熟的垄断资本的形成为基本条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独占市场的野心相结合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的成立和日俄战争》，历史学研究会编《时代区分上的理论的诸问题》所收)。这个评价是继承了井上清著《日本军国主义》II 的见解的，但井上清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受帝国主义的世界历史规律的制约，由于成为近代的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使绝对主义天皇制固有的侵略主义加倍，从而规定为近代帝国主义的战争。与此相反，藤村道生提出不承认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的见解，而把战争的原因归之于最主要的是天皇制矛盾的尖锐化，说日俄战争固然是绝对主义的战争，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被付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的(《论日俄战争的性质》《历史学研究》195 号)。此外，楫西光速等共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II 中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时期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的 1907(明治 40)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日俄战争是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的战争。小山弘健、浅田光辉著《日本帝国主义史》第 1 卷中规定为：主导战争的是绝对主义天皇制政权，而在形成中的部分早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支援和推进了战争这点上，是绝对主义天皇制的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近代帝国主义的“双重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把争论点追究到底的话，那问题就在于把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基本标志，是在金融垄断资本成立的一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去寻求呢？还是在世界帝国主义体制的发展规律和在其中的作用上去寻求呢？关于这一点，可参照江口朴郎著《帝国主义和民族》。

人 名 索 引

（按首字笔画顺序）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一画

十二画

事 件 索 引

（按首字笔画顺序）

一 画

二 画

三 画

四 画

五 画

六　画

七　画

八 画

九 画

十 画

十 一 画

十 二 画

十 三 画

十 四 画

十 五 画

十 九 画

二 十 画